

## 目 录

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	杜聿明 (1)
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	宋希濂 (43)
中国驻印军始末·····	郑洞国 覃异之 (78)
抗战后期重庆的黄金风潮·····	戴立庵 (93)
金圆券的发行和它的崩溃·····	黄元彬 (97)
商震历史概述·····	唐永良 (109)
莱芜蒋军被歼记·····	王耀武 (119)
短稿十篇	
中俄密约与李莲英·····	叶恭绰 (131)
英、德、美、日对袁世凯关系的内幕·····	叶恭绰 (131)
孙传芳驱奉·····	邢赞亭 (133)
姜登选之死·····	邢赞亭 (134)
四一二事变点滴·····	周振强 (136)
国民党军队屠杀广州暴动群众目击记·····	郑庭笈 (137)
记蒋介石中原大战时的一段谈话·····	米哲沅 (138)
喜峰口宋哲元大刀队捕获日本坦克之谜·····	唐永良 (140)
保卫武汉时期蒋介石的一件通敌罪行·····	张有谷 (141)
蒋介石和汉奸照相·····	唐永良 (142)
辛亥前后的江北名流·····	沈 蕃 (143)

山西大学纪略..... 南桂馨 (158)

附注

对《金圆券的发行和它的崩溃》一文的补充和订

正见《选辑》第十二辑一五五页

对《商震历史概述》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

第十八辑二一八页

对《莱芜蒋军被歼记》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

辑》第二十三辑二二五页

对《中俄密约与李莲英》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

《选辑》第四十三辑二六五页、第五十三辑

二五八页

对《辛亥前后的江北名流》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

《选辑》第三十一辑二九五页

# 中国远征軍入緬对日作战述略

杜 聿 明

## 一、中国远征軍組織的由来

中国远征軍是根据一九四一年成立的中英軍事同盟而組織的。当一九四〇年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六月四日英法軍在敦克尔克弃甲丢盔大潰敗之后，英伦三島岌岌可危，英国希图借中国人民长期抗战的伟大力量，支援它在远东殖民地特别是緬（緬甸）、印（印度）、馬（馬來亞）方面的軍事，挽救远东大后方的危机。同时，在中国方面，为了要取得抗战最后的胜利，当时也必須确保滇緬路这条最后国际交通运输綫。因此，自一九四〇年十月間起，英国首先开放封鎖已久的滇緬路，接着酝酿中英軍事同盟。一九四一年春，英国邀請“中国緬印馬軍事考察团”到緬甸、印度、馬來亞作軍事考察。以后几經协商，才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簽訂“中英共同防御滇緬路协定”，成立中英軍事同盟。

根据中国緬印馬軍事考察团的意見，中英軍事同盟本来早应成立，以便中国軍隊及早开入緬甸布防。可是英方迟迟不决，直到一九四二年二月間，中国軍隊才先后动员入緬；三月十二日，即仰光失守后第四日，才正式成立“中国远征軍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原定第二路在越南方面，以后情况变化未发表），指揮三軍在

緬甸与英軍并肩作战。这就是本文所称的中国远征軍。

中国远征軍随着当时情况的发展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和三种不同任务、不同作战地区的組織。前一阶段,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国軍隊动员入緬开始,属于中国远征軍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指揮范围。第一次入緬远征失敗后退入印度的部分軍隊改称为“中国駐印軍总指揮部”,簡称“駐印軍”或“中国駐印軍”;另一部分軍隊退至本国境内怒江东岸,連同以后新增加的部队到一九四三年春重新成立“中国远征軍司令长官司令部”,此为后一阶段。但因一般都称“远征軍”,以致历史資料中,經常混淆不清。特别是这三种任务不同的部队在三个战区作战,先后又統归史迪威指揮,更易造成錯觉。

现在我把中国远征軍前后两个阶段、三种情况的实际組織分述如次:

第一阶段:可以概括为自珍珠港事变、日寇侵緬、中国出兵远征的时期。

時間: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国軍远征軍开始入緬起,至一九四二年八月間。

地点:包括全境内同古(即东瓜)、叶帶西、斯瓦、仁安羌(即彥南陽)、乔克巴当、棠吉(即东枝)、腊戍、曼德勒(即瓦城)、惠通桥諸战役及失敗后分头撤退的地点。

部队番号及指揮官:中国远征軍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司令长官卫立煌,未到任,由杜聿明代理,繼任罗卓英,副司令长官杜聿明;第五軍軍长杜聿明兼,第二百师师长戴安瀾、新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第九十六师师长余韶,游击司令(即第五軍新兵訓練处)黄翔;第六軍軍长甘丽初,第四十九师师长彭璽生、第九十三师师长

呂国銓、暫五十五师师长陈勉吾；第六十六軍軍长张軫，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新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新二十九师师长馬維驥。

第二阶段：可以概括为准备反攻及打通中印公路（亦称史迪威公路）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又分为两个方面：

印度方面：

時間：自一九四二年八月間中国远征軍第一路司令长官部及新二十二师、新三十八师等部队退入印度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止。

地点：包括中緬印边境孟拱、密支那、八莫及畹町会师、打通中印公路諸战役。

部队番号及指揮官<sup>①</sup>：中国駐印軍总指揮部总指揮史迪威兼，副总指揮郑洞国（前为罗卓英）；新一軍軍长郑洞国，繼任孙立人；新三十师师长胡素，繼任唐守治；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繼任李鴻；第五十师师长潘裕昆；新六軍軍长廖耀湘，新二十二师师长李涛，第十四师师长龙天武。

中国方面：

時間：自一九四三年四月前后至一九四五年三月前后。

地点：包括中緬边境松山、騰冲、龙陵、畹町会师諸战役。

部队番号及指揮官：远征軍司令长官司令部司令官陈誠，繼任卫立煌，副司令长官黄琪翔；第十一集团軍总司令宋希濂，第二軍

<sup>①</sup> 一九四二年冬季，史迪威想把中国軍隊殖民地化，駐印軍团营长以上干部一律由美軍官担任，蔣介石不承認；以后史又控告罗卓英十大无能，希图借此开撤換中国將領之路。經過數月中美矛盾斗争，蔣介石才以撤換罗卓英为条件，进一步巩固中国駐印軍的建制，改为新一軍，以郑洞国为軍长。至一九四四年春，另由国内調新三十八师、第十四师、第五十师入印，扩編为新一軍、新六軍两个軍。这时調升郑洞国为副总指揮并成立副总指揮部。

軍長王淩雲、第六軍軍長黃杰，第七十一軍軍長鍾彬、第五軍第二百師師長高吉人；第二十集團軍總司令霍揆彰，第五十三軍軍長周福成、第五十四軍軍長闕漢騫；直屬部隊，第八軍軍長何紹周。本文所述，只是遠征軍第一階段一些慘痛的回憶。

## 二、遠征以前種種

### 修筑滇緬公路和鐵路

在抗日戰爭初期，日本軍國主義者蔑視中國人民英勇無敵的力量，滿以為在短期內完全可以使中國屈膝；那知打了一年、兩年、三年，偉大的中國人民不但沒有屈服，反而愈戰愈強，正循着毛主席在七七事變後指出的“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後勝利是中國的”這個方向發展着。這時日軍妄想從沿海包圍截斷我國國際交通綫，迫使蔣介石投降，於一九三九年冬在廣西欽州、防城登陸，侵占南寧，截斷我通越南海防的國際交通綫；一九四〇年九月間又侵入越南。至此，我滇越路國際交通綫已被截斷，所可依靠的僅有滇緬路。

早在一九三八年春，我國即開始修筑滇緬公路，於是年十二月間初步通車，以後陸續加以修改，成為支援中國抗戰的一個重要的交通動脈。可是通車不久，即被英國殖民主義者不斷留難，甚至在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八日英日正式成立封鎖滇緬路協定，自是日起英國封鎖滇緬路三個月，到十月才又開放。

雖然我們祖國抗日戰爭的勝利，主要的是人民羣眾的不可戰勝的力量，可是也不能全無外援。外援的最可靠的力量是蘇聯，而且蘇聯是抗日一開始首先援助中國抗日的社會主義國家。但蔣介石只相信他自己和依靠資本主義國家。記得在一九四〇年底有一次“官邸”會報中，蔣介石對一位交通部次長（姓名已忘記）說：“蘇

联担任的西北运输工作应全部停止。”这位次长吞吞吐吐地说，新疆尚有許多物资未曾运完，而且都是急要的。蒋介石一听，怒气冲冲地命令他：“你照我的意思办不会错，你不要再想运了，再这样下去，都成他们（指中共及苏联说的）的世界了。”我当时听到有些诧异，觉得苏联援助我国抗日的飞机、坦克、枪炮等都需要大量的油料、弹药补充，为什么要停运呢？特别是我所带第五军的坦克等装备迫切需要苏联的补充，可是慑于蒋介石的淫威，始终未敢出声。

蒋介石坚决站在反共反苏的立场上，当时断然拒绝了苏联的援助。他集中全力经营滇缅公路，任命宋子良为滇缅运输总局局长，设立许多汽车保养站，集中主要车辆担任运输。由于宋子良搞得一塌糊涂，以后改由交通部部长俞飞鵬亲自兼任总局长，后来并有美国人参加整理，也都不见起色。一九四一年春又发行修筑滇缅铁路公债一千万美元，发动当地民众日夜赶修路基，很快即将大部路基修好。昆安（昆明至安宁）段于一九四一年四月通车。

修筑这段铁路时，当地人民激于民族义愤，情绪非常高涨，参加筑路的工农劳动人民极为踊跃，有许多还是由原来津浦、平汉等铁路撤退下来的老工人。修筑这条公路和铁路对于抗日战争起了一些作用，并不是一件坏事。可是主持筑路工程的各级人员贪污腐化、剥削压榨，使广大劳动人民受到重重的灾难。可以说，滇缅路的建筑是染满了劳动人民的血汗的。

### 蒋龙各怀鬼胎

在蒋介石集中全力经营这条国际路线时，他同统治云南的龙云发生着尖锐的矛盾。蒋、龙各怀鬼胎。蒋介石企图利用抗日幌子，处心积虑“统一”云南；而龙云则处处防备蒋介石的这一手，坚

持龙氏小王朝独攬云南政治經濟軍事大权的局面。关于云南的政治蔣介石不能过問；經濟方面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前后，云南仍使用它自行发行的“滇币”；軍事上則中央軍不能入境。

蔣介石这时对龙云所运用的政治手腕是：一面派中央大員如宋子文等人向龙云多方疏通、拉攏；一面以准备远征为理由，将他的嫡系部队先后向滇黔、滇川、滇康边境陸續集中。計先后集中的部队有：

滇黔边境：在兴仁、兴义附近整訓的为第六軍甘丽初部三个师（第四十九师、第九十三师、暂五十五师）；在安順、盘县附近整訓的为第五軍杜聿明所部三个师（新二十二师、第九十六师、第二百师）及机械化部队。

滇川边境：在泸州、叙永附近整訓的为七十一軍钟彬部两个师（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另有新二十九师馬維驥部。

滇康边境：在西昌、会理附近为第七十一軍第三十六师。

滇桂边境：为第五十四軍黃維（以后为關汉騫）部的第十四师、第五十师、第一九八师。

川黔境内：为第二軍王凌云部的第九师、第七十六师、第三十三师；稅警总团孙立人部（一九四一年底編为新三十八师），新二十八师刘伯龙部——这两个单位以后編为第六十六軍，属张軫部。（另外有远征以后增調的部队未列入。）

以上部队大概是自一九四〇年九月間日寇侵入越南时即开始集中，但因蔣、龙間的矛盾，长期未能入滇。一直到一九四一年中英軍事同盟酝酿期間，准备双方协力保全滇緬路及仰光国际交通綫，蔣龙之間經過长期曲折的商討，这年秋冬間，第六軍四十九师彭壁生部先开滇緬路担任护路，第五軍也开入云南楊林、霑益、曲靖



等处。不久蔣介石在云南成立軍事委員會駐滇參謀團，以林蔚任團長，並成立昆明防守司令部，以我兼任司令。接着第六軍九十三師陸續開往車里、佛海布防。至十二月間又將新二十八師、新二十九師、新三十八師三個師編為六十六軍，以張軫任軍長，準備參加緬甸遠征。

### 中國緬印馬軍事考察團

英國是一個老牌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國家，十分自高自大。它向來慣用兩面手法統治歐洲大陸，挑撥戰爭，從中漁利，這是它的拿手好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久，英國為了同法國爭奪歐洲霸權，就逐漸支持德國法西斯主義，並妄圖慫恿希特勒進攻蘇聯。正是玩火者必自焚，希特勒並未完全依照張伯倫的意圖首先進攻蘇聯，相反地是在併吞了一系列小國之後，於一九四〇年先下手它的老伴法國。五月十日張伯倫垮台，六月四日英法軍在敦克爾克丟盔棄甲大撤退，倫敦一時張皇失措。可是英國並未接受這一教訓，對日本法西斯主義者的瘋狂侵略提高警惕，積極在緬甸布防，反而幻想仍用兩面手法敷衍日本，以保全它在遠東殖民地的大後方，七月十八日同日本正式成立封鎖滇緬路三個月的協定。但日本法西斯主義者並未因英國的拉攏而停止它獨霸亞洲的野心，相反地正是利用這一協定看破英國的弱點，於九月間侵入越南，並與泰國簽訂友好條約，直接威脅到馬來亞、新加坡、緬甸等英國殖民地。

這時英國看到中國抗戰以來愈戰愈強，而且八路軍的游擊戰深入晉冀魯豫敵人的大後方，建立抗日政權，不斷打擊敵人，收復失地。英國認為這是了不起的抗日力量，較之英法在歐洲戰場上的狼狽現象，真是不可同日而語。於是英國對中國的态度開始轉變，首先於一九四〇年十月間重開滇緬路，接着派了一些在敦克爾克

撤退下来的殘兵败将来中国学习游击战(当然,他們在蔣政权中是学习不到人民的游击战的)。一九四一年一月,英政府又任命丹尼斯少将为駐重庆陸軍武官,开始和中国酝酿中英軍事同盟,第一个步骤是通过中国对緬印馬的軍事考察,两国共同商定保全緬甸的具体軍事計劃。經過协商,“中国緬印馬軍事考察团”于一九四一年一月間产生。考察团的成員如下:

团长商震,副团长林蔚;团員:陸軍杜聿明、侯騰、馮衍、唐保黄、刘方渠,空軍王×贊,海軍周应聰,外交郑康祺,秘书刘耀汉。考察团于同年二月初出发,到緬甸、印度、馬來亞考察約三个月之久,搜集有关緬印馬經濟政治軍事資料,編成“中国緬印馬軍事考察团报告书”,計三十余万言(当时有油印本),其中最主要的是中、英、緬甸共同防御計劃草案。

这个草案是根据緬、馬地形交通及估計日寇战略战术而拟定的。我們当时根据日本軍国主义者已經吃了中国人民的苦头的情况及其政略、战略、战术上的特性,妄图独霸亚洲的野心,同时并考虑到英国軍隊不堪一击的情况,认为日本对于中国的国际交通綫滇緬公路,将不是从中国境内截断,而是配合它对亚洲的政略战略整个策划;一旦日寇与英国开火,勢必先击败英軍进而侵占馬來亞、緬甸。这样,日寇既击败英軍而夺了它的殖民地,又可以封鎖中国,获得一箭双鵰的效果。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在政治上和經濟上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英国,因而就不敢正面向英方提出如上所述的判断,而只能含糊其辞。草案的内容略如下述:

#### (一) 敌情判断

1. 敌情:日寇陸軍既具优势,又有作战經驗,以日軍侵占越南并与泰国成立友好条約的情况来判断,它已在积极准备与英国

挑衅。一旦日寇发动侵略緬馬軍事，可能以海軍、空軍掩护陸軍沿泰馬交界進軍，先侵占馬來亞、新加坡，然后乘战胜之余威回師北上，进攻緬甸。敌人可能使用兵力三至五个師团和优势的空军与海軍。

2. 地形：中、緬、老（老撾）边境車里、臨江一带山巒重疊，交通不便，易守难攻；而且瘴气特甚，对于大兵团尤其現代化部队运动限制很大。緬泰交界景东以南經登勞山脉、亘薩尔溫江下游至毛淡棉（即摩爾門）一带，虽有崇山峻岭和薩尔溫江之險，但景东、克耶邦特别是毛淡棉附近皆有公路与泰国境内公路相啣接，为可攻可守的决战地带。

## （二）共同防御意見<sup>①</sup>

1. 中英两軍为确保仰光海港之目的，应集結主力在緬泰边境毛淡棉、登勞山脉及景东以南地区預先构筑陣地采取决战防御，并将重点指向毛淡棉方面。另以一小部在中緬边境車里、臨江間担任持久防御。以一部配合艦艇在仰光及仰光海面警戒。

2. 指导要領：（1）中英两軍在車里、臨江以南亘景东以南克耶邦緬泰国境至毛淡棉一带构筑纵深的据点式堡垒羣陣地，吸引敌人于我主力陣地前，以强大之火力摧毁敌人之攻击，不失时机轉移攻势，将敌人包围歼灭于我主陣地前，再一举出击来侵之敌。（2）敌人主力如从中央来犯，我利用既設陣地消耗敌人至一定程度，由景东及毛淡棉两翼先击破敌人，将其包围而歼灭之。（3）敌人主力如由毛淡棉附近来犯，我軍应利用薩尔溫江天險及据点工事吸引敌人于我主陣地前，以强大之火力摧毁敌人攻势，配合我左

<sup>①</sup> 草案是我同侯騰二人合拟的，仅凭回忆，不一定符合原文，可是原則精神基本与原案相同。

翼部队击破一部敌人，将敌人主力包围于毛淡棉海岸附近而歼灭之。(4)敌人主力如由景东来犯，我军应吸引敌人于山岳地带内，以正规战与游击战并用，竭力迟滞敌人，主力从毛淡棉附近出击，先击溃敌之一部，截断敌人后路，包围而歼灭之。

3. 兵力部署：(1)预定英緬軍二至三个师，中国三至五个軍。(2)布置中英两軍主力(二至三个軍)于毛淡棉、克耶邦、景东間地区，并在毛淡棉附近形成重点，构筑半永久性的纵深据点式堡垒羣，形成坚固的主陣地带，在主陣地前选择要点构筑据点式前进陣地，吸引敌人于我主陣地前，以强大之火力摧毁敌人攻势，不失时机轉移攻势，将敌人包围歼灭于我主陣地前。(3)以一小部(一团至一个师)位置于景东亘临江、车里以南地区，构成据点式野战堡垒羣，形成纵深的主陣地带，在主陣地前构筑星罗棋布的前进陣地，采用游击战与陣地战相配合的战略战术。依据中緬交界山岳地带的特性，以主陣地为根据地，用一小部兵力警戒，以大部兵力担任游击，适时深入泰緬境内袭击敌人后方。(4)仰光及仰光海面由英軍及舰艇担任警戒。(5)控制强大机动性预备队(一个半軍至二个半軍)于同古(即东瓜)、平滿納(即平馬納)、瓢背、麦克提拉(即敏鉄拉)間地区，不失时机增援第一綫与敌决战。(6)其他：构筑工事材料及交通、通訊器材等由英方筹备；詳細作战部署待双方政府协定后另行拟定。

中国这个意見是在緬甸考察之后所拟的初稿，以后經過部分的修改补充。接着我們到了馬來亞，見了英国当时駐新加坡总督波普汉，談到这个問題。波普汉很同意中国軍事考察团的意見，希望商震抄一份初稿給他。可是商震的英文是半瓶醋，只是唯唯的答应，并不明白对方的要求。商震的秘书刘耀汉因为商直接与波

普汉談話，正鬧情緒，也未提醒商的注意。到两天以后，波普汉請吃飯，又問到这件事，商瞠目不知如何回答，反而問刘，刘說有这回事。商这时显得十分尷尬不安，馬上表示道歉，并补抄一份送給波普汉。这里說明商震为个人出风头，在正式外交談話中不用秘书翻譯，既违外交慣例，又把事情弄錯；而刘則为个人情緒，故意詆商在外交上丢一次臉。

可是英国除少数人如波普汉、丹尼斯<sup>①</sup>之外，对于当时局势的看法与中国大有出入。他們幻想以大英帝国的招牌吓唬日本。他們說英国有雄厚的力量，认为日寇不敢輕于向他們挑衅；如果日寇要截断滇緬路的話，必然从中緬或中老（老撾）边境，而不会經過緬甸。

因此，当一九四一年夏間中国正式提出中英緬甸共同防御意見书时，英国仍然坚持它的主观謬見，一再強調中国应在中老、中緬边境布防，以防止日寇截断滇緬路，而不允中国軍隊及早入緬布防。同时英国心中也明白：日寇一旦侵袭它的远东殖民地，它没有任何的防御能力，所以也不敢正面否認中国提出的意見，只是強調时机未到，不同意中国軍隊先行入緬。不过英国仍然要借中英合作的声势，进一步唬住日本，于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下旬成立中英軍事同盟，簽訂中英共同防御滇緬路协定。当然英国还有它不可告人的目的，留待下面揭露。

### 中英共同作战的准备

中国方面：中国在这期間（一九四一年六月至十二月間）对中

---

① 英駐华武官丹尼斯少将主张中国远征軍及早入緬作战，曾經昆明飞腊戍与英軍司令胡敦有所商討；二月底由腊戍飞昆轉渝，所乘飞机在昆明机場失事，丹尼斯墮死。

英共同防禦滇緬路方面，作了必要的准备：(1)成立軍事委員會駐滇參謀團，以林蔚為團長，蕭毅肅為參謀處長，及參謀若干人，策劃中英有關作戰的一切業務。(2)先准备三个軍（即第五軍、第六軍、第六十六軍）動員入緬與英軍并肩作戰，詳細位置已如前述。(3)對远征各軍充實装备，如第五軍成立炮兵团等，并令加緊訓練。(4)其他集中滇川、滇康、滇黔邊境各部隊亦在暗中准备動員（詳見前述）。(5)其他炮、工、通、輜等部隊亦作了必要的准备。

但對於緬甸境內的交通運輸、通訊補給等則完全依靠英方，毫無准备。

英國方面：(1)任命胡敦為英緬軍總司令。(2)增加兵力：一九四一年春中國軍事考察團在緬甸考察時，英國在緬甸仅有英緬軍第一師，而且尚未装备訓練完成。到珍珠港事變前後，除這一個師装备完成外，并增加了英印軍第十七師、英澳軍第六十三旅及裝甲第七旅（坦克一百五十輛），并有炮兵、空軍等部隊。(3)對緬泰邊境防禦工事、交通、通訊等完全无准备，但對於主副食、醫藥等有一定的准备。

### 三、在緬作戰概要

中國远征軍入緬作戰，由於中、英、美三方矛盾重重，是一個极其複雜的過程。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變後，同月十一日第一次下動員令起，至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六日远征軍正式動員，這兩個多月期間，時而動員入緬，時而停止待命，時而准备東調，反反覆復，捉摸不定，坐使仰光淪陷，已經失去保全仰光國際交通綫的根本目的。加以入緬後，指揮多次變動，系統紊亂，权限不明，各有所私，以及指揮无能，部隊战力悬殊等等，既未能适时适地

集中主力与敌决战，以期收复仰光，又未能退而凭据险要与敌作持久战，保全我腊戍的物资。东拉西扯，一无所成，徒使将士浴血，丧师辱国，回想起来，实深愧痛！

但我远征军激于民族义战，同仇敌愾，士气旺盛，转战东西南北，与敌搏斗，也有不少可歌可泣的事迹。本文只将在緬作战比较有计划、激烈的、时间较长的以及有意义的有关键性的战斗，如同古战斗、斯瓦逐次抵抗战、仁安羌解英军之围、乔克巴当大上英军之当等等，加以概略的叙述。

### 反复的动员，凌乱的指挥

#### （一）动员方面

第一次动员：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一日，蒋介石令第六军九十三师开车里，第六军第四十九师以一个加强团开晚町归英緬军总司令胡敦指挥，准备开景东。十六日令第五军、第六军动员入緬，协同英军作战。当第五军先头部队到达保山附近时，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又以奉令“英方表示第五军及第六军主力（欠九十三师及四十九师之一团）暂时毋庸入緬”而中止。十二月二十九日又令第五军勿庸入緬，必要时须向东转运。

第二次动员：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令第六军集中芒市、遮放、龙陵，候英方派车接运入緬。

第三次动员：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六日又奉令：“据英代表请求，仰光情况紧急，请速派第五军入緬”；“所有野炮、战防炮均应随同出发，装甲兵团先作出发准备。”

#### （二）指挥方面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蒋介石令第五、六两军入緬，归杜军长指挥。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令第六軍入緬部队归甘軍长指揮，至該軍受何人指揮，另有命令。二日令第六軍入緬后归英方指揮。二十五日令五、六兩軍入緬作战，着由杜軍长聿明統一指揮，杜軍长仍归胡敦指揮。

二月二十五日，蔣介石亲到昆明下达命令指揮部署。三月一日蔣介石亲赴腊戍指揮，三日蔣在腊戍面諭參謀团指导入緬軍之作战行动，并与英方会商。四日蔣面对我說：“你归史迪威將軍指揮”，并說对史迪威將軍要絕對服从。我反問：“如果史迪威的命令不符合你的决策时应如何办？”蔣說：“你打电报向我請示再說。”蔣回到重庆后有些不放心，又給我一封亲笔信，指明必須絕對服从史迪威的重要性。

同年三月八日腊戍会报英方通知，英政府已任命亚历山大接替胡敦的英緬总司令，胡敦任參謀长。十一日令着第五軍、第六軍統归中国战区參謀长史迪威指揮，但未規定史迪威与亚历山大相互間的地位。十二日腊戍会报，英方提出史迪威指揮五、六兩軍，与亚历山大之間的指揮系統不明。同日特派卫立煌为远征軍第一路司令长官，杜聿明为副司令长官，在卫未到任以前准由杜副司令长官代理；也未規定司令长官与史迪威參謀长相互間地位。十七日亚历山大由渝飞回腊戍轉回梅苗，二十八日林蔚到梅苗，据亚历山大面告：“在渝已决定以本人(亚自称)为在緬作战的中英联合軍最高指揮官，史迪威將軍受本人之指揮”，但參謀团及各部队始終未奉到此項命令。四月二日改派罗卓英为远征軍第一路司令长官，仍未規定罗长官与史迪威參謀长相互間的地位。

同年四月五日蔣介石带罗卓英到腊戍，六日到梅苗亲自指揮部署，决定平滿納会战，增調第六十六軍入緬，并召見同古突围的



二百师师长戴安澜,与他同住一晚,予以慰勉。八日蔣約我和戴同他巡視曼德勒。蔣介石看到从梅苗到曼德勒間湯彭山脉一带山嶺重疊,十分险要,对我說:“平滿納会战十分重要,必須鼓励將士一舉击破日寇,进而收复仰光。万一日寇后續部队增加,我軍也不要勉強决战,退一步准备曼德勒会战,或把住这个山口(指梅苗、曼德勒間)与敌作持久战。”我当时很同意蔣介石的这个指示。回梅苗后他又叮囑我要服从史迪威和罗卓英的命令,我因同古战斗曾和史迪威爭吵,滿肚怨气,对蔣說:“如照史迪威的命令,二百师早已断送了,他既不了解中国軍隊的情况,也可以說不懂战术。……”蔣拦住我的話說:“我知道的,以后有罗长官在,他会了解的。”九日蔣介石回国,以后关于中国远征軍的指揮,即由史迪威、罗卓英完全負責。

### 緬人的态度,緬甸的形势

緬甸各族人民六十多年在英帝国主义統治下,深受殖民主义者奴役的痛苦,要求民族独立自由的思想日益增漲,当时緬文报主笔宇克孟先生,談到对中国远征軍的感想时說:“緬甸人不愿做亡国奴,無論日本用什么方式都打劲不了緬甸人,緬甸人真誠欢迎中国軍隊。……”他又說:“我們一家三口都在抗日,我用笔,儿子用枪,我的太太每天为国运而祈祷。”他并且写过不少讚揚中国远征軍的社論,这是緬甸人民的主导思想。可是蔣介石为了討好英帝国主义,对于緬甸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毫未表明态度,更談不到支援緬甸人民。于是緬甸除先进分子积极支援中国远征軍抗日外,一般都抱着观望的态度,反动党派且为日本利用,甘作緬奸,到处进行破坏的活动。同时緬甸人民普遍仇視英軍,遇机即杀,造成当时緬战中极其錯綜复杂的情况。如不是广大爱国华侨积极援助,我

軍就不免要全軍覆沒了。

緬甸按山川河流及政治經濟情况分为二部分：曼德勒以北为上緬甸，重鎮为曼德勒（即瓦城）；以南为下緬甸，重鎮为仰光。上緬甸西有那加山脉，中为明克山脉，东南为湯彭山脉；下緬甸西有阿拉干山脉，中为勃固山脉，东有蓬隆山，与泰国毗連者为登勞山脉。全境三条主要河流，即伊洛瓦底江、色当河（亦称西当河、錫当河）、薩尔溫江，南北貫通全境；鐵路公路南北貫通，并与我滇緬路相啣接。瓦城为上緬甸政治中心，握交通之樞紐，扼水陆之总汇，为历史上兵家必爭之地。其东湯彭山脉与登勞山脉間密林丛生，为現代反侵略战争进行游击战的最好根据地。

下緬甸以仰光为咽喉，为新兴的商港，有現代化的港口設備，为我抗战物資供应的最后一个国际海港，也是我远征軍必爭的目的地。

胡康地区包括那加山以东大洛盆地及新平陽盆地，都是原始森林，古木参天，不見天日，中国历来叫作野人山。其中河流交錯，雨季泛濫，水勢汹涌，舟船难通，因之有“絕地”之称。每逢雨季，不仅用兵困难，即民間交通亦多断絕；可是到了旱季，河川变为通道，除亲敦河外，一般都可徒步通行。

中印緬交界的气候，可分为雨旱两季，自五月下旬起，至十月間为雨季，阴雨連綿，天气較凉，潮湿极重，蚊虫、螞蝗很多，瘴气特甚。十一月以后至次年五月中旬前为旱季，天气多风，极少下雨，十二月間风勢較大，一月以后逐漸轉热，經常在华氏一百二十度左右。

总起来說，緬甸形势是口小，肚大、尾巴尖。仰光为全緬門戶，同古、普罗美都是要隘，瓦城为四战之地，八莫、密支那为最后屏障，

而棠吉、梅苗又为腊戍的屏障；屏障一倒，不仅緬甸自身无以立足，中緬边境物资汇集的腊戍、晚町也就危险了。

### 敌友我的軍事布置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八日，在同古以南約五十公里的皮尤及其南十二公里的大桥附近序战开始前，敌友我三方的軍事布置如下：

1. 敌情：日本十五軍飯田粹二郎所部第三十三师团在普罗美以南地区；第五十五师团在同古以南地区；第十八师团在泰国景迈附近，一部主力于四月初增援斯瓦战斗；第五十六师团判断由仰光登陸，当时行动未明，以后集結于同古。至于空軍和炮兵、战車的情况，当时均不明。

2. 友軍：英緬軍总司令亚历山大所部英緬軍第一师（欠十三旅），英印軍第十七师，英澳軍第六十三旅，英装甲車第七旅均在普罗美方面。英緬軍第一师十三旅在景东、毛奇方面。英空軍飞机共四十五架，在馬格威尔。

3. 中国远征軍：中国远征軍第一路司令长官部所属部队第五軍騎兵团附属工兵一部在皮尤河附近；第二百师在同古（配属炮兵部队未到）；第新二十二师、第九十六师由芒市于六日开始以汽車运输；第六軍所属第四十九师、暂五十五师、第九十三师在景东、毛奇一带；第六十六軍所属新三十八师、新二十九师、新二十八师，此时尚未动员；炮兵为第五軍炮兵团及炮十三团第一营；空軍为美空軍志愿队。

### 同 古 战 斗

#### （一）皮尤河前哨战

我远征軍先遣第二百师附騎兵团及工兵团的一部，先头部队

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到达同古，九日接收英軍防务完毕，十一日騎兵团附工兵一部，步兵一連，推进至皮尤河及其南十二公里处担任警戒，由騎兵团副团长黄行宪指揮。騎兵团团长林承熙鉴于英軍与敌作战月余尚不明了当面的敌情，想到前哨部队的最主要任务就是搜索敌情，应该設法获得敌人的有关文件。他根据連日偵悉日寇大胆追击英軍的战术，在皮尤河南十二公里处先构筑假陣地，又在皮尤河南岸构筑埋伏狙击陣地，皮尤河北岸构筑主警戒陣地，并准备好皮尤河大桥下的爆破工作，等待敌人行至北端，即用电气导火爆炸。所有陣地都伪装得十分巧妙，不易被敌人发现。

三月十八日英緬軍全部撤退，日寇跟踪追击，到达皮尤河南十二公里处，与我发生了激烈的前哨战，这样就掩护了英軍脱离敌人，安全撤退。当时从敌人死体身上的符号，发现当面之敌为五十五师团。我前哨連当日达成任务后，即在黑夜撤退，埋伏于皮尤河南岸两侧，准备狙击冒进之敌。

十九日晨<sup>①</sup>，敌果然采取追击英軍的姿态，以一大队輕快部队冒进，不知在皮尤河岸已踏入我远征軍前进部队預設的埋伏陣地。当敌軍用汽車数輛行至桥北端时（桥长约二百余公尺），全桥轰然陷落（英軍在皮尤河以南桥梁皆未破坏，故敌人有此冒进），敌車尽复。但敌兵仍下車企图頑強掙扎，后續車輛霎时拥塞于南岸公路上。这时我軍枪声四起，埋伏的机枪从尾到头，反复射击，打得敌人落花流水，向公路两侧逃窜。企图頑抗的敌人多被智勇双全的我軍王若坤排长予以消灭。敌后援不济，大部被歼，仅有少数向森林内

---

① 一九四二年九月林蔚所作緬甸战役經過报告书中把同古十九日战斗誤为二十日，把二十日同古战斗遺漏，所以把同古二十日开始战斗誤为二十一日。

逃竄。我軍搜索敵人死體，發現擊斃敵人中有聯絡軍官一員名機部一經。繳獲地圖、日記、望遠鏡、文件、武器、車輛甚多。證明從泰馬入緬之敵為十五軍之兩個師團，是從泰國經毛淡棉進犯緬甸；中路仰曼公路為敵五十五師團；其進入仰光向西路普羅美英軍進攻之敵為三十三師團；東路敵為十八師團，尚在泰國景迈及毛淡棉間；敵原企圖分三路向曼德勒進攻。又知這天被我消滅之敵為一一二聯隊的一小隊<sup>①</sup>。午後敵人增加兵力並以步炮聯合向我皮尤警戒陣地進攻，這時我騎兵團以已達成任務轉移至後方既設陣地，皮尤河岸僅留少數狙擊兵遲滯敵人前進，戰爭至深夜，撤回既設陣地。

## （二）同古激戰十二天

我當時明了當面敵情及敵人整個戰鬥計劃後，判斷當面之敵最大不會超過兩個師團（雖認為敵第十八師團主力有增加中路的可能，但尚未料到敵在仰光登陸之五十六師團），就下決心照蔣介石指示，集中我軍主力，擊破當面敵人，進而協同英軍收復仰光。我並親赴同古，指導二百師固守同古，掩護我軍主力的集中，史迪威也同意我的意見。於是我在前方積極準備同古會戰，史迪威在後方與英方交涉調度部隊集中，預定五日至七日開始向敵攻擊。

三月二十日起，同古序戰開始。敵自前日受我伏擊後，行動極為慎重，先頭以步騎聯合約五六百人，用廣正面向我軍搜索前進；發現我軍在鄂克春有既設前進陣地，隨就展開一聯隊附山炮四門向我攻擊。

二十一日，敵增炮二門，共為六門，向我攻擊整日，敵機並更番轟炸同古，我軍猛勇還擊。敵傷亡三百餘人，攻擊頓挫。我亦傷亡一百四十餘人，陣地屹然未動。

<sup>①</sup> 同前林蔚報告記為一大隊，是誇大其詞，實際只是一小隊。

二十二日,敌再向我鄂克春陣地进攻未逞,一部企图迂迴,亦被击退。全日炮战激烈,入夜沈靜。

二十三日,敌增至两联队(一一二及一四三联队),炮十二門,以战車、装甲車掩护向我鄂克春陣地攻击,炮火猛烈;敌机二十余架这天投弹六次。我以步騎配合向敌側反击,結果毀敌战車、装甲車各二輛、汽車七輛,敌向南窜逃。下午八、九时敌再向我攻击,陣地被突破一部,彻夜对战。

二十四日,敌炮空联合向我陣地猛攻,另一部敌五、六百人附小炮数門由同古以西向同古以北飞机场迂迴。同古机场北部由我工兵团警戒,正在破坏铁路,团长李树正仓皇失措,向后撤退;仅二百师五九八团的一营与敌激战,午后五时放弃机场退守同古。是晚戴师长調整部署,将鄂克春、坦塔宾前进陣地放弃,集結該师主力保卫同古。

二十五日拂晓,敌步炮空联合三面圍攻同古,我軍沉着坚守,并以火烧森林阻敌前进。敌机三十余架更番轰炸同古,一般建筑多被炸毀。但我軍利用陣地,伤亡甚微。入晚我各部队不断以小部队袭敌,有断續小战斗。

二十六日,发现敌占同古机场后,敌五十五师团以工兵及騎兵守备,另以一部挺进至南阳車站占領陣地。

这一天敌以三个联队(一一二、一四三、一四四)圍攻同古,主力指向同古西北角攻击。該方我二百师六百团陣地被突破,我軍遂退守同古铁路以东繼續抵抗。是日敌我爭夺战甚烈,双方伤亡較大。

二十七日,敌主力繼續进攻同古,因敌我短兵相接,敌人炮火失效,我官兵沉着固守,敌伤亡較重。我二百师五九九团伤亡亦大。午后敌一部向北推进,与我新二十二师在克永岡附近发生遭遇战,

双方彻夜对峙。

二十八日，敌人在同古北方要点构筑阵地，企图以一部对叶带西方面取守势，阻我新二十二师攻击；集中主力先消灭我第二百师，并放射糜烂性毒气。敌我反复冲杀，我伤亡虽重，但士气旺盛，迄晚城内阵地仍未动摇。敌并化装英缅军及缅甸土人驱牛车暗带械弹，企图混入同古城内里应外合，均经我二百师查出消灭。至晚清理战场，计缴迫击炮七门、步枪百余枝、机枪六挺及防毒面具等甚多。

是夜十一时，我戴师长在桥东司令部被由同古东南迂回的敌军越过色当河东岸来袭，与五九九团第三营特务连发生混战，激战至二十九日拂晓后即与城内部队通讯中断；同古城内我守军二百师步兵指挥官郑庭笈听到桥东战斗激烈，立即派五九八团的一部对敌东西夹攻，午后已将敌压迫于大桥东南对峙，并与五九九团第三营取得联系，逐渐恢复掌握。

同日(二十八日)，我叶带西集中的新二十二师主力及炮兵战车各一部(只有轻战车，炮战车尚在腊戍待运)，为了解救二百师的被围，向南猛攻，至午后攻占南阳车站四周及部分建筑物；战车并将敌炮兵阵地摧毁，获山炮一门及弹药文件甚多。但南阳车站坚固建筑物中的敌人顽强抵抗，迄未肃清。

二十九日，我新二十二师向南阳车站继续攻击，敌军增援，以步炮联合反攻，敌我相战竟日，均无进展。同日，我游击司令黄翔令补二团的一部由南阳车站以西勃因山脉森林内迂迴至同古附近，有一连曾一度进入永克冈机场。这一天，同古西南北敌部被我军攻击牵制，对同古攻击减轻，仅有炮战。大桥以东之敌仍对戴师攻击甚烈，似有断我同古后路、包围歼灭我二百师的企图。

### (三) 放弃同古

在这期间(三月十八日至三十日)全般情况是这样的：

1. 三月十四日由仰光登陆的敌军后续部队约一师团(以后证明为五十六师团①),行动尚未判明。在泰国境内的十八师团既未向景东方面进攻,即有经毛淡棉入緬的可能(以后证明其主力加入中路战斗)。

2. 东路景东毛奇方面：我第六军在景东、毛奇方面无大小战斗；景迈方面之敌正向景东抢修公路。

3. 西路普罗美方面：英军正面仅有小接触。三月二十九日英军应史迪威的要求(这是合理的),在普罗美南向少数日寇攻击,英装甲部队进入庞得后,即被敌军在斯维当截断后路,英军仓皇撤回普罗美。

4. 英空军于二十一日被敌机完全毁灭。我美空军志愿队虽经协定自二十七日起协同我二十二师攻敌,但直至三十日从未出现。

除以上情况外,我第五军九十六师、战车炮兵等部队尚需一周以后始能集中(以后实际到四月十五日才集中完毕),而六十六军何时集中尚难预料。二百师已在同古连续战斗十二日,补给中断,加以日寇顽强坚守既得据点,我军攻击亦非一举可以夺取(根据昆仑关作战经验)。在此形势下,我军既不能迅速集中主力与敌决战,以解同古之围,而旷日持久,仰光登陆之敌势必参加同古战斗,坐使二百师被敌歼灭。如此,则我远征军将被敌人各个击破,有全军复没之虞。因此,我决心令二百师于二十九日晚突围,以保全我军战力,准备在另一时间、另一地点与敌决战。

---

① 林蔚报告判断为三十三师团,从皮尤鹵获之件中证明三十三师团是从泰马边境入緬。



当时史迪威坚决反对，仍坚持以不足的兵力向敌攻击，双方争执甚烈，竟至闹翻。史迪威坚不放弃他的错误主张（其实是想个人出风头），竟以服从命令来威胁我，并派他的参谋赛尔登监督我实施他的攻击命令。我以这个问题关系远征军存亡，并未受他的威胁，另令新二十二师于三十日向南阳车站之敌佯攻牵制敌人，令二百师于二十九日夜经同古以东突围，沿色当河东岸到叶带西归还建制，车辆经毛奇公路归还，主力撤出同古后即将大桥破坏。

二百师在同古撤退，可以说是有计划的主动的撤退。撤退时同古城内部队接到戴师长命令，由步兵指挥官郑庭笈指挥，撤退前对敌实施佯攻，撤退后仍留少数部队牵制敌人。到三十日拂晓，我大队已经安全渡过色当河，而敌人仍围住这个空城，步炮空联合向城内大举进攻，弹如雨下。我最后牵制敌人的小部队也就在这个时候安全渡河。敌部前进，才发现同古乃是一个空城。我二百师却连伤兵都未丢失，全师而归（当时火食担一度走错路失去联络，以后全部归队）。

同古战斗，二百师是完成了任务的，战术战斗都有一定的成功。我远征军既不能适时适地集中主力与敌决战，那末予敌以一定打击之后放弃同古，保持战力，选择另一有利的时间地点集中主力与敌决战，这是合乎战略、战术原则的。

所遗憾的是，同古会战未成，放弃控制毛奇公路的要镇，既不能积极达到收复仰光的目的，反使以后敌人从毛奇公路向我军大后方腊戍长驱直入，这是错误的。但这种错误是英方另有阴谋，故意耽误运输，我统帅部一切依赖英方，咎由自取，而不该把一切责任委之于前方部队的。

### 斯瓦逐次抵抗战斗

三月三十日晨二百师突围后，当晚令新二十二师以一营在叶带西占领前进阵地，掩护主力在斯瓦河南北岸构筑逐次抵抗阵地，三十一日下达正式命令。这一战斗的目的是掩护主力集中，准备平满纳会战（以后平满纳既会而不战，是因东西两路告急，棠吉、瓦城动摇，因而放弃会战）。其所以称为逐次抵抗战斗（或称狙击战斗），是根据当前地形（斯瓦至平满纳为隘路）、敌我战术特点、缅甸交通运输腐化、主力集中无法预计以及同古被围的教训等等，确定我军掩护部队不固守一阵地，利用隘路预设纵深阵地逐次抵抗优势敌人的攻击；在诱敌深入我阵地内尚未立足时，埋藏的地雷炸弹一起爆发，两侧埋伏狙击兵配合我正面部队一举反击消灭敌人。我军这种阵地又要虚虚实实，使敌人捉摸不清；尤其经过一两次打击后敌军就裹足不敢急进。因之新二十二师牵制敌人半月之久（连南阳车站攻击约二十一日之久），其间激烈战斗亦达十二日之多，使敌人伤亡惨重，寸步难行。我军已达到以少胜众、以劣制优的目的。

当时敌我使用兵力如次：

敌方：第五师团三个联队，第十八师两个联队，山野炮二营，重炮一营，空军飞机数十架，战车若干。

我方：第五军新二十二师三个团，战车一部，山炮一营，游击支队新兵训练处二个团。

从四月一日至四日，新二十二师一部与敌五十五师团一部对峙于叶带西以南南阳车站间，仅有小部队搜索战斗及断续炮战。

四月五日至十日，敌五十五师团以步炮战车联合，全力向我新二十二师猛攻，我军按照预定计划在斯瓦阵地以南完成任务并予敌以严重打击。敌伤亡甚众，并摸不清我军虚实战法。

这期間我第五軍部便衣偵探馬玉山偽裝緬甸人，为敌五十五师团司令部挑水打杂。有一天他发现敌人办公桌上有地图一幅，繪有部队番号位置，他立刻烧好一壶水，乘敌人吃饭时送进办公室，将地图偷出，星夜跑回平滿納。我亲眼看到是日軍地图，并注明新增十八师团五十六及一二四两联队，山炮、重炮各一营，当即轉知前方注意。

四月十一至十六日，敌增援部队更番攻击，炮空轰炸更为猛烈，并不断轰炸平滿納，新二十二师应用虚虚实实的狙击埋伏并进行游击战，給敌人以极大打击。至十六日晚，我軍安全进入平滿納既設陣地。

在这期間，我游击司令黄翔派队在勃固山脉內，神出鬼沒地往来穿梭打击敌人后方交通運輸，并袭击同古机场；于四月七日前偵知敌人从仰光向同古方面增加三千余人。可惜团长王肇中經驗不够，所部官兵又多属新兵，扰乱敌人的次数不多，严重的打击更談不到。但以后从各方对照，他們所得情报和第一綫部队发现敌人的文件基本上是符合的。

是役我軍战术运用灵活，使敌人捉摸不定，伤亡較大。敌五十五师团已十分殘破，不得不增加十八师团作为主力，我新二十二师也伤亡一千五百余人。

### 东西两路相繼敗退

东路毛奇方面十八日以前仅有敌人一个联队，十八日敌偵知我放弃平滿納会战計劃后，始将集中同古之第五十六师团主力轉用于毛奇方面，十九日保拉发现敌战車运输車四百輛。当日我暫五十五师即失去联络，罗农考失守。二十三日敌进入棠吉，同时东犯，罗列姆当日失陷。我第六軍兵力分割使用，一营一团被敌各个

击破。而最恶劣的是一經与敌接触即离开公路，各級指揮官失掉掌握，以致腊戍門戶大开，敌人得以长驅直入。景东方面則始終未与敌人接触。

英軍在这期間已全部集結于西路。英軍士无斗志，一經与敌接触即行潰退，四月一日放弃普罗美，五日放弃阿兰庙，以后逐日撤退不停。四月十三日，英軍提出要求中国軍隊在英軍方面沙斯瓦、唐德文伊、馬格威接防，掩护英軍撤退。这等于全部向我交防，而毫未提及英軍以后的任务<sup>①</sup>。到十七日英軍在仁安羌的一师及装甲旅約七千余人就被敌人一个大队包围，实为战史中的最大笑話。

我新十二师一师的兵力自三月二十六日与敌接触以来，至四月十六日共与敌战斗二十一日之久。我軍先攻繼守，用逐次抵抗战术与优势之敌(先后五个联队)連續激战达十二日，不但达成掩护主力的任务，而且消耗打击敌人并引敌人深入于与我有利的决战地区。可以說，在我抗日远征史上这是罕見的战例。

### 仁安羌解英軍之围

当四月十八日晨我远征中路放弃平滿納会战时，正是西路英軍第一师及装甲第七旅在仁安羌被围的第二日。这时我第六十六軍新三十八师主力已到达乔克巴当，第一一三团孙繼光部星夜用汽車輸送到英軍被围前綫。到后发现敌人仅有一大队，迂迴至仁安羌以北大桥附近，截断英軍后路。而英緬軍第一师及装甲七旅共七千多人，輜重車百余輛，竟至束手无策。經我軍猛烈攻击，至午即将敌击退，英軍全部解围。

我远征軍的这一英勇行动，轰动英伦三島，以后英方曾发給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团长孙繼光及营长多人勋章。

<sup>①</sup> 見林蔚报告。

## 放棄平滿納會戰

四月十八日放棄平滿納會戰，是因西路英軍退于仁安羌以北（在平滿納右后方約二百公里），而东路罗衣考方面的暫五十五師已失聯絡，棠吉告急，我中路軍有被東西兩路敵人截斷后包圍歼滅的危險。當時參謀團團長林蔚提出兩種意見：“（1）貫徹平滿納會戰，努力击破敵之一路，以解除我之危局；（2）徹底脫出敵之包圍圈，一舉退守曼德勒之東北，再增調兵力，從新部署作戰。”他并星夜派侯代表到瓢背通知羅卓英（因當時電話不通）。史迪威與羅卓英雖接受了第二種意見，可是他們的決心處置并不徹底，史、羅命令要旨如下：（1）放棄平滿納會戰，改守梅克提拉、敏揚之綫，準備曼德勒會戰；（2）令六十六軍劉師固守瓦城，先一步占領敏揚、棠沙，對西南警戒；（3）令六十六軍孫師前方兩團逐次阻敵，會合于喬克巴當，以棠沙為后路，節節阻敵前進；（4）令第五軍先抽二百師回占梅克提拉、瓢背之綫，掩護主力轉進；（5）以九十六師在平滿納堅強抵抗當面之敵；（6）該軍以棠吉為后方，準備在梅克提拉、他希、帶側打击北犯之敵（按此令漏掉對二十二師行動之規定）。①

史、羅這個計劃將五軍、六十六軍（欠一師）分布于長達三百余公里之平（平滿納）曼（曼德勒）公路上，既不能攻，亦不能守，我極端反對。當時命令要旨是由電話中傳達，我說要么在平滿納打下去，要么退守棠吉、梅苗，我不同意這樣分散兵力，被敵人各個击破。在電話中相持不下，最後羅拿出他的威風說：“不接受命令決不許可。”我一看表快四點鐘了，再拖下去，各部隊攻击開始，

---

① 見林蔚報告。

与敌胶着更不好办。于是接受了罗的命令，下令放弃平滿納会战。

放弃平滿納会战曾是中国远征军失败后争论的一个中心问题。但我始终认为应否会战须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放弃这一会战，虽然有些可惜，但尚不是中国远征军惨败的关键。

我下令后即赶赴瓢背，向罗卓英陈述以后作战的意见，大意说：既因东西两路吃紧，放弃已有准备的平滿納会战，那就必须集中兵力保全腊戍的两大门户——棠吉和梅苗，不应再作无准备的曼德勒会战。当时罗曾同意考虑我的意见。

### 乔克巴当上大当

到四月十九日午后，史迪威、罗卓英忽然变更计划，既未进一步作合理的部署，反而将我远征军进一步分割使用。他们说，乔克巴当西南发现敌人三千余人，令二百师开乔克巴当向敌攻击。当时我根据摩托化骑兵搜索的报告说，我新三十八师尚在仁安羌，乔克巴当并无敌情。史、罗坚持认为英方情报确实，非去不可，我坚决反对，并力陈利害，说明即有敌人也不应置棠吉之危急而不顾。这时罗已唯美国主子史迪威之命是听，完全拒绝我的意见。我警告罗：“如果出此决策（其实是下策）的话，我不能负责。”罗现出窘态，他的参谋长杨业孔和外事局的一个参事（记不清姓名）出来帮腔，力劝我遵照“命令”。史见我仍坚持保卫棠吉、梅苗的意见，他便反唇相讥说：“中国军队吃饭不打仗吗？”我也回敬说：“我吃的是中国饭，而不是吃英国饭。”如此大闹一阵，我仍抑制着自己的愤怒，再向史、罗申述说：即使乔克巴当发现敌人，以新三十八师掩护英军撤退已可安全无虞，我军应顾全大局，不要前门拒狼，后门入虎，使我远征军一败涂地。史、罗仍无动于衷。我无可奈何，只得

忍辱負痛，一面接受了史、羅的命令，但聲明如再偵察無敵情的話，仍不能去；一面找戴師長吩咐：“除先開一團外，其餘等我从梅苗回來再決定行動。”

二十日得我騎兵再度往喬克巴當搜索的情報，仍无任何敵情，只有大批英軍零零散散在我新三十八師掩護之下狼狽潰退。我得到這一証實情報後，為了遠征軍的最後命運，再親赴長官部向羅報告，不料羅已先到梅苗參謀團去了。羅去時交代他的參謀長楊業孔對我說：喬克巴當之敵不堪一擊，必須先擊破喬克巴當之敵，再作第二步計劃，他堅持將二百師向喬克巴當輸送，否則以抗命論。我覺得他們已不可理喻，急馳梅苗向林蔚陳述意見。約在午夜十二時前後，途中遇見羅卓英（距梅苗約八英里處）。羅說：“你不必去了，現在照你的意見，二百師不去喬克巴當，改調棠吉。”他并不安地說：“我于本日午前已直接令二百師于黃昏前集結喬克巴當以東向敵攻擊，不知現在情況如何？”我說：“喬克巴當確無敵情，我只要二百師去一團，如果你有直接命令的話，可能主力已到喬克巴當了。”羅這時有些張皇，拉着我上車同他一路回去。我覺得既然如此，爭取時間第一，就再无見林蔚的必要了，于是同羅一路趕回。在車中羅對我說：“東路羅衣考已失守，暫五十五師情況不明，敵人正向棠吉、羅列姆前進中。”我說：“這是可以預料到的。喬克巴當我們上了英國人的當。我認為目前必集中第五軍主力二百師與新二十二師與敵人力爭棠吉，否則棠吉不得，腊戍危急。”我并力述棠吉、梅苗是我腊戍、暹町的門戶，必須以最大之決心保全棠吉；如敵已占領，必須以全力攻克；如我先敵占領，則必須頑強狙擊北犯之敵，使我軍主力集中梅苗、棠吉間，與敵作持久戰；第九十六師掩護主力集中後也要歸還建制。羅這時并未否認我的意見，也未說明他以

后的全盘计划，只說：“只要你带二百师把棠吉控制，我就有办法准备曼德勒会战。”我觉得罗在现实情况面前也许会改变他要在曼德勒会战的梦想，所以决心率二百师先将棠吉占领，再以事实转变罗的错误见解。

二十一日十二时前后，我返回梅克提拉司令部，即作重新部署，将已运到乔克巴当的二百师主力(两个团)及骑兵团改向棠吉运输，并先遣骑兵团向棠吉方面搜索敌情。同时我将必须集中主力于梅苗、棠吉间与敌作持久战的意見电告蒋介石，但以后始终未得蒋的复电。

其实史、罗这时仍然决心将二百师、新二十二师、新三十八师皆使用于乔克巴当方面，第六十六军及直属部队与新二十八师也向曼德勒方面运输。而这种毫无军事常识的改变处置，据說是“自四月十八日变更决心后与史迪威参谋长同亚历山大总司令所商决者”，其理由为“彼时我如不去则英军要走”。继知并无目标后，史、罗又改定措施如下：(1)新二十二师在梅克提拉不开；(2)二百师仍开乔克巴当附近，以一部搜索敌情，以主力控制待机，并支援新三十八师之行动。

二十日下午，得知罗农考方面十分紧急，遂又决定：(1)新二十二师附战车及战防炮各一部由廖师长率领增援第六军方面，但须待二百师运输完毕后乃有汽车，而火车又不可靠。(2)二百师到达乔克巴当后，如敌情不急，则待三十八师集结或站稳后，即开回梅克提拉。(3)预定二百师须于二十一日运完，以便迅速输送新二十二师(共汽车百余辆)。①

---

① 見林蔚报告。



參謀團看到史、羅以上的處置後極為不安，用電話通知侯代表立刻派員趕往皎克西征求羅卓英的意見，即：（1）可否立即停止二百師之運輸并改運棠吉。（2）可否令新二十八師只留一團守曼德勒，而令劉伯龍率師主力或一團由火車運回緬甸，并連同第六十六軍將到腊戍之軍直屬部隊（工兵營、戰防炮營、特務營等）歸一人指揮，再由汽車向羅列姆方向運送，以期與新二十二師夾攻北進之敵，并自然掩護極空虛之腊戍根據地。

羅卓英的處置却是：（1）對參謀團第一項意見，立令杜副長官率二百師及特種兵半部由汽車開回并指揮甘軍準備迎擊襲印、羅衣考北進之敵。（2）對於參謀團第二項意見，認為不必如此處理<sup>①</sup>。

以上事實可以看出史、羅是一直堅持錯誤，對於腊戍的門戶棠吉的重要性始終未認識，也不了解第六軍的戰力脆弱。他們始而堅持將二百師運到喬克巴當後再運新二十二師到棠吉，繼而同我在途中商決將二百師改運棠吉，最後參謀團來人商討時亦只承認我率二百師到棠吉，而把原與參謀團決定調新二十二師到棠吉之事既不告訴我，亦不回答參謀團。因之參謀團認為第五軍主力二百師及新二十二師皆到棠吉，而實則只有二百師及特種部隊之一部，謂為欺上瞞下，遺誤戎機，亦不為過。

### 棠吉攻克，又轉皎克西

四月二十一日午後，第五軍二百師及軍直屬部隊一部奉命由西路喬克巴當調回梅克提拉轉向棠吉運輸（約三百多公里，加上空車放喬克巴當百余公里，共計五百多公里行程），進擊由羅衣考北進之敵，往返之間延誤三日，將士疲于奔命，而戰局已陷于危殆。

---

<sup>①</sup> 見林蔚報告。

二十三日午后，我先遣騎兵团及二百师一部到达距棠吉約十五公里的黑河即与敌人遭遇，我騎兵团对敌猛烈袭击，将敌击退。进展至距棠吉約九公里附近，又发现敌前进陣地，至晚攻占并接近棠吉敌人陣地，准备明日开始攻击。

二十四日拂晓，我二百师向棠吉攻击前进，进展迅速，至午我已攻占西南北三面高地，繼續突入市区与敌巷战，爭夺至晚十一时克复棠吉。敌大部东窜，仅有一小部尚在棠吉东南隘路附近坚固建筑物内頑抗。

二十五日，敌增援向我反攻，棠吉东方及西北高地得而复失，至晚始将敌人击退。棠吉东南隘路凭险据守之敌亦将肃清。

这时我的决心是：繼續肃清隘路之敌，向罗列姆攻击前进，以断向腊戍北犯敌人的后路。同时林蔚也来电謂“腊戍之安危，系于吾兄一身，望不顧一切星夜向敌攻击”云云。

我正在部署間，罗卓英連来四道命令，着将已攻克之棠吉除留二百师向棠吉以东罗列姆攻击外，其直属部队一部、新二十二师、九十六师均向曼德勒集結，准备“会战”。虽經我一再去电申述棠吉的重要性，必須以第五軍主力控制棠吉东西南北隘路以解腊戍之危，皆未蒙罗采纳。他仍坚持其謬見，勒令我必須立刻返回曼德勒。我迫于命令，不得不从，于是星夜急返皎克西，二十六日又将已攻克之棠吉放弃。

二十七日，我到皎克西后問罗为什么这样改变决心，罗拿出蒋介石四月二十四日“手启”电給我看，其中要点是：“腊戍应有紧急处置，万一腊戍不守，則第五軍、第六十六軍应以密支那为后方，第六軍应以景东为后方。”<sup>①</sup>

<sup>①</sup> 見林蔚报告。

蒋介石这一指示虽然着重于保卫腊戍，但有“万一”云云，又给史、罗死钻这个空子，不考虑全盘情况，不顾腊戍的安危，断章取义，选择了符合他们个人企图的部分——以八莫、密支那为后方，所以才连电令我回曼德勒的。

这时我对蒋介石也十分不痛快：第一，自罗、史到后，有关作战方面，蒋对我无直接指示；第二，我二十一日陈述集中主力于梅苗、棠吉间作持久战的意见，蒋始终未复，不知他的意图；第三，我认为蒋二十四日“手启”电是未了解棠吉二百师的战绩，决心变得过早，给史、罗钻了空子，转发命令来威胁我；第四，到这时已将远征军弄得一塌糊涂，很难挽回危局。总之，我认为蒋介石太相信史、罗，已将战局搞坏，再向他们说话也就无用。于是我抱定丢车上山的决心，听他去吧。

当日，我看到罗卓英下达曼德勒会战命令中并未规定战车、骑兵、工兵、輜重、汽车等部队的任务，认为曼德勒会战是史、罗的梦想，一旦吃紧又会逃走，于是即令胡团长献群指挥这些部队即日经腊戍回国，于二十八日前均安全通过腊戍。

这时，我军各路情况如次：

西路英緬军第一师及装甲第七旅自仁安羌解围后，即在我新三十八师掩护下逐渐向曼德勒及其以西地区撤退，二十一日退宾河北岸，二十三日退乔克巴当，二十六日基本上撤至曼德勒以西。当面之敌自发现我新增部队以来，未敢冒进，甚至由五月二十日至五月三十日曼德勒撤退期间，基本上与我军无重大战斗。

中路自十八日起，敌五十五师团和十八师团主力及重炮战车、空军向我第五军九十六师猛攻。该师利用既设阵地逐次抵抗，与敌作战八日。平满纳以北至梅克提拉间地形多开阔平坦，很少隘

要可以利用，該師在第五軍中又屬戰力較弱的部隊，可是士氣旺盛，仍能予敵以嚴重的打擊。該師傷亡甚重，凌則民團長陣亡。該師始終未被優勢的敵人擊破。誠如林蔚所說：“該師戰鬥成績及指揮技術則均屬可觀”，“惜苦戰結果，所取得之寶貴時間（八天），我軍主力既未用于保護腊戍之門戶，又未集中擊破任何一方之敵。”

東路在十八日以前，僅有敵一聯隊與我第六軍暫五十五師接觸。十九日，發現保拉克附近有敵運輸車及戰車四百輛，而二十日羅衣考即失陷，暫五十五師與軍部失去聯絡，棠吉門戶大開。二十三日敵占棠吉，復犯羅列姆。及二十五日我二百師克復棠吉，二十六日又自動放棄，敵看破我軍弱點，以輕快部隊用日行百公里的速​​度大膽向腊戍前進。至二十八日，腊戍即陷敵手。

這裡可以看出：由仰光登陸增援之敵五十六師團，早在同古集中；其所以在四月十八日以前未敢以主力向毛奇方面前進者，一方面是偵察我軍情況及准备工作，而主要的則是準備策應我中路軍的攻勢。及四月十八日我軍放棄平滿納會戰後，敵人才大膽向棠吉、羅列姆、腊戍包圍前進。

#### 四、慘敗後的總退却

當四月二十七日羅卓英下達曼德勒會戰命令的時候，西路英軍已全部退至伊洛瓦底江以西，正準備向印度英普哈爾撤退中，我新三十八師直接擔任英印軍的撤退掩護。中路我新二十二師的一部在他希以北三十公里處的溫丁與敵對峙。東路我第二百師正向羅列姆攻擊前進中，第六軍已全部離開公路向薩爾溫江以東撤退中。敵人先頭已到達細包以南大橋附近，腊戍十分危急。

羅卓英當時的兵力部署，以新二十八師四個營守曼德勒核心，

以新三十八师守瓦城以西伊洛瓦底江的北岸(弯曲部)，以新二十二师及九十六师分防瓦城以南小河之綫。

敌二十八日占领腊戍后，二十九日敌一部附战车由緬包回寧曼德勒。这时罗卓英张戛失措，再不叫嚷“曼德勒会战”了。三十日，他急令瓦城各部队向伊洛瓦底江西岸撤退(因东岸道路不良)，續向八莫、密支那后撤。从此我中国远征军走上惨絕人寰的惨败境地。

西路我军自四月二十七日前后即由孟尼瓦(曼德勒西，铁路終点)向印度英普哈尔撤退，所有武器車輛全部遺弃。至五月三日前后，在孟尼瓦附近与敌小有接触后即无消息。

东路第六军二十五日以后，即向景东方向撤退。敌先头卡車百輛已到腊戍南一百一十英里之孔海坪，二十六日午后六时即到达細胞东南之南海附近，与新二十二师八十二团接触。二十七日，我放弃細胞，二十八日，敌向腊戍新二十九师攻击，当晚腊戍失守。三十日，新二十九师在新威布防，五月一日即失守。五月二日，貴街失守，一〇五英里通密支那、八莫的公路开放。三日，敌攻陷晚町，分兵进占八莫。四日，敌向惠通桥急进，当时參謀团控制着战车部队，竟不知使用战车逐次抵抗，阻击敌人，反令与敌战斗，又在芒市附近破坏一連战车以阻塞道路。他們对于武器运用毫无常識，可以想見。五日上午，敌进至惠通桥，与我三十六师先头部队接触。当时惠通桥已破坏，敌由上游渡河，与三十六师后續部队发生激战。六、七、八日这三天，敌我仍在惠通桥东岸激战。八莫之敌于八日进占密支那。九日，惠通桥东岸之敌被击回西岸。十日，敌占騰冲。在潰退中沿途狼狽情况及破坏惠通桥时的惨状，我将在另文叙述。

中路我军于五月一日全部撤完，并将伊江大桥破坏。史、罗原

計劃退過伊江後利用火車由密曼鐵路向八莫撤退，不料史、羅乘第一列火車從斯威堡開出二里即碰車，竟日修通後，開至坎巴拉車站，以後再無車可開。此後第五軍直屬部隊二百師、九十六師及六十六軍新三十八師，即徒步輪流掩護撤退；部分以汽車分段利用牛車道轉運。八日到卡薩南印島時，始悉史、羅已於三日前提下部隊只身逃往印度，我派參謀長羅又倫追趕亦未追到。羅并來電令全部向英普哈爾東一五〇公里之溫藻撤退；同時又奉蔣介石七日令向密支那、片馬轉進，勿再猶豫停頓。我召集各部隊長及參謀長商討後，決心仍照蔣介石命令向國境撤退，當時各將領均無異議。

九日卡薩發現敵人，這時僅有孫師先到卡薩掩護的一個團，余師雖到而廖師、孫師主力尚須一天半始可從正面撤下。我判斷敵人企圖從南北包圍殲滅我軍，如不能將部隊集中掌握，即有被敵各個擊破之虞。卡薩地形負山帶河，形勢險要，如果將敵擊退通過，深恐曠日持久，不能達成先占密支那的任務；若以一團掩護主力，安全轉進，尚可希望達成任務。正在決策間，又收到敵人三日占八莫、八日占密支那的廣播。于是我決心先遣九十三師在右翼掩護，并于孟拱附近占領掩護陣地，使主力經孟拱以西以北進入國境，與敵作游擊戰。命令下達後，各部隊均遵令轉進，獨新三十八師未照命令，而是照史、羅命令一直向西，經英普哈爾入印度。

至此，我中路軍即分為四條道路，以不同的方向撤退：第五軍直屬部隊之一部、新二十二師及長官部所屬各單位如交通部處長唐文梯、鐵道兵團團附張學逸所率的交通員工，暫編團運輸大隊及英聯絡官二人等由曼西北後轉打洛到新平陽，因雨季延時二月余又奉令改道入印。至七月底到印度列多。八月初我奉命返國。第九十六師及炮工兵各一部經孟拱、孟英、葡萄、高黎貢山返國。第

二百师及新兵訓練处补充一、二两团自棠吉开始攻罗列姆，以后沿途突破敌人封鎖綫經南盘江、梅苗、南坎以西返国。

各部队經過之处，多是崇山峻岭、山巒重叠的野人山及高黎貢山，森林蔽天，蚊蚋成羣，人烟稀少，給养困难。本来預計在大雨季前可以到达緬北片馬附近，可是由于沿途可行之道多为敌人封鎖，不得不以小部队牵制敌人，使主力得以安全轉进。因此曲折迂迴，費时曠日。至六月一日前后，軍直属部队的一部及新二十二师到达打洛；九十六师到达孟关（孟拱西北）附近；二百师到达中緬边境南坎附近；黄翔部到达国境泸水附近与国内宋希濂部取得联系。

自六月一日以后至七月中，緬甸雨水特大，整天傾盆大雨。原来旱季作为交通道路的河沟小渠，此时皆洪水汹涌，既不能徒涉，也无法架桥摆渡。我工兵扎制的无数木筏皆被洪水冲走，有的連人也冲沒。加以原始森林內潮湿特甚，螞蝗、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巴虫到处皆是。螞蝗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瘧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一个发高热的人一經昏迷不醒，加上螞蝗吸血，螞蚁侵蝕，大雨冲洗，数小时内就变为白骨。官兵死亡累累，前后相繼，沿途尸骨遍野，慘絕人寰。我自己也曾在打洛患了回归热，昏迷两天，不省人事。全体官兵曾因此暫停行軍，等我被救治清醒过来时，已延誤了二日路程。我急令各部队繼續北进，而沿途护理我的常連长却因受传染反而不治。二百师师长戴安瀾因重伤殉国，团长柳树人陣亡，第九十六师副师长胡义宾、团长凌則民为掩护主力安全而牺牲。

至八月初，各部先后集結于印度和滇西。据当时初步統計，由于指揮錯乱，致各部队被敌杀伤、落伍、染病死亡的，比在戰場上与敌战斗而死伤的还多数倍。計中国远征軍动员总数約十万人，至

此仅余四万人左右。以第五軍一个軍来作比較,情况如下:

番 号	动员人数	战斗死伤人数	撤退死伤人数	現有人数
第五軍直屬队	15000	1300	3700	10,000
二百师	9000	1800	3200	4000
新二十二师	9000	2000	4000	3000
九十六师	9000	2200	3800	3000
合計:	42,000	7,300	14,700	20,000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在撤退中损失人数比正式作战伤亡的大得很多,尤其在正式作战中未损失团长以上將領,而在撤退中竟损失四員之多。其情况之慘可想而知。至其他两軍,除新三十八师在仁安羌之役外,其余损失也都是潰退中的损失。喪师辱国,罪无可恕。

## 五、远征軍失敗的原因

### 中英战略矛盾,英方別有阴謀

从中英共同防御滇緬路这一协定來說,中国远征軍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滇緬路这条国际交通綫。而只有保卫滇緬路的咽喉——仰光海港的安全,才能保全滇緬路,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識。可是自从中国緬印馬考察团提出中英共同防御意見草案,于一九四一年五、六月間正式送交英方后,在半年多時間內,英方对中英共同防御計劃既未着手准备,亦未同意中国远征軍事先入緬布防。多次中英会报中,英国方面一直坚持它的錯誤判断,着重要求中国在車里、佛海布防,而不愿討論中国远征軍入緬布防問題,以致中英共同防御計劃未能及早准备。这是中国远征軍失敗的根本原因。

当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寇对英宣战后,我第五軍、第六軍即行动员入緬远征。同月十一日先遣一个团到畹町,車里方面也作了部署。十六日第五軍即行出发,二十六日先头部队到达保山附近



时，即因“英方表示第五軍及第六軍主力暂时毋庸入緬而停止”<sup>①</sup>，一直延誤到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六日再行动員入緬。英方为什么这样呢？此中内幕，当时誰也猜不透。后来终于被一个比較善良的英国人（只能这样说）揭穿了：中国远征軍再度动員入緬远征时，英国駐緬甸总司令胡敦不充分供給中国远征軍的油料。我第五軍有一个技术員陈乃能当时当我的代表，在曼德勒領油，会到他認識的一个英国老朋友<sup>②</sup>。这个英国人拉着手对他說：“你不要听英格兰人的鬼話，我給你每月发一百万加仑油，再多点也行。”这个英国人气憤地說：“沒有汽油怎么能打仗呢？英格兰人的国策是：远东殖民地宁可丢給敌人，不愿让与友邦，你懂么？”并指着伊洛瓦底江的两岸堆积的汽油說：“这許多油，你們几年也用不完。”<sup>③</sup>原来英国是宁愿把緬甸丢給日寇，而不愿让給中国。其实中国只是为了战胜日寇，需要借重緬甸仰光海港而已。这是中英間的主要矛盾，未能及时揭露，合理解决。所以英国始而不同意中国远征軍預先入緬布防，繼而战争爆发，又阻止中国軍隊入緬；及仰光危急，英国才要求中国一个团、一个师；及我先头部队到同古后，它即对中国远征軍实行緩运。这样，英国政府的阴谋就暴露出来，它是利用中国軍隊来掩护它的安全撤退，并不希望中英并肩与敌决战，更不是为了保全仰光这个海口。

### 中国迁就英美，放棄指揮权

蔣介石当时是中国战区总司令，可是联合軍統帥部并未賦予蔣介石在緬甸作战的指揮权，中英双方亦未就此点达成協議。可

① 見林蔚报告。

② 这个英国人是苏格兰人，非常仇恨英格兰人，曾在中国上海、汉口等处亚細亚石油公司任过經理，与陈乃能有“买办”交情。

③ 緬甸仁安羌一带是油区，当时积存在曼德勒附近伊洛瓦底江两岸汽油数量相当多。

是蔣本人企图以这个头衔来指揮中英双方在緬甸作战的部队。他的做法是：“若要取之，必先予之”。就是說他要取得指揮权，必先託英国指揮一些中国的部队，然后在重要关头他自己亲自来指揮。在第三章里，我已举出一些事例。但英方并不欢迎蔣介石，所以他不得已才下令中国远征軍归英方指揮。蔣介石对此自不甘心，曾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令侯騰飞返腊戍提出七項条件通知胡敦，大意是鐵道由我方守备，派副司令主持运输，划清中英作战地境。我派聯絡員到英軍司令部，要胡敦將軍答复上項照办后，我第五軍始入緬。英国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國家，只要与它有利，它是什么也承認的。胡敦除了关于設置聯絡官一点怕暴露其不可告人之企图，因而未予承認外，其余都接受了。三月一日，蔣介石亲到腊戍指揮部署，企图对胡敦施加压力，取得指揮权。英方另派魏菲尔来見，他們会談情况我虽不知，可是指揮权的問題仍未取得協議。因为以后蔣介石召集五、六兩軍長指示說，魏菲尔判断日寇迟迟不攻仰光，系因渡色当河困难，但他判断是由于調查我軍行动；并說，如敌人兵力在一个师以內，我应对其攻击，若有三师，則五軍主力集中后方（按此系指他希、曼德勒以东以北地区）。由这些情形看来，蔣介石仍未取得指揮权。

蔣介石另来一手，在他离腊戍前又調中国战区參謀长史迪威来腊戍，指揮中国远征軍，并面命我“要絕對服从史迪威，对于英方有关問題由史迪威去办”。这就是在中国远征軍之上，再加上一层重复机构。

史迪威一出头，英方看到胡敦經不起中美双方的压力，就改派亚历山大来繼任英緬軍总司令（当然英国还另有用意）。亚历山大一到任，便下令放弃仰光。这时美国將軍的气焰很高，史迪威虽然没有指揮联合軍的名义，却以中英联合軍指揮自居，指手划脚，不可一世，尤其史迪威派出的人員对英方人員十分傲慢。蔣介石以英

方不通知中国即放弃仰光，非常愤怒，三月九日令第五軍未入緬部队暫緩入緬。十一日正式令第五、第六兩軍归史迪威指揮，十二日又令成立中国远征軍司令长官部。十二日，英方正式提出意見說：“史迪威与亚历山大間指揮系統不明”。史迪威日益感到亚历山大比胡敦更狡猾難纏，于十八日由腊戍飞渝，向蔣介石报告与亚历山大会商結果，并“請示将第五軍主力集中于平滿納”。史迪威希望借中国远征軍之力，在同古击灭敌人一部，以张大他的声威，从中取得中英軍在緬联合作战的指揮权。史迪威由渝返緬后，因为二百师撤离同古問題和我鬧翻，他就返梅苗向亚历山大报到，表示归英方指揮（据刘耀汉对我說，亚历山大在重庆返緬后，蔣介石曾給史迪威一封亲笔信要史归亚历山大指揮）。从此史迪威就以中国战区參謀长的身分，卑躬屈膝于亚历山大之前，把中国远征軍完全任令亚历山大宰割，并派出他的嚙囉到中国部队中监督执行亚历山大的錯誤指示。最后他和罗卓英两人丢下大軍，只身逃往印度，造成中国远征軍的慘敗。就中国方面說，蔣介石过分迁就英美，应負最大的責任。

史迪威逃往印度，还幻想凑合一部分兵力打通滇緬公路，一九四二年七月間曾草拟了一个“反攻緬甸計劃”，作为他在緬甸指揮无方遭到慘敌的“遮羞布”。此案在当时国民党政府中一直酝酿到十二月間，因英国自顧不暇，美国也不同意，并未实行。以后一九四四年間，中国駐印軍反攻緬甸，也不是照这个計劃从仰光登陆而是从緬甸北部密支那方面攻击。这也說明史迪威只凭主观愿望，不顾当时中美英三方具体条件，在失敗后还写了一紙廢文。

### 中国远征將領的失職

中国远征軍慘敗，罗卓英和我都有責任，罗卓英的責任更大。尤其罗卓英对于乔克巴当的行動（根本无敌人，談不到战役），更是慘敗的關鍵。他把軍队的“生地”（占領梅苗、棠吉門戶，依据湯彭

山脉为根据地与敌作持久战)变到“死地”(向乔克巴当扯乱军队主力,又失守棠吉),一意孤行,以致一败涂地,丧师辱国。

罗卓英为什么这样糊涂呢?不,罗卓英不是一个糊涂人。他明知我远征军作战的目的,其所以背道而驰,是他太“聪明”了。他觉得依靠美军可以拿到美国装备(在远征军反动集团中就在争这一问题),可以掌握美国装备的军队,以谋升官发财。所以他到缅甸后就投到美国主子史迪威的怀抱,俯首贴耳,唯命是听,甘心做美国的走狗。最后他丢开腊戍门户而不顾,坐视腊戍危亡而不救,并且同史迪威一道丢下部队,只身逃往印度。当蒋介石听到罗卓英逃印时曾电我追回,但因他逃得太快,追也来不及了。以后史迪威在印度掌握中国军队的目的达到了,就控告罗卓英十大无能,把他赶回中国。这就是做走狗的下场。

我的最大责任是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未与史迪威、罗卓英彻底闹翻,未能独断专行下令让第五军全部向棠吉集中,反而委曲求全,先遣了一个团到乔克巴当去。对于史迪威的命令,我并不在乎(因为可以向蒋介石请示),而对罗卓英应服从到什么程度,却未曾得到蒋的指示,心中无底,未敢断行,以致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以后又未料到敌人先我侵占八莫、密支那,丢车上山的决心太晚,又造成雨季困于野人山的惨境。

至于其他某些将领的无能,如甘丽初逐次使用兵力,对当面之敌始终不明;陈勉吾放弃正面,回避战斗;新二十八师、新二十九师均系康泽的别动队改编成师,毫无战力,一触即垮等等,也是惨败的局部原因。

我这篇述略,主要是揭露中英美三方的一些表面化的矛盾,说明惨败原因的关键,材料极不充分,分析也限于个人的认识水平,对与不对,留待史家加以批判。

## 远征軍在滇西的整訓和反攻

宋 希 濂

蔣介石在抗日戰爭后期所組織的远征軍分为两个时期，它的名称、作用和組織都不相同，杜聿明在另文中已有詳細說明。我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充任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并兼任昆明防守司令，指揮第七十一軍（軍長鍾彬）、第六十六軍及預備第二師。一九四二年二月，六十六軍開往緬甸，另有駐在昆明東部曲靖的新編第三十九師歸我指揮。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蔣介石由昆明偕軍令部次長林蔚（兼軍委會駐滇參謀團團長）等人乘飛機赴緬甸的腊戍和英軍總司令魏菲爾將軍會晤，當天飛機帶回林蔚寫給我的一封信，說蔣要我擔任入緬軍的總指揮，希密作準備。三月四日，蔣由腊戍飛回昆明時，又叫我仍然留在昆明，不去緬甸。但第一時期的远征軍入緬敗退後，從一九四二年五月直到一九四五年一月，所有滇西阻擊戰、怒江敵我對峙、第二時期远征軍的訓練及滇西反攻各役，我都參加指揮。本文就是扼要敘述以上各役的情況，基本上屬於远征軍第二時期的範圍。

### 一、滇緬路撤退的凌亂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入緬軍後方的主要基地腊戍被日軍占領。當腊戍吃緊的時候，入緬軍各種車輛器材及傷病兵等紛

紛向國內轉運，而原在滇緬路線上的腊戍、畹町、遮放、芒市、龍陵等地所存儲的物資，亦爭先向後方搶運。還有緬甸僑胞逃回祖國的，還有一些到緬甸經商運帶貨物回國的，或乘車，或步行，同一個目的，就是拼命向後方逃跑。於是滇緬路上，人車擁擠，途為之塞，車輛頭尾相接，進退兩難。沿途步行的人強制搭車，車輛每次前進，最多一二公里就被堵住，只好停下來等候半個鐘頭或一個鐘頭再走；可是剛走了一小段還得停下來。這樣一段一段的磨，車子不是交通的利器，反而變成堵塞道路的障礙物了。當時親身經歷的一些人說得最為真切：

“畹町、遮放、芒市、龍陵、一路都是車子，……芒市前後有十多公里走不通，龍陵前後有二十多公里走不通，滿滿都是車子。”

“三路縱隊，四路縱隊，……誰也不肯讓誰，一個頂住一個。”

“走一公尺，不定要等多時候，……好多人只好攤開被褥在車子底下睡覺。”

總括一句話，就是擁擠和混亂。

敵人東進的威脅有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原來儲放在畹町、遮放、芒市、龍陵等地倉庫的大批物資是來不及運走了，有的就自動焚燬，黑煙滾滾，直衝雲霄；有的倉庫的看守人員早就逃跑了，根本沒有做出任何處置，變成了敵人的戰利品。我國人民血汗所換來的大批物資，在國民黨軍隊潰敗和後勤人員不負責任的情況下喪失淨盡，這是多么令人痛心和憤慨的事！

入緬軍的核心指揮機構——參謀團，五天內由腊戍退到了保山，行程達一千多華里。而自腊戍到惠通橋丟棄的物資簡直無法計數。原來入緬部隊一到腊戍，許多部隊長及軍需人員就以大量的外幣（當時入緬軍都是發的緬幣盧比）購買布疋、化粧品、高級食

品(如餅干、咖啡、牛奶、白蘭地酒等等),一車一車地裝到昆明出售,獲利十倍到二十倍。我當時曾派了兩個參謀隨軍入緬,他們在給我的報告中對這種情形言之頗詳,而且說得很具體,可惜我現在記不起那些家伙的姓名了。由於重慶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抗戰到第三年,物價就開始急劇上漲。到一九四二年,許多東西都是漲了几百倍,大家都在叫苦,軍隊中絕大部分官兵的生活尤為艱苦。但蔣介石那時卻拿出了大批的外匯來發給入緬部隊。部隊原來就有許多空缺,入緬時各級部隊長就已冒領了許多錢。及到戰爭失敗,許多下級幹部和士兵都病死、餓死或被敵人打死以及逃散了。正當入緬軍喪師辱國,舉國震動,士兵的親屬得到噩耗,悲痛萬分的時候,入緬軍的許多部隊長和軍需人員卻是充滿了愉快和歡笑,因為他們可以大撈一把,領來的大批外匯再也無須發給那些死人了。死的逃的愈多,對他們就愈有利,他們就愈高興。無數士兵的鮮血和人民的血汗填滿了他們的私囊。當時沿滇緬公路潰退的六十六軍,我派几十名幹部在保山、永平、下關一帶收容他們。內中有不少的官兵向我控告了他們的軍長張軫和師長劉伯龍、馬維驥。根據他們提供的許多材料和當的時情況來推斷,他們三個人每個人貪污的緬幣盧比至少是十多萬元(約合美金三、四萬元),這還是最低的估計。根據這些情況和他們的不戰而逃,我向重慶軍事委員會建議將六十六軍番号撤銷,所有殘部合編為一個師,並將軍長張軫、師長劉伯龍、馬維驥革職查辦。蔣介石雖然很快批准了我的建議,但他們利用貪污得來的巨額金錢,在重慶、昆明兩地公開地大請其客,秘密地大送其禮,最後經何應欽(他是國民黨政權高級軍職人員中最貪污、最腐敗、最無能的典型人物)的庇護,張軫、劉伯龍沒有受到任何處分,而且很快就另派新職;馬維驥只關了一下,

很快也就开释了。負失敗重大責任的參謀團，不但沒有檢討錯誤，而在參謀團中几乎是支配一切的參謀處長蕭毅肅居然于六月間回到昆明后，利用團長林蔚的昏庸，用林蔚的名義為自己向軍委會請獎，說他籌謀有功，破壞惠通橋有功。軍委會根本不審查事實，很快就予核准，由重慶國民政府發給蕭毅肅三等雲麾勳章一枚，并登在當時各大報上（一九四二年八、九月間）。我看了這段消息，十分憤慨，曾在日記上寫過這樣一段話（原文記不清，大意如此）：“參謀團的許多作戰計劃都是蕭毅肅作出的，入緬軍十萬之師在這樣的策劃下几乎全軍覆沒。如果說他有功，那對日本帝國主義說來確是有功的，應該由日本天皇發給他一枚勳章才對。至于說到惠通橋之敵，是三十六師的官兵流了許多鮮血擊退的，蕭毅肅當時坐着汽車拼命向后逃跑，有何功之可言？這實在太沒有是非了，但林蔚是蔣介石最親信的人，我又能說什麼呢！”

## 二、惠通橋的阻擊戰

敵軍第五十六師團攻占臘戍后，迅即組成了一個以裝甲車為先導、并用汽車百余輛載運步兵的快速部隊，沿着滇緬公路挺進。原在滇緬公路上的部隊，在敵軍虛張聲勢的威嚇下，完全喪失了戰鬥意志，狼狽潰逃，遂使敵人如入無人之境。五月三日，滇緬邊境的要地畹町即告失守，遮放、芒市、龍陵相繼陷落。到五月五日，敵軍就進抵怒江的惠通橋，并有一部渡過了怒江。當時不僅滇西局勢处于極端危險的狀態，連昆明也震動了。那時駐在雲南的美國志願空軍指揮官陳納德于五月四日給蔣介石的一個報告中說：“根據美空軍的偵察報告，在滇緬路上中國軍隊零零落落，潰不成軍，對于日軍的前進，完全沒有抵抗，如果再不設法挽救，依照敵人幾天



来前进的速度計算,大約十天左右就可到达昆明了。”

当时我所部七十一軍的三十六师原駐在西昌一带,已于四月下旬奉命徒步开往滇西的祥云附近集結。由于謠言紛紜,人心不安,我于五月四日下午五时到五华山昆明行营会晤龙云(我当时系归昆明行营主任龙云指揮)及刘耀揚(行营參謀长)探詢入緬軍方面的真实情况并筹商对策。行营方面因和林蔚的參謀团及入緬軍指揮部均无联系,所得到的消息多是片断的或片面的。唯一較為可靠的消息,即是保山 县 政府的一个电报所說畹町失守和芒市、龙陵吃紧的情况。重庆軍事委员会方面沒有任何指示,行营方面亦不能做出任何决定。是日深夜,我突然接到重庆蔣介石亲自打来的长途电话,他告訴我腊戍、畹町均已失守,敌人乘胜沿滇緬公路东进,林蔚的參謀团已有一天多沒有电报报告,不知到了何处,要我迅即設法和他們取得联络。同时他叫我迅即征調車輛,将已到达祥云的三十六师先运,沿滇緬公路西进阻击敌军,并陸續运送昆明附近的部队。我随即驅車到郊外黑林鋪滇緬路运输总局洽商。兼任总局长俞飞鵬未在,我把副局长和几位主要負責人都喊醒起来,把情况告訴他們,要求所有一切軍运商运的車子均应暫時停止,凡能够使用的車輛都要服从这一紧急任务。他們立即向所有各主要場站查詢車輛情况。我大約停了两个鐘头,和他們作了詳細的計算,他們答应于五月五日至七日三天内提供五百五十輛卡車交本集团軍运输,并于以后陸續征調車輛运送。我計算三天内大約可以运出两个多师,連夜和在祥云的三十六师师长李志鵬通电话,要他的部队整装待运,并叫他帶少数人先行,去赶上已經乘車西进的該师一〇六团,沿路打听情况,对冒进东犯的敌军予以迎头痛击。五日,蔣介石及軍令部和我通电话,商定叫駐在滇南的第九集团軍关麟征

所轄的第五十四軍(軍長黃維)開來昆明接替防務,而命本集團軍陸續西移。我于六日下午三時乘軍用飛機到了祥雲,隨即偕副參謀長陶晉初等乘車西行,七日上午三時到了保山。打聽到參謀團所住的村莊,隨即驅車前往,和林蔚、蕭毅肅等會見。一〇六團已于五月五日上午十時到達惠通橋東岸高地,與敵軍的先頭部隊發生遭遇戰。雙方為了爭奪公路兩側的最高山頂,進行了激烈的戰鬥。我軍浴血搏戰,反復沖擊,于是日傍晚確實控制了公路兩側一帶的最高山峯。但渡過怒江的敵軍約有四、五百人,仍繼續占據惠通橋東岸的一帶山地頑抗,其西岸的炮兵不斷向我襲擊。三十六師陸續運到的另一個團(一〇七團)也已投入戰鬥,正準備向東岸之敵攻擊。七日下午我偕陶副參謀長、楊參謀及一個衛士乘小汽車前往惠通橋東岸三十六師李師長的指揮所。保山到惠通橋約七十多公里,大部分都是山地。車行到由旺附近(離惠通橋還有三十多公里),被在上空盤旋的敵軍四架飛機發現了,我們立即下車走入附近的樹林里隱藏。敵機低飛掃射,沒有打着我們,在汽車附近丟了三顆小型炸彈,也沒有傷壞車子。敵機走后,我們繼續行進,不久就到了李師長的所在地。我們在山頂觀看了惠通橋附近的地形,形勢是這樣的:怒江兩岸,山勢陡峻,兩岸公路,無論自東而西或自西而東,都是由山上蜿蜒而下,曲曲折折地轉幾十個彎。大約走十二三公里才能到達惠通橋,過橋之后,又要曲折而上。怒江江面不寬,但水流湍急。惠通橋橋東橋西,遙遙相望,隔岸對立,能相呼應。五月五日晨敵人占據了惠通橋西岸的高地——松山,在公路的拐彎處架起了重炮,向東岸公路猛烈襲擊,遂使自橋邊至山頂一段的車輛——約有一百餘輛,完全不能開行,車上的人都下車向公路兩側的荊棘叢林里繞道逃往後方。大部分的車輛被敵軍的燃燒炮彈

命中焚燬，物資更是損失不少（在這些車輛和物資中，以重慶軍委會軍政部兵工署的材料為最多）。三十六師於六日下午曾繼續向東岸之敵攻擊，又攻下了兩個山頭。敵軍這時只剩下兩百多人了，仍然據守惠通橋頭兩側的一些高地負隅頑抗。我當和李師長及各團長商定將全師所有迫擊炮集中起來射擊，並將一些重機槍的火點作了重新部署，預定於八日上午發起攻擊，務求一舉將東岸殘敵徹底歼滅。我於當晚回到保山。八日上午，三十六師攻擊部隊進行了英勇的反复沖殺，有的和敵人進行了白刃戰，最後除有數十名敵軍溺水逃回西岸外，其餘全被消滅，至此完全肅清了東岸之敵。自五日至八日間的戰鬥，先後繳獲敵輕重機槍、步槍共八十餘支。這樣，打擊了日軍繼續東進的企圖，保持了保山這個重要基地，造成以後一個時期在怒江對峙的形勢，爭得了準備反攻的時間。這一仗雖然是一個小規模的局部戰爭，但就戰略意義來說，卻是很有價值的。

八日，我到保山城及附近觀察。保山是一個南北七十五華里、東西寬二十五華里的平坝，四周都是高山。相傳諸葛亮南征時曾到過這裡，有點將台、諸葛營等遺址。這個縣產糧頗多，稱為滇西的糧倉。保山城五月四、五日遭日本飛機的瘋狂轟炸，城內房舍被燬達十分之七，尤以一條較為繁華的大街幾乎完全被燃燒彈焚光了，還有不少被炸死的人的屍體沒有掩埋。在城東南一帶，聚集着由緬甸、畹町、芒市、龍陵一帶退到保山來的許多難民。這些難民中有好些在快到保山的時候，遭到雲南地方部隊龍奎元旅的搶劫。這個龍奎元旅原駐在滇緬邊境及保山一帶，聽說敵人來了，拼命向後逃跑，沿途洗劫，在保山還搶了銀行及許多商店，真是無惡不作。難民有的財產行李全丟光了，有的幾天沒有吃到飯，有的生了病，

大多数都找不到食宿的地方，为状至惨。这里面有不少人是在緬甸的华侨，他们由于热爱祖国，不甘心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放弃了在緬甸的产业和工作回到祖国来，那知不仅得不到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的照顾，反而遭受种种的损失和折磨。同日下午，我进行了下列两项工作：

1. 找了保山县长和地方上的几位士绅及负责管理公路运输的人们开了一个会，请他们征集一些人将街上尸体掩埋，破砖烂瓦打扫一下；在城内或城郊附近找出一些空房给难民暂时居住，确实无力维持生活的人应暂由县府供给吃饭；所有东开的军车除装运急需运送的军用物资外，尽可能地免费装载要往下关、昆明的华侨和难民。这些事情后来是做了，但是做得不够好，例如仍有一些司机向华侨勒索车票等情形。

2. 派了几个参谋副官到保山坝子里各村庄收容散兵。这些散兵都是从緬甸溃退回来的，三五人一羣，也有几十人一羣，大多纪律废弛，跑到乡村里乱抢食物，也不给钱，甚至随便拿老百姓的东西，还有任意放枪的，弄得乡村惊慌不安。这项收容工作十分重要。我又迅即从昆明调来了几十名干部，分别在保山、永平、下关一带进行收容，先后收容了几千人和许多武器。

### 三、怒江对峙

当时重庆军委会军令部对于敌情有一个错误的判断。他们认为沿滇緬公路东进的日军，只是敌人为施行追击任务而临时编成的一个快速部队，最多不过二、三千人，孤军深入，不能持久。因此军令部于五月十三日下令要第十一集团军反攻腾冲（腾冲系于五月十日被敌军占领的）、龙陵，并派一部分兵力向腾冲西南地区之

蓮山、盈江、梁河等地前进，另派一个加强连向密支那、八莫間地区挺进，迎接入緬軍第五軍的部队回国。

我接受了这个任务。那时部队的情况是：第三十六师在惠通桥正面，预备第二师已运送到保山集結完毕，第八十八师正在运输中，仅有一个团到了保山，第八十七师尚在昆明待运，新編第三十九师是否西开尚未确定。当即命已到达保山集結完毕的预备第二师顧葆裕部，在惠人桥附近渡河向騰冲前进。第八十八师胡家驥部于十七日集結完毕，由于正面渡江不易，乃命該师在惠通桥下游的攀枝花渡江繞攻龙陵，三十六师派一部渡江攻击当面之敵。随后八十七师到达后，也派出一团跟随八十八师向龙陵攻击。到五月二十二日，指派担任反攻騰冲、龙陵、松山的部队已完全渡江完毕，并已到达攻击准备位置。我预备第二师并派出一部深入騰冲西南地区。第五軍的二百师高吉人部主力及黃翔所指揮的第五軍两个补充团二千余人，就是受到预备第二师的掩护，經騰冲北面到达怒江上游的泸水县，又渡江回到保山附近的漕澗整休的。

到达攻击准备位置的各部队于二十三日起开始向騰冲、龙陵、松山之敵攻击，并分別以一部攻击騰龙、龙松（龙陵——松山）公路上的敵方各据点。这种攻击由于沒有炮兵，不能摧毀敵軍的工事，以及补給上的不充分（例如各种弹药粮秣都赶运不上去），只持續进行了五天，遭受相当的伤亡，仅攻下两条公路間的一些小据点，未能收到预期的成果。二十八日第八十八师的二六四团在龙松公路上击毙了一个敵軍大队长，在其图囊中获得敵五十六师团的作战計劃一份及地图一张，得知敵軍五十六师团全部都在騰龙地区，分为騰北、騰冲、龙陵、腊猛（松山）、芒市、新浓六个守备区，其师团部及直属部队駐在芒市，判断其兵力約为一万五千人至二万

人左右。我当将此項文件送到參謀团林蔚那里，林蔚立即电报軍令部，随着蔣介石于三十一日下令停止攻击，将主力部队撤回，固守怒江，留置一部分在西岸从事游击。这样，滇緬路上的战争，遂演变成怒江对峙的局面。这个局势一直相持到一九四四年五月反攻时为止。在这期间也有过几十次的小规模战争，但每次使用兵力都不超过一个师。

林蔚率參謀团人員于六月十日离开保山返昆明，在“远征軍司令长官部”沒有成立以前，我就单独担负起滇西战場指揮的责任。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除作战方面經常使用約一个师的兵力控置騰北地区掩护右側，并不断袭击騰冲一带之敵外，同时經常派出約一个团的兵力袭击芒市至龙陵、松山間之敵，获取敵軍情况，破坏敵軍交通，以及征购騰龙一带的粮食以解决一部分的軍粮外，还有几項較为重要的工作，簡要叙述于下：

#### 1. 整訓部队

第十一集团軍是以第七十一軍(轄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八十八师，这个部队和我有多年的历史关系)、第六十六軍(下轄新編第二十八师、新編第二十九师、新編第三十八师)两个軍为基干組成的。一九四二年二月，六十六軍入緬作战失利。新編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率其殘部退往印度。张軫指揮新編第二十八师、新編第二十九师，在滇緬公路上几乎沒有进行任何抵抗，被敵人的快速部队冲击了一下，就完全潰散了。他們大多是几十人或三五人一羣，沿着滇緬公路的兩側向东逃跑，到处搶劫，弄得鸡犬不宁。我派了大批人員在下关、永平、保山一带收容他們，严禁他們再向东去，到六月底总共收集了五千多人。为了整飭軍紀，申明賞罰，我向重庆軍委会建議：将六十六軍軍长张軫、新編第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新編

第二十九师师长馬維騷均革职惩办；将六十六軍及新編第二十九师的番号均取消，保留新編第二十八师的番号，以收容的五千多人編成，并将新編第二十八师归入第七十一軍的建制，将七十一軍的三十六师改为独立师，归本部直接指揮。这个建議很快得到了蔣介石的批准。

甘丽初的第六軍(轄第四十九师、第九十三师、暫編第五十五师)在緬被日軍击破，潰不成軍，由緬甸的景东退到云南的思茅、普洱一带后，殘部仅存六千多人。軍委会将这六千人併編入九十三师，調駐車里、佛海一带整訓，并守备国境；免去了甘丽初第六軍軍长的职务，并取消暫編第五十五师的番号(第四十九师保存其基干，調到昆明，归昆明防守司令部予以整补)。同时，軍委会发表黄杰为第十一集团軍副总司令兼第六軍軍长，第六軍以預备第二师、新編第三十九师組成。第六軍的直屬部队及新編第三十九师均于是年秋开到了滇西。是年冬第五十四軍(軍长是方天，下轄第十四师、第五十师、第一九八师)亦由昆明开到祥云、瀾渡一带，暫归我指揮。这样，当时我在滇西战場所指揮的兵力为：第七十一軍、第六軍、第五十四軍及第三十六师。

一九四二年五月，入緬軍的潰退和日机的濫肆襲炸，給滇西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痛苦，而热带病——虎列拉的传入，更給滇西人民加上可怕的災难，保山一带村庄的居民在六、七两月里死于这个疫症的有一千多人。有的全家死亡，有些村子里一两天之間死了六七十人；沒有棺材，只好用席子包裹掩埋。我和当时到了保山的李根源老先生，立即采取了措施。那时軍隊全部都注射了防疫針，感染情形不严重，当命令部队在所有的村庄里为居民进行环境的扫除和隔离工作，派出大部分軍医人員为居民注射防疫針。由于

人員和藥品的不足，我和李根源分別向昆明的一些醫療機關發出緊急呼吁，先後得到了幫助。這樣，到七月中旬，這個疫症才沒有繼續發展。

在這時期，除以一部軍隊守備怒江各要點，並派出一部在怒江西岸游擊外，大部分駐在保山、永平、大理、瀾渡、祥雲一帶整訓。向軍政部要得了二萬多名補充兵，充實各軍師的兵員，達到了按編制有八、九成的人數。為了使官兵能耐艱苦，射擊準確，善於攻堅，及能打運動戰，我們掀起了一个練兵運動，也常住到各師團部里督促和鼓勵。在大理、永平、保山等九個縣的各村莊里，大部分都住有部隊。走到任何一個單位（不管是團或營，甚至一個獨立排），都可以看到住的地方弄得整齊齊、干干淨淨的。每個連或獨立排都有自己的講堂，這種講堂形式不一，主要的材料就是泥土，都是士兵們的智慧和勞動創造出來的。有各種練習射擊的設備，有各種式樣的沙盤，有各種作業（例如坑道作業等）的模型。除了基本教練外，經常舉行班排連營的對抗演習，有時完全是實戰（雙方都使用實彈），攻擊堡壘、爬山、夜間演習等等。部隊住在滇西這樣偏僻的地方，農村風氣淳樸，官兵很少有從事賭博及其他不正當娛樂的。一般都是鍛煉體格，練好本領，這就為以後的反攻打下了堅實的基础。

## 2. 成立大理幹部訓練團

我於五月間在保山看見從騰冲、龍陵跑出來的一些中學生及從緬甸回來的一些華僑青年。他們因受戰爭的影響，大多沒有錢，不能到昆明等地去繼續就學，而又無其他出路，流浪街頭，衣食困難。我曾派員收容他們，先解決他們的食宿問題。隨後想到將來反攻緬甸需用大批工作人員，何不開辦一個訓練班收容他們，並擴大招



收一批滇西青年，施以一个时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然后派到各地去从事地方工作，组织民众，运济粮秣，侦察敌情，对配合国军作战是能起一定作用的。经过同林蔚商谈，得他同意后，我随即拟了一个具体方案送给他转投到军委会，不久就批准了，定名为“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到一九四三年五月，由于军委会驻滇干训团在昆明成立，改称为“驻滇干训团大理分团”，团长名义由蒋介石兼任，副团长为龙云、李根源（后由陈诚继李根源），我兼任教育长，董仲箴任副教育长。地点选择在大理的三塔寺营房，八月下旬正式成立，招收的学生共一千一百多人，编组为一个总队，下辖三个大队。确定团的教育方针为“对滇西青年施以三民主义的政治教育和必要的军事训练，培养他们成为保家卫国的干部”。训练期间定为一年。训练课程，政治与军事并重，有一个大队较为偏重于军事教育，因为预备派到部队去充当下级干部。当时在政治教育方面，虽未公开对学生进行过反共教育，但对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解释，是以戴季陶、蒋介石等人的反动思想体系为依据来灌输给学生的。所以这个团虽有鼓励青年争取抗战胜利的积极的一面，但就其根本性质来说，则是反动的。这个团于一九四三年一月曾邀请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大的一些教授如潘光旦、费孝通、曾昭掄、罗常培、张印堂、蔡维藩等人到大理来讲学；他们对于促进滇西的文化发展和鼓舞青年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一些作用。这个团到一九四五年三月结束时为止，共办了两期。先后在这个团受过训练的学员学生共约两千人，除一部分派到各军师充当排连级干部外，大部分就其原籍编组成许多小队派到滇西各县去做地方工作；并有一部深入到滇缅边境的江心坡、片马、拖角、盖达、隴川、猛卯、耿马、卡瓦山等地区工作。这批学生对于一九四四年的

反攻胜利，是有一些贡献的。

#### 四、反攻的籌議和规划

緬甸全境及滇緬边境的一部分被日軍侵占后，中印交通被切断，美援物資无法运入，重庆国民党政府大为焦急。史迪威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八日送給蔣介石一份备忘录，提出反攻緬甸的意見，蔣介石批交參謀总长何应欽及軍令部核議。随后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威尔基快到重庆，国民党政府的立法院院长孙科又致函何应欽提議中国应向英美要求向緬甸进攻，打通中印交通。何应欽将孙科的信也交軍令部办理。軍令部随即提出“中英美联合反攻緬甸方案大綱”，曾由蔣介石和威尔基商談。方案大綱摘录如下：

甲、反攻緬甸的理由：（1）規复緬甸可建立反攻日本的基地，使盟国尔后攻势作战容易。（2）可巩固印度，彻底击破軸心国会师远东的企图。（3）打通中印交通，使美国援华物資大量輸入，及早完成中国总反攻的准备。（4）牽制日本陆海空軍，使不能再行增辟戰場（如对苏对澳或袭击美国）。

乙、緬甸方面敵軍兵力判断：（1）陆軍現約五个师团，将来增加到十个师团为最大限度。（2）海軍現新加坡以西亘孟加拉湾，似尚无主力艦，将来可增加至其全部艦队四分之一为最大限度。（3）空軍現緬境約有飞机一百五十架，将来其第四飞行师团全部（約八百架）协力該方面作战为最大限度。

丙、作战准备：（1）中国陆軍以十五至二十个精銳师，准备以主力由滇西，一部由滇南攻击敌人。英美陆軍以五至七个师兵力及一部降落伞部队与中国留印部队联合，准备以主力由印度陆地正面，一部由仰光登陆攻击敌人。（2）英美联合海軍以主力艦三至

四艘、航空母艦六至八艘為基干，特別須編入多數的潛水艇，準備確實控制孟加拉灣，掩護陸軍在仰光登陸。(3)英美聯合空軍以能击破敵人一個空軍師團為對象而準備之。(4)美國應設法加強中印間空運力量，盡先輸送中國出击部隊所要的裝備及其他必要物資。(5)英國應迅速準備開設印緬邊境的交通路。

丁、作戰指導大要：(1)英美聯合空軍先攻击敵空軍根據地，奪取制空權，掩護海陸軍作戰。(2)英美聯合海軍先以有力潛艇艦隊進出中國海及爪哇海，截斷敵海上交通，爾後以海軍主力攻略安達曼羣島，控制孟加拉灣，掩護陸軍在仰光上陸。(3)中國陸軍在盟國空軍掩護下，主力由滇西，一部由滇南，向緬北之敵攻击。(4)英美中聯合陸軍以主力渡清德溫江向斯威堡、曼德勒方向，以一部沿吉大港海岸向阿恰布、仰光方向攻击，另以一部在海軍掩護下由仰光登陸攻击敵人。

到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日，蔣介石命軍令部次長林蔚、劉斐及第一廳廳長張秉均同史迪威就反攻緬甸計劃進行談話，談話的主要內容為對泰、越、馬、緬方面的敵陸海空軍勢力的估計，中英美聯合軍反攻的目標；雙方一致同意對泰、越取守勢，對緬甸取攻勢；中國方面擬使用的兵力及部隊的選定；補給、交通、衛生等方面的整備等等。會談紀要送交蔣介石後，蔣介石批“可照談話結果積極準備進行，但留守滇省與昆明防守部隊必須增派一軍，尤其要增強昆明的實力，必須要有三個軍防守昆明，應即籌劃在第六戰區或第九戰區再抽一個軍限明年二月以前到達昆明”。從蔣介石這一批示，可以看出蔣介石和龍雲間矛盾的尖銳，同時也可以看出蔣介石早已蓄謀解決龍雲（關於此事，詳見第五輯杜聿明“蔣介石解決龍雲經過”一文）。

紧接着，軍令部于十一月二十八日頒发了一个关于“部署联合英美反攻緬甸作战計劃”的訓令，其主要內容如下：

1. 約以九个師团为基干之敌，分布于我滇西及緬泰越方面（滇緬五个師团，泰越各两个師团），有待机扰滇犯印的可能。英美盟軍及我駐印軍正在印境加紧整备，适时与国軍协力規复緬甸。

2. 国軍以联合英美反攻緬甸、恢复中印交通之目的，应于英美由印发动攻势时，先行攻略騰冲、龙陵，整备态势，尔后向密支那、八莫、腊戍、景东之綫进出，保持主力于滇緬公路方面，与印度盟軍协力歼灭緬北之敌，会师曼德勒。作战准备須于明年（一九四三年）二月底以前完成之。

关于国軍的部署概略如下：甲、滇西方面：（1）以三个軍又一个師沿滇緬公路及其以北地区攻略騰冲、龙陵后，以一部分向密支那、八莫，主方向畹町、腊戍方面攻击前进。（2）以一个軍沿滇緬鐵路便道协同主方向腊戍方向攻击前进。（3）以一个軍沿車里、佛海大道及双江、猛脑道协同主方向雷列姆、景东前进，威胁敌之側背。乙、滇南方面以三个軍守备国境。丙、桂南方面以一个軍守备国境。丁、昆明方面以两个軍担任防守。

3. 滇西方面的后方勤务，应由后方勤务部部长派定专員負責，并加强其机构；关于兵站的設施，应使野战軍于騰冲、龙陵、滾弄、打落間地区会战时补給圓滑，同时并須准备向八莫、腊戍、曼德勒、雷列姆、景东各方面分別延伸設施，能适应时机补給而无遺憾。

除上述大綱外，还写有方針、指导要領、兵团部署、航空及防空、交通通信、兵站整备要領等項較为具体的办法。

关于兵团部署方面，是以我所指揮的第十一集团軍为进攻部队的主力，其部署的重要內容如下：

1. 第十一集团軍以第二軍、第七十一軍、第九十三軍及預备第二師与怒江西岸的游击部队編成。

2. 第二軍应由双虹桥、馬料鋪附近渡河，依預备第二師的协力，一举攻略騰冲，尔后扼守騰冲以西諸要隘。

3. 第七十一軍应由惠人桥附近渡河，一举攻略龙陵，尔后扼守放馬桥附近要隘。

4. 第九十三軍随第一綫攻击部队的进展，适时向龙陵附近推进。

同时另派第三十二軍以一部向龙陵、芒市間游击及破坏交通，并对滾弄附近之敌严密監視。

第十一集团軍攻取騰冲、龙陵后，应先扼守龔宋关、放馬桥之綫整頓态势，尔后依左述之部署行动：(1)預备第二師以主力向密支那，一部向片馬、拖角攻击前进。(2)第二軍向八莫攻击前进。(3)第七十一軍、第九十三軍先向畹町进出，尔后向腊戍攻击前进。另派第三十二軍驅逐滾弄附近之敌人后，协同第十一集团軍主力向腊戍攻击前进。另派第六軍以主力由双江附近渡过薩尔温江向雷列姆方向攻击前进，以一部于攻略景东后，向泰国严密警戒。

軍令部策定這項計劃后，第二軍王凌云部(下轄第九師、第七十六師、新編第三十三師)随着其主力由泸州經昆明，其一部(七十六師)由西昌到祥云，开入滇西。第三十二軍及九十三軍，因第六战区及第九战区坚持不放，并未按照計劃进行，这两个軍始終沒有开入云南。

重庆軍委会軍令部和后勤部曾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电召第十一集团軍參謀长車蕃如及滇西地区的补給司令(当时称为兵站分監)李国源到重庆开会，就軍令部所作的反攻計劃进行了較为細致

的研討。

这个反攻計劃原定于一九四三年夏季开始实施，但因英美絕大部分陆海军用在欧洲戰場，不能抽出必要的兵力，而中国方面关于兵力的集結，装备的充实（尤以炮兵很缺乏）及后勤設備等，亦均未准备就緒，因而延期实行。

## 五、成立司令长官部和装备美械

一九四三年四月，蔣介石命令成立“远征軍司令长官部”并調陈誠为远征軍司令长官。随着，陈誠带了一大批人員来到云南，設立他的长官部于楚雄。陈誠原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并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第六战区的作战地境是湖北的西北部及湖南的西部地区，負有拱卫重庆政府的責任。陈誠去云南后，第六战区和湖北省政府仍由他負責，只是由他分別派人暫時代理。当时在云南方面並沒有設立这种所謂“远征軍司令长官部”的必要。因为滇西地势多是崇山峻岭，主要交通綫只有一条滇緬公路，同时滇西地区人口較少，物产不丰，粮食的筹补运输也有困难，所以这个地区是不适于大兵团作战的。敌人也只有一个多师团的兵力扼守怒江西岸各要点。我方以三至四个軍組成一个集团軍，充实他們的装备和必要的炮兵，并輔之以空軍的支援，尽可实施反攻的任务。原来軍令部所策定的方案，比較合情合理，为什么又突然要設立这个远征軍司令部呢？主要原因是：

1. 陈誠的好抓权。陈誠自一九二九年当第十一师师长，到一九三〇年当第十八軍軍长起就开始抓权。直到一九四六年他充当国防部參謀总长，在这将近二十年的时期中，他依仗蔣介石对他的信任，使用种种卑劣手段，排斥异己，吃掉了許多的部队而使之“十八

軍化”，也就是拚命扩大陈誠系的力量。蔣介石通过史迪威和美国方面洽商，决定給予蔣介石政府以十二个軍(三十六个师)的美械装备，而当时拟定要装备的軍隊，大多在云南。喜欢抓权的陈誠是絕不会輕易放弃这样一个好机会的。

2. 蔣介石的私心和对龙云的控制。蔣介石用人的标准第一是亲戚，第二是同乡，第三是学生。而他真正給以軍权的，主要还是亲戚和同乡。开入云南这样多的部队，又加以要美械装备，蔣就觉得非他真正的心腹来負責不可。一九四三年冬陈誠病重不能繼續干下去了，蔣才无可奈何地派卫立煌接替陈誠的职务(卫立煌正是由于蔣介石对他的不信任才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职务撤消下来的)。同时蔣介石和龙云間充滿着尖銳的矛盾，最害怕龙云有异图，动摇他的統治。設立这样一个长官部，又派陈誠来担任司令长官，将楚雄以西所有軍隊的指揮权从昆明行营的系統分割出去，即所以削弱龙云的势力。而司令部又設在昆明附近的楚雄，更能就便控制龙云。

关于美械装备的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实施美械装备的部队計为：第二軍、第五軍、第六軍、第八軍、第十三軍、第十八軍、第五十三軍、第五十四軍、第七十一軍、第七十三軍、第七十四軍、第九十四軍。

以上共十二个軍，内中可能有一两个軍的番号与当时的实情不符，尙待查証。

每軍成立一个榴弹炮营，每营配备 10.5 公分的榴弹炮十二門；每师成立一个山炮营，每营配备 7.5 公分的山炮十二門；每个步兵团成立一个战車防御炮連，配备战車防御炮四門；每个步兵营成立一个迫击炮排，配备“八一”迫击炮两門；每个步兵营成立一个火箭

排，配备“伯楚克”式的火箭筒两具；每个步兵营的重机枪連配备重机枪六挺；每个步兵連配有輕机枪九挺，“湯姆森”式手提机枪十八支，“六〇”迫击炮六門（每排两門）及火焰放射器一个。每个軍部和每个师部都配备設備完善的野战医院一所。自軍师至每个营連都配有完整的通訊設備，包括有綫电话和无綫电报話两用机等。其他还有工兵器材和运输工具等等。可以看出，这和国民党軍隊原来的装备比較起来，是要完备得多，尤以火力方面更是大大加強了。

听说还有一些部队，如卢汉所屬的第六十軍，关麟征所屬的第五十二軍，都是半美械装备，内容如何，我不大清楚。

关于这些美械装备如何配发到部队，何应欽的軍政部和美国人方面有过一番尖銳的爭执。軍政部方面說，所有中国軍隊的装备和发交的办法，是属于軍政部职权范围的事情，美国應該将全部装备交軍政部处理。美国人方面則认为这些装备应尽速地送交部队，使部队官兵学会使用这些兵器，俾能早日完成訓練，准备反攻。他們认为軍政部的工作效率低，因而坚持不肯交軍政部接收。双方各执一辞，爭論不休，最后經蔣介石同意由美方直接送交各軍师接收，并由各軍于接收后将各項装备数量报軍政部备查。

美国人方面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做呢？除了主要的是史迪威对軍政部深为不滿，认为軍政部腐敗，工作效率太低（后面还将談到）；此外，可能还有一种較为深远的用意，就是想以此討好各級干部，使这些干部对美国发生好感，甚至发生直接联系；这是帝国主义者的一貫手法。

## 六、軍委会駐滇干訓团和兰姆珈訓練学校

有了美械装备，就得請美国人来对干部进行教育。因此蔣介



石于一九四三年四月在昆明設立了“軍事委員會駐滇幹部訓練團”(隨後又將大理的“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改名為“駐滇干訓團大理分團”,前已叙及)。

駐滇干訓團由蔣介石兼任團長,龍雲、陳誠兼任副團長。頭一個時期陳誠經常住在團內實際負責。擔任教育長的,先後有杜聿明、關麟征、黃杰、梁華盛四人。

干訓團的地址設在昆明的北較場營房里,先後舉辦過步兵訓練班、炮兵訓練班、工兵訓練班、通訊訓練班、戰術訓練班(又稱參謀訓練班)。步兵訓練班和參謀訓練班設在昆明近郊的黑林鋪,炮兵訓練班設在昆明附近的干海子;其餘設在北較場營房。

這個團訓練的對象為部隊副團長以下的營連排級幹部。除炮兵外,按所屬兵種分別到步兵、工兵、通訊各訓練班受訓。參謀人員和團附或營級幹部入參謀訓練班(即戰術訓練班)。炮兵訓練班是將各軍的炮兵營全部官兵調來昆明裝備(當時有許多馱炮的騾子,系在印度買的,由美機裝運到昆明),一直到訓練完成後才歸還各軍建制。

訓練時間除炮兵外,一般均為六個星期。依據當時的交通條件,每個班隊凡報到滿一百人即開始訓練,訓練六個星期即結束;所以幾乎每個星期甚至三五天就有一批畢業的。

訓練的方法是根據各個兵種的情形決定。占主要地位的步兵訓練班,都是第一、二周為兵器訓練,使受訓者了解各項兵器的名稱性能並善于分解結合;第三、四周為射擊訓練,使受訓者善于使用各種兵器來發揚火力;第五、六周為戰術訓練,通過沙盘教育和班排連的實兵指揮,使受訓者了解如何確實掌握和運用自己指揮的隊伍以發揮戰鬥力量。

通过这样的訓練方式,在一九四三、一九四四两年中先后訓練約达一万人,内中包括一部分士兵。

另外在大理分团內还办了一个軍医人員訓練班,也是將部队中的医务工作者輪流調訓,訓練期也是六个星期,先后約有四百多名的医务工作人員在这里毕业。

兰姆珈訓練学校也是一九四三年在兰姆珈設立的。兰姆珈位于印度加尔各答西北方約二百多公里,英国人在那里修建了一所相当大的营房,駐印軍总指揮部和新編第二十二师都駐在这里。除駐印軍的干部輪流入这个学校受訓外,在中国境內受美械装备的十二个軍的軍师团級干部,都要到这个学校来受訓。这些軍师团級干部先到昆明干訓团报到,然后一批一批地搭乘美国的飞机越过喜馬拉雅山到达印度的列多,再乘火車前往兰姆珈。在兰姆珈訓練学校受訓的时间也是六个星期,訓練的内容和方法 and 昆明的步兵訓練班基本上是一样的。

在昆明、大理和在兰姆珈所办的多种訓練班所进行的訓練,几乎所有的教官都是美国人。在行政管理方面,原来美国人是打算直接控制,因言語不通,又找不到这样多翻譯,才把管理的任务交中国人負責。

## 七、美国人和英国人

自一九四一年美国人陈納德組織一个自称为飞虎队的志愿空軍駐在昆明起,随后这个志愿空軍又改組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扩大了它的組織,拥有昆明、霏益、陆良、洋街(在嵩明县境內)、云南驛(在祥云县境內)五个空軍基地。一九四二年史迪威的司令部一部分工作人員也来到昆明。到一九四三年,美国人就来得更多了,

有办理后勤的大批工作人员,有修路的工程队,有派到各集团军担任联络的参谋人员,有派到昆明干训团担任教学的大批教官,有派到各军师野战医院工作的大批医务人员,还有美国的外交人员,新闻记者、拍摄电影者,……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东自霭益,西至保山,美国的卡车、吉普车,川流不息地奔驰着。昆明金碧路、正义路、南屏街等几条大街开设了好些专供美国人吃喝玩乐的跳舞厅、咖啡馆、电影院、西餐馆。在几条主要的街道上,有许多商店里都是美国货,各种衣料、化粧品、玻璃丝袜、尼龙手提包、香烟盒、牙膏、牙刷、巧克力糖、口香糖、香烟、白兰地酒……真是应有尽有。这个祖国西南边陲的重镇,简直就变成了美国人的殖民地了。

“发财”,是美国人的最高信条,他们到任何地方都不会忘记。抗战到了一九四三年,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弄得物价飞涨,币值低落,许多人都在极端穷苦情况下生活着。而官僚买办阶级都很快就和这些美国佬勾结起来,利用美国空运援华物资的便利,把大量的外国货从飞机走私运进来。在史迪威司令部有一个后勤司令(忘其姓名)利用他的职权专干这些勾当。他不仅运货,而且大做其黄金买卖,经常用子弹箱换装上印度的金币——“托拉”,运到昆明来大赚其钱。他的姪儿是个宪兵,在飞机场执行检查任务,这就给他走私以更大的方便。也许他们内部分赃不均,有人向史迪威告密,史迪威命宪兵队长严密调查。有一天,宪兵队长来到机场,当一架运输机降落后,看见那走私宪兵搬着一个木箱装上吉普车立即开跑,宪兵队长马上开车追去,一直追到那位后勤司令的公馆。宪兵队长盘问那个宪兵箱子装的是什么,那宪兵吓得脸无人色,吞吞吐吐地说是子弹。宪兵队长打开来一看,原来是一整箱耀眼的黄金——“托拉”。这样,那位后勤司令就不得不被押解回国

了。这件走私案一九四三年曾經在昆明轰动一时，然而也不过只是千千万万件中的一件而已。美国佬发财的窍门很多，还和昆明的商人勾結起来套购外汇，买卖美鈔黄金，投机倒把，以及盗卖軍用物資等等，更是层出不穷。

“女人”，“享乐”，是这些美国佬的第二信条。在昆明有一批坏蛋，利用人民生活困难，专替美国佬物色一些中国的妇女供他們淫乐。离昆明北面有一座山，名字叫做“金殿”，听說是明末招引清兵入关、扼杀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大汉奸吳三桂的爱妾陈圓圓修建的。在这个殿的周围有茂密的树林，成为这些美国佬淫乐的場所。他們在白昼用吉普車裝載妓女来此，还不能滿足兽欲，更要到处乱闖，乱找女人。在咖啡館、跳舞厅，为了爭夺女人而打架的事經常发生。有一次，一个在步兵訓練班当助教的美国少尉，在黑林輔的一家酒店里硬要一个中国軍官給他找女人。那中国軍官感到侮辱，向他申斥了几句，美国少尉就开枪打伤了中国軍官。强奸妇女的事，經常发生。其中尤以六个人輪奸华侨符瑞生的妻子，令人发指。华侨符瑞生原在緬甸經商，因仰光陷落，率眷回国，在滇西的下关做点小买卖維持生活。有一天他和妻子向一輛美国的大型吉普車要求搭車前往昆明，那些美国人（共六人）滿口答应，等到符妻刚刚上車，車子就飞快开走，开到祥云东边一座大山的天子庙附近时，六个美国佬拖着符妻走进树林，实行輪流强奸。这些傢伙的兽性发洩后就开着車子一跑了事。符瑞生当自己被撇下的时候，知道事情不妙，連忙另搭上一輛車向前追赶，赶到天子庙发现他的妻子已被美国佬强奸得只有奄奄一息了。随即将她扶上汽車送往昆明，在甘美医院住了两个月才好。当时在国民党的压力下，知道的人不敢声张，至于那些地方官吏更是一切仰美国人的鼻息，更談不上什么追究。

符瑞生夫妇唯有忍气吞声而已！

在这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当中，不能說个个都是坏蛋。他們的社会成份是各种各样的：有职业軍人，有資本家，有商店職員，有大学教授，有中学教員，有工人，有农民，还有許多自由职业者——医师、會計师、律师等等。他們絕大多数都是由美国政府征召施行短期的軍事訓練和业务訓練后派到中国来工作的。在我的集团軍司令部負責整个集团軍医务工作的汉森上校，和我共事两年，对伤病兵的救治热情亲切，无论对軍人或滇西老百姓，絲毫沒有輕視和傲慢的态度。他从不胡鬧，甚至連一滴酒也不喝。象他这样老实規矩的人也是有的。

在远征軍司令部里担任联络參謀組組长的賓尔恩准将（現在台湾蔣帮任美国軍事顧問团团长的賓恩少将，依我推測可能就是这个人），可說是美国五角大楼的一个典型代表人物。他出身于美国的西点軍校，具有浓厚的軍国主义思想。一九四四年在云南保山，他就对我說：“打敗希特勒德国和日本，只是時間問題了，今后世界問題的重心，就是要認真地对付俄国人。”他又說：“拿破仑和希特勒进攻俄国都失敗了，要認真研究他們失敗的經驗。俄国的气候严寒是一个特点，在装备上必須适应这种情况。”他处处表現白种人的优越感，瞧不起中国人。有一次我和他同坐一輛車由保山去惠通桥，他对我說：“这些地方多穷啊！”在开会时，他总是喜欢夸耀美国的物質力量。同时这个傢伙也显得十分狡滑，常常說过的話不承認，答应办的事情又不办了。

当时在远征軍的系統里，自远征軍司令部至各集团軍、軍、师、团，都派有美国人，名称都是叫做“联络參謀組”。每个步兵团有一个中上尉級的軍官和一至两个軍士，带有无线电报話机一部。軍

部或师部的联络组，一般是六、七个人，为首的是中少校军官。在第十一集团军和二十集团军总部的联络参谋组，每组都有二十多人。第十一集团军的联络参谋组组长是吴德上校，第二十集团军的联络参谋组组长是康德上校。自集团军至军、师、团，他们都自己配带无线电机，在集团军总部还有一部雷达机，专供对空联络之用，经常用一块帆布包着，由一个少尉专负责严密保管，不让中国人看见。在这些联络参谋中，真正的职业军人仍是少数。在各个野战医院都有不少的美国人在工作着，内中有好些是在美国的中国人。他们虽然知道他们自己是中国人，可是他们却很少有人能说中国话。

这许多美国人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十分喜欢战利品，凡属从日本人身上得来的东西，那怕是一个水壶或一顶帽子，他们都拼命地追求着，常常拿自己抽的香烟、吃的糖果或其他用品向前线的军官和士兵们去交换战利品。有一次我把前方部队缴来的一把日本军刀送给吴德上校，他简直高兴得跳起来。尤为有趣的，在一九四四年七月间我们住在龙陵附近的廖家寨，那时正值雨季，经常下着大雨。有一天四架日本的飞机给困守在松山的部队投送弹药，因天气恶劣找不到松山，就在上空兜圈子，当时我们以为是自己的飞机，就将对空联络的布板打开，有两架日本飞机没有看清楚，立即投下了四个降落伞（随即他发觉投错了，就没有继续投）。在我司令部的二十几个美国人高兴极了，把四个降落伞全要了去，每人分一块保存着。我曾问过几个美国人为什么这样喜欢这些东西，他们都是异口同声地说：“我拿回去挂在家里的客厅里，请亲友来参观，这将是我最光荣和最愉快的事。”

这里再谈谈史迪威。

我和史迪威曾經見過四、五次，有兩次談話，給我的印象較為深刻。一次是在一九四二年的春天，他住在昆明西門外農業專校的樓上，我是和關麟征同去看他的。這次談的多側重於國際形勢的分析，他對於戰爭前途是樂觀的。另一次在一九四三年的春天，我和他都在昆明，他約我去談談。首先他向我了解滇西戰場的一般情況，接著就對重慶的國民黨政府說了許多批評的意見，政府機關腐敗無能，行政效率很低，物價飛漲，人民生活痛苦等等。隨後當我提出軍政部對兵員補充器材補給異常遲緩等情形時，他立即從座位上跳起來，把右手一甩，用中國話大聲地說：“壞透了！壞透了！太腐敗了！太腐敗了！”接著他舉了好些事實對軍政部進行了尖銳批評。他說：“美國送給中國的大批物資，是美國納稅人出了錢的，一交到你們的軍政部就公開盜賣，如藥品、電訊器材等，街上都可買到。你們的政府這樣糟，怎能爭取戰爭的勝利呢？這叫羅斯福總統怎樣對美國人民說話呢？”

一九四二年七月我在保山的時候，有一個英國大使館的副武官柯勒克上校由重慶跑到保山來看我。我請他吃了一餐飯，並問他到滇西來幹什麼，他含糊地說，他只是想來了解一下滇西戰場的情況，並沒有具體任務。我當時也信以為真。到是年的十一月我在大理（那時集團軍總司令部設在大理）的時候，他又來了，並且帶了一個端納少校同來。他對我說：“英國駐印度的總司令部很希望和貴集團軍建立聯繫，交換關於緬甸日軍活動的情報，英國政府已向貴國提出在大理設立一個聯絡站，今後就由端納少校負責，請宋將軍多予協助。”我隨即打電報向重慶軍令部詢問，軍令部復電說，我國已同意英國在大理設立一個聯絡站。這樣，這位端納少校就在大理住下來，不久他的妻子也來了。隨後我才知道這位端納少校并

不是英国的正式軍人，原来他是在騰冲海关的一个稅务人員，在騰冲呆了三、四年，对滇緬边区情况相当熟悉，騰冲被日軍侵占后，他逃到重庆，英国政府給他以少校軍銜，派来大理工作。約半年之后，才发觉这位端納少校并不是来收集緬甸日軍活动的情报，至少可以說这不是他的主要任务。原来他是被派来进行間諜活动的。我的司令部里有一个姓李的緬語翻譯員（想不起他的名字，是个在緬甸的华侨，云南人），端納常送錢給他用，叫他聯絡司令部里的一些參謀，向他們了解我軍对緬甸（尤以緬北地区）的企图，我方和那些緬甸人有联系，我方有无派人到緬甸去进行活动，以及滇緬边境各土司的动向等等。有位參謀怀疑这个姓李的的活动越出了他工作的范围，向我彙报了这情况。經我派人調查，才得悉上述这些情形。当时为了保持同盟国的友好关系，沒有揭露这件事，只是在内部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一九四三年三、四月間柯勒上校又来到大理，对我說：“英国駐印軍总司令部派了一个旅約二千人，已在緬北地区用降落伞投下，准备在这个地区进行游击，希望貴軍在騰冲的部队和他們取得联系，并給予协助。”我当答应照办。經過两三个月之后，才发现事实是这样的：英国确曾用降落伞投下三、四百人于密支那东北地区，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英国豢养了多年的緬甸人，他們并不是要在那个地区进行什么游击活动，他們是执行一項政治任务，就是要尽力防止中国軍隊和緬甸人間的联系，恐怕緬甸人傾向中国，因而动摇它在緬甸的殖民統治。这充分地說明英帝国主义是如何处心积慮地想在战后仍然維持它在許多地方的殖民統治。英国在緬北降落的几百人，被日本軍隊发现后进行搜捕，有些被日軍打死，有些被俘，約有百余人退到騰冲和緬甸的边境。当时在騰北地区的三十六师派了一部分兵力去接应他們，把他們



从日軍胁迫下救出来，以后并把这些入交柯勒克上校接收了。英国政府以后曾贈給三十六师师长李志鵬及一些官兵勳章奖章。这个柯勒克上校曾在中国住了二、三十年，对中国的社会情况相当熟悉。他曾說他和张宗昌賭过牌九，会唱一些低級趣味的小調，中国話說得相当好。他是英帝国主义者长期培养出来在我国进行間諜活动的。

## 八、反攻的勝利和勝利的因素

### 1. 反攻前的情况

远征軍方面：第十一集团軍所轄的七十一軍(軍长钟彬)在滇緬公路正面，除一部分扼守怒江外，大部分集結在保山的蒲漂、由旺、施甸等地；第六軍(軍长黄杰)所屬的預备第二师在漕澗，一部分在騰北地区游击，所屬的新編第三十九师在永平、下关一带；归集团軍直轄的三十六师在大理、邓川一带；集团軍总司令部在大理。第二十集团軍(总司令霍揆彰)所轄的第二軍(軍长王凌云)在順宁、鎮康、三江口一带；所轄的第五十三軍(两个师，軍长周福成)在弥渡一带；集团軍总司令部在弥渡。远征軍司令长官部在楚雄，归长官部直轄的五十四軍(軍长闕汉騫)在祥云。五十四軍原轄十四、五十、一九八师共三个师，一九四四年春第十四师和五十师均空运印度，分別归入新一軍、新六軍的建制，这时，五十四軍实仅剩軍直屬部队及一九八师。

駐印軍方面：由史迪威所指揮的駐印軍——新編第一軍(軍长孙立人)和新編第六軍(軍长廖耀湘)于一九四三年冬开始由印緬边境向东修筑中印公路，一面向前攻击，一面修路，于一九四四年春已进入緬甸境内。

敵軍方面：日軍第十八師團在密支那及其西北地區，第五十六師團全部、第二師團和三十三師團的各一部在滇緬公路綫上各要點騰冲、龍陵、松山、平戛、芒市、遮放、晚町等地，利用地形，構築半永久性工事；日軍之三十三師團主力在曼德勒附近，其他情況不悉。

## 2. 反攻滇緬邊境的戰鬥

反攻滇緬邊境的戰鬥分為三期，分述如次：

第一期——強渡怒江：遠征軍為策應駐印軍攻擊密支那，打通中印公路，以第二十集團軍為攻擊集團。這個集團以第五十三軍（轄一一六師、一三〇師）、第五十四軍（轄三十六師、一九八師）及第六軍的預備第二師組成，由栗柴坝、雙虹橋間渡河，以騰冲為攻擊目標。另以第十一集團軍為防守集團，這個集團以第七十一軍（下轄第八十七師、第八十八師、新編第二十八師）、第二軍（下轄第九師、第七十六師、新編第三十三師）、第六軍（欠預備第二師）組成，負怒江東岸防守之責。又以新編第三十九師、第七十六師、第八十八師各派一個加強團渡江攻擊，以策應第二十集團軍的攻擊。所有擔任攻擊的部隊，均應於五月十日完成一切必要的準備。

第十一集團軍所派的新編三十九師一個加強團，五月十一日在惠通橋上游附近渡河成功，十二日攻占紅樹木。又七十六師、八十八師組成的兩個加強團，五月十二日分由三江口、攀枝花渡河，會攻平戛，殲滅敵軍百餘人。十三日殘敵突圍，竄往芒市。

第二十集團軍的右翼第五十四軍的一九八師於五月十二日由栗柴坝渡河，其五百九十三團於十六日迂迴攻占橋頭、馬面關，一九八師主力圍攻北齋公房，敵軍的一四八聯隊凭險死守。左翼五十四軍的三十六師雙虹橋附近渡河成功，經過激烈戰鬥，傷亡甚重，繼以五十三軍渡河增援，於十四日攻占大塘子，乘勝追擊，越過了高黎

貢山，進抵瓦甸江、直街以東之綫。

第二期——圍攻據點：渡河攻擊各部隊奏效後，軍委會鑑於我駐印軍之一部已開始攻擊密支那，判斷敵軍難於短期內調動大量部隊增援滇西，遂下令遠征軍應迅速攻占騰沖、龍陵，與駐印軍會師緬北，打通中印公路，即以主力渡河擴張戰果。遠征軍長官部隨即變更部署，以第二十集團軍配屬預備第二師為右集團軍，攻擊騰沖，第十一集團（欠預備第二師）為左集團軍，攻擊龍陵、芒市，並限第十一集團軍各部隊於五月底以前完成攻擊準備。兩集團的戰況如下：

右集團於六月初以預備第二師渡河接替一九八師橋頭、馬面關防務，俟一九八師以全力攻克北齋公房及大塘子後，第三十六師即經北向瓦甸前進，準備進攻瓦甸。六月九日敵軍反扑，突破我橋頭、馬面關陣地，並與困守北齋公房之殘敵取得聯絡。當命三十六師以一部監視瓦甸之敵，以主力北援橋頭，第一九八師、預備第二師，第三十六師協力於六月十四日攻克北齋公房，十六日再克橋頭、馬面關，殘敵分向明光、瓦甸逃竄，預備第二師先後攻占明光、固東街，於六月底進抵騰沖城郊的西北地區。第三十六師於六月二十日攻克瓦甸，六月底亦進抵騰沖城郊的東南地區，準備會同預備第二師攻擊騰沖。又第五十三軍於六月二十日攻占直街，隨即尾敵前進，亦於六月底進抵騰沖附近，準備攻擊。

左集團的右翼部隊為第七十一軍并附新編第二十九師，於六月一日由惠通橋、三江口間地區渡河，六月四日新編第二十八師攻克腊猛街，進圍松山敵軍五十六師團一一三聯隊的堅固據點（松山敵陣地工事很堅固，所有機槍掩體及掩蔽部均能抵抗重炮彈）。第八十七師渡河後，其一部於六月九日攻克鎮安街，其主力及八十八

师于六月十日攻占龙陵,旋敌军由芒市增援反扑,七十一军于六月十六日退据龙陵东北郊与敌对峙,并令新编第三十九师由龙江桥南下掩护右侧。七月初旬第八军(军长何绍周)的荣誉第一师主力开抵龙陵附近增援(反攻开始时,第八军由昆明向滇西移动,归远征军长官部指挥,成为长官部的总预备队,第八军辖荣誉第一师、第八十二师、第一〇三师),于八月中对龙陵开始第二次围攻。左集团的左翼部队第二军于六月上旬渡江,以七十六师的一个团于攻占平戛后掩护军的左侧,其余向象达、芒市前进,第九师于六月二十四日攻克象达,续向芒市前进,第七十六师主力于八月上旬攻占放马桥,截断敌人龙、芒间的公路交通。

第三期——攻克要地:右集团于七月初以预备第二师一一六师攻迫腾冲城垣。八月上旬,一一六师、三十六师、一九八师、一三〇师先后加入攻击,由于敌军凭坚固工事顽抗,伤亡甚大,攻击进展迟缓,到九月十四日才完全攻克腾冲,守敌全数就歼。

左集团的右翼部队第七十一军主力及荣誉第一师、新编第三十九师的各一部围攻龙陵,九月上旬第五军之二百师由昆明增援,迂迴攻击敌军龙、芒间联络线。至十一月三日攻克龙陵,向芒市前进。左集团的左翼部队第二军自八月上旬起围攻芒市,敌凭借其坚固工事据守,攻击进展较缓。至十一月,得七十一军第六军两部的支援,协同攻击,于十一月二十日攻克芒市。七月间围攻松山的七十一军新编二十八师,将攻击任务交第八军接替,敌凭强固工事顽抗,攻击进展迟缓,伤亡甚大,直到十月间第八军竭尽全力攻克了松山,尽歼守敌。

第四期——会师芒友:敌军因兵力不足,遂采取逐次抵抗部署,除其第五十六师团外,曾以第二师团的第十六联队、第二十九联队

及三十三师团的一一九联队交互支援，掩护撤退。第十一集团军于攻克龙陵、芒市后，以七十一军、五十三军的主力及第二军的一部及第二百师向遮放追击，十二月一日克遮放，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克畹町，一月二十二日五十三军与驻印军的新编第一军先头部队取得联络，一月二十七日远征军与驻印军正式会师于畹町附近的芒友。至此，中印公路完全打通。数以千计的载重汽车，装载着大批物资，通过这条牺牲数万士兵的鲜血所构成的中印公路运入内地。

一九四四年远征军和驻印军在滇缅边境及缅北所进行的反攻，是一个胜利的战争。日军第十八师团、第五十六师团全部歼灭，其第二师团、第三十三师团亦损失甚重。日军费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在缅北地区及滇缅边境利用地形，择要构筑坚固工事，加上日本军国主义者平时在部队中所施行的“武士道精神”的教育，在战争时真正做到了战到最后一人，因而这场战争是艰苦的，牺牲是很大的，单是远征军方面，死伤人数即达四万多人。

关于这次反攻所以能够获得胜利的原因，在一九四五年一月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有所论述，归结于：1. 滇西人民的支援；2. 官兵的坚强斗争意志；3. 同盟国的协力。这篇文章曾发表在当时重庆的《大公报》、《扫荡报》上，特再简要说明如下：

1. 滇西人民的支援：这场反攻战争，先后参加作战的官兵达十六万多人，吃饭是个大问题。当时绝大部分的粮食是由滇西老百姓拿出来的，从昆明方面运济的只有很少一部分。有了粮，还得送到部队所在地去，同时打仗还需要大批的弹药来补充。滇西仅有一条滇缅公路，其他地方都不能通行汽车和大车。尤以战争是在怒江西岸进行，而怒江两岸全是崇山峻岭，道路崎岖，有些小道甚

至連驢馬都不能通行，完全依靠人力挑運。好些地方沿途沒有村舍，食宿都成問題。當時投入這場運輸任務鬥爭的滇西老百姓，至少有二、三十萬人。尤以為軍隊直接運送糧食、彈藥、傷兵的幾萬民伕，真是辛苦萬分。糧食在名義上是征購，當時重慶軍委會確也拿出來了一筆購糧款，但通過地方政府的層層剋扣，老百姓到手很少；運輸雖按照規定付給一定的運費，但經過層層的盤剝，民伕所得工資也很微薄。但是老百姓都忍受了這一切，因為他們知道對日本帝國主義打仗是一場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只有把日本強盜消滅了或趕出國土，才能安居樂業。所以他們一方面忍受痛苦，一方面以極大的熱情來支援這一次的反攻。這是這場戰爭所以獲得勝利的決定的因素。

2. 官兵的堅強鬥志：自開始反攻到戰爭結束，軍隊始終保持着旺盛的士氣。在極端困難的地形，向築有極堅固的據點的敵人施行攻擊，傷亡累累，但是官兵前仆後繼，奮勇直前，決不退縮。六月至九月上旬是滇西雨季時期（六月下雨二十天，七月、八月每月下雨都是二十二天），經常大雨滂沱，雲霧低壓，不僅道路泥濘難行，且影響空投及後方的補給。有一時期每天只吃一餐飯，有幾天有些部隊只好掘野菜剝樹皮以充飢。在這樣惡劣天氣和補給匱乏的情況下，沒有一個部隊的官兵有過怨憤的話。八月間我在龍陵東北的尖高山一所廟里，觀看第八十八師的部隊向據守老東坡堅固據點之敵施行攻擊，用坑道作業迫近敵人，然後用炮火摧毀敵人的工事和壓制其機關槍的火力。英勇的官兵們一舉突擊，緊接着便是陣地內的白刃戰和掃蕩戰。喊殺聲、手榴彈的爆炸聲以及急促的手提機槍的射擊聲，交織在一起，形成了戰爭白熱化的最高潮。當時在場的美國聯絡參謀組組長吳德上校對我說：“中國軍隊耐受

困苦的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的确，官兵們所以有这样旺盛的士气，这样坚强斗争的意志，这样愿意忍受恶劣气候和給养匮乏的痛苦，主要是他們認識到所参与的战争，是反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相反地，同样的军队，在解放战争期间，从事反人民的战争，从事非正义的战争，结果是很快就被人民解放军消灭得一千两净。

3. 同盟国的协力：当时所谓同盟国的协力主要是美国，有以下几项事实：（1）以相当数量的物资装备了部队，从而大大地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在作战时供应大量弹药。（2）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在滇緬战场上完全取得了制空权。（3）美军运输机常冒恶劣气候投送粮弹。（4）美军战斗机经常协助第一线部队的攻击，例如松山敌人的坚固据点，赖美机低飞投掷五百磅乃至一千磅的炸弹才得摧毁，在騰冲、龙陵的若干据点也是如此。

# 中国駐印軍始末

鄭洞國 覃異之

## 一、中国駐印軍的組織

一九四二年四月，中国远征軍在緬甸失敗，远征軍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惊惶失措，脱离部队，追随史迪威逃往印度。罗卓英所指揮的第五軍、第六軍、第六十六軍，大部都向云南边境潰退。第六十六軍的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奉命掩护英軍，并遵照史迪威的指示，由緬甸的提定以北地区向印度撤退。該师于五月中旬到达印度境内的英普哈尔。杜聿明率領的第五軍直属部队，及該軍的新二十二师，由緬甸的打洛、新平阳、經野人山向印度的列多（雷多）撤退，于八月初到达印境的迪不魯加尔。杜到印不久，即奉蔣介石电召回国，以后駐印部队由罗卓英負責整訓。史迪威到印度后，与英国駐印度当局接洽，决定以离印度边境較远的兰姆珈（加尔各达西北）作为訓練中国軍队的基地。撤到印境的軍隊，陸續向該地集結。同时史向蔣介石要求，营长以上軍官均由美国人担任，并且先由美国調来三百多軍官，准备接替中国軍官的职务。史迪威的这一企图，立刻遭到全体中国軍官的反对，甚至极端亲美的孙立人，当时也坚决反对。蔣介石也不同意，但为了緩和矛盾，将远征軍第一路司令官部撤消，成立中国駐印軍总指揮部，由史迪



威任总指挥，罗卓英任副总指挥，并成立副总指挥部。这样一来，那几百名准备来接替营长以上职务的美国军官，对史迪威不能兑现的诺言，也表示不满。一九四二年十月间，史迪威打电报给蒋，批评中国将领腐败无能，其中有：“罗长官终日绕室彷徨，对于军队之教育训练毫无办法”等语，并列举罗卓英的十大罪状。蒋被迫将罗调回，并撤销副总指挥部，把驻印部队改编为一个军，军长人选由中国派去；三百多美国军官，除派一部到昆明建立训练基地外，余分别派到驻印军担任各级联络官，有一部分在兰姆珈训练基地任教官及管理人员。史迪威企图通过联络官达到他控制中国军队的目的，付与联络官的权力很大。

驻印军军长的人选，蒋介石原打算派邱清泉；何应钦以邱的性情粗暴，可能与美国人闹翻，影响美援，乃向蒋建议改派郑洞国。郑于一九四三年春率军部人员赴印，成立了新一军。

## 二、编制、装备及训练

史迪威一贯坚持建立殖民地式的军队，主张“要中国兵不要中国官，尤其不要中国的高级官”。他对成立新一军本有抵触情绪，但既反对不了，只好用缩小军部编制的办法来削弱军长的作用。军部官兵共三、四十人，没有任何直属部队。关于部队的指挥、训练、人事、经理、卫生等权力，都集中到总指挥部。他给军部的任务，只是管理军风纪。新一军最初只辖新二十二师、新三十八师，每师步兵三团、炮兵一营（后来增加一营）、工兵一营、通讯兵一营、辎重兵一营、卫生队的一部和一個特务连（作战开始，新三十八师配属一个战车营）。每团步兵三营，迫击炮、平射炮各一连，一个通讯连，一个卫生队，一个特务排，全团约三千人。每营三个步兵连、

一个机枪连。每连三排,每排三个步兵班,一个轻迫击炮班。总指挥部的直属部队计有:炮兵三个团,每团重炮三十六门。汽车兵团有载重汽车四百辆,工兵两个团,化学兵两个团(后改为重迫击炮团),每团有重迫击炮四十八门,骡马辐重兵一个团,一个特务营,一个通讯兵营,一个战车训练处。此外有一个训练处,处长的权力很大,仅次于史迪威。驻印各部的补充兵,均由国内航空运去,士兵体质甚好。一九四四年初,由国内空运新三十师到兰姆珈接受装备和训练,归入新一军建制。一九四四年夏,蒋介石为了取得更多的美械装备,空运五十四军到印度,但史迪威只接受两个师,不接受军部。该军十四师及五十师空运到列多接受装备后,在缅甸战役中与原驻印军合并,扩编为新一军及新六军。郑洞国改任副总指挥,原军部改为副总指挥部。新一军军长为孙立人,辖新三十八师、新三十师、五十师。新六军军长为廖耀湘,辖新二十二师、十四师。车辆装备,各部队原有一定的编制,但凡是被美国联络官认为亲美的军官,可以多分配些。如孙立人部的武器、弹药、车辆等,总比廖耀湘部的既多又好。这样例子很多。

对于士兵的训练,通过各种训练场来进行,每个训练场均由美国军官负责。训练的分工很细,但动作却很简单。训练场可以容纳一定数量的部队,士兵轮流在各训练场接受训练。美国人把训练场当工厂,把士兵当原料。最初不要中国军官参加,由美国军官直接训练,后来因为中国士兵不听美国人的话,训练场秩序很乱,才不得不要中国军官负责管理(昆明训练基地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美国军官自恃有强大空军及炮兵,故对筑城作业及夜间教育不甚重视。

驻印军的给养均发实物,主要是罐头和面包。营养较国内好,

医药卫生很完善,疾病很少。更重要的是没有逃兵(逃兵是当时国民党部队的一个严重问题,由于国民党乱拉壮丁,部队中又克扣军饷、伙食,逃兵是无法避免的。“逃了补,补了逃”,永远练不完的新兵,战斗力就谈不上)。驻印军远离祖国,又受尽美国人的气,因而爱国思想比较浓厚,军官也随时抓机会进行爱国教育,所以官兵比较团结。“打回祖国去”,成了官兵一致的愿望。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美国那种只重训练技术、不注重也不可能注重精神教育的殖民地式的训练缺点。

### 三、作战经过概要

#### 攻击路线的选择和准备

中国驻印军必须配合中国大陆及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形势,重新打开中国大陆的供应线,以加强日益困难的物资供应,减轻空运的困难。因此,对于攻击路线的选择,具有战略上的重大意义,至少应考虑以下几个问题:(1)便于大兵团作战,尤其要便于发挥驻印军比较优良的重装备的威力;(2)能迅速进出缅北地区切断敌人的交通线,一举而向孟拱、八莫等要点攻击;(3)公路修筑比较容易,并且为尔后使用效率高的地区。但当时所决定的路线,从印度亚三省的列多(雷多)起,经大加卡崎岖绝径的野人山区,胡康河谷的新平阳(中缅未定界)南折至孟拱、密支那,迄八莫与滇缅路衔接。这条路线,从地图上看,似乎距离较近。实际上野人山是崇山峻岭、森林漫野、人迹不到的地方,只有蜿蜒于悬崖绝壁之间的羊肠小径可通。一到雨季,泥泞满道,蚂蝗遍地,跋山涉水,尤为困难。通过这一地区,要走十几天。修筑公路的困难很多,路修成后,雨季根本不能通车,使用率也很低。因此,在整个缅北作战期

間，完全依賴空運補給。其次胡康河谷、孟拱河谷，到處是原始森林，大小河流，縱橫交錯、形勢甚為險要，易守難攻。敵後方的交通便利，兵力轉運靈活。我方則背絕地以攻天險，困難可知。假如在列多以南英普哈爾地區選擇路線，無論如何要比列多線有利。當時所以選擇此線，可能有以下兩個原因：（1）英國一貫反對中國軍隊深入緬甸中南部，因為在英國看來，中國對緬甸的影響愈大，對於它以後控制緬甸愈不利；（2）史迪威及一些美國將領的用兵，很少考慮兵要地理，當我們和他們談到這條路的補給困難時，他們總強調有強大空軍支援，一切不成問題。他們這種思想，給以後在緬北的作戰帶來很大困難。

攻擊路線決定後，就為反攻緬甸作初步準備。一九四三年春，史迪威先後派出美國兩個工兵團和中國工兵第十團、第十二團作為基干的中美工兵部隊，在美國供應處的惠來少將與阿魯斯密准將的指揮下，開始修築列多及野人山區的中印公路。是年三月初旬，派新三十八師的——四團進出野人山區，占領掩護陣地。該團在人迹不到的野人山區走了十幾天才到達柏察海，並在卡拉卡迄大加卡之線占領陣地。當面之敵是十八師團——四聯隊的一部，集結於新平陽、于邦、孟關間地區，數度來犯，均未得逞。五月中旬，雨季開始，胡康谷地漸成泛濫；敵以補給困難，大部撤退。我——四團亦因過於疲勞，而以——二團接替。此外除少數斥候戰外，無大接觸。九月初旬，公路通到能陽附近（美軍工兵每月輪休一次，實際作業人員約七千人，每天進展不到兩公里）。——二團的警戒部隊亦推進到大沙坎及秦老沙坎之線。此時，除新三十師留蘭姆珈繼續訓練，新三十八師、新二十二師全部先後開到列多附近。十月底雨季停止，全軍奉命前進，胡康河谷的序戰由此展開，緬甸的

反攻战也从此开始。

### 胡康河谷战斗

胡康河谷是由打洛盆地及新平阳盆地組成,山高林密,河流纵横,雨季泛滥,有絕地之称。

敌军在胡康地区为十八师团,主力为步兵第五十五联队全部和第一——四联队的一部、炮兵第十八联队等,师团长是田中新一中将。敌军的编制着重加强炮火威力,全战役敌所使用兵力,步炮比例约为三比二。敌之最大长处为应战沉着,工事坚固,火力控制得宜,对一时一地之战机绝不放过,退却亦有条不紊。其最大弱点为滥施袭击,往往增加伤亡,对侧翼之警戒颇为疏忽,厌战情绪极为浓厚。

我军自一九四三年十月十日起,由史迪威下令进行攻占大龙河西岸各据点,掩护主力进出野人山的战斗。新三十八师各团准备进攻,十月廿四日分三路开始行动。十一月一日占领拉加苏高地。十一日敌人反扑,此后形成对峙态势,敌我双方均不断增援。我坚持战斗一月有余,至十二月中旬,新三十师主力和炮兵一部开到,予敌沉重打击,敌狼狽向东岸退去。至此,大龙河西岸各据点,先后被我攻破,取得第一次战役的胜利。

接着我新二十二师担任右路,向打洛攻击;新三十八师担任左路,沿新平阳至班腰卡之綫以北地区,向太伯卡及甘卡等地攻击。右路军于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渡过大奈河,沿左岸崎岖山区逐段开路前进,十四日进至百戕河北岸。敌军在百戕河南岸,沿大奈河占领障地。我军于二十二夜完成对敌包围圈,二十三日向敌猛攻。经过几天的激战,毙敌官兵约二百名。我军乘胜前进,三十一日占领打洛。左路军也在一月間先后渡过大奈河及大龙河,肃清

孟阳河的敌军,进占太伯卡及甘卡,夺取了敌人交通要点。我军在森林中开路奇袭敌人,收效很大。史迪威对于新二十二师、新三十八师的指挥权原来自己掌握,经此胜利,不得不还给该两师的师长。

二月五日,我军分数路前进,直追班腰卡以迄大宛河之线,新二十二师曾攀登三千呎以上的悬崖,分别进军包围班腰卡,敌向孟关方面退去。新三十八师在森邦卡西北地区,逐次围歼死守据点的敌军,毙敌三百余人,并进占茂林河以北的据点。孟关外围的敌军至此被肃清,随即展开围攻孟关的主力战和瓦鲁班的追击战。

二月二十一日,我新二十二师、三十八师仍分左右两翼,依大奈河、南比河相连之线为作战地境线,各在线以西及以东的地区向南攻击。战车也同时配合出动。另由美军一个支队(约步兵一团)在我军左侧前进,相机进取瓦鲁班。经过十几天的激战,我军攻克孟关,占领了胡康河谷敌军的心脏。但美军支队到达瓦鲁班附近小河东面,遭遇敌军两中队的袭击,就立刻叫苦求援。我三十八师一部经两昼夜的急行军,于三月六日占领拉干卡(瓦鲁班东北两公里),击退压迫美军的敌部。这时新二十二师主力已攻入孟关,两师合击,形成包围态势,更向瓦鲁班猛攻两昼夜,九日完全占领瓦鲁班及秦诺两据点。敌十八师团受创很重,还想顽抗。我军乘胜分路追击,肃清胡康河谷的残敌,三月十五日向间布本山隘进攻。十九日攻克这个天险,继续南进。二十八日占领高鲁场,二十九日进占沙杜渣。计自一九四三年十月底至一九四四年三月底已南进一百五十余公里,予敌十八师团严重打击,获大炮十五门,步枪七百八十余支,其他装备弹药很多。从此,孟拱河谷的门户被我打开。

## 孟拱河谷战斗

孟拱河谷是沿孟拱河两岸谷地的总称。孟拱城市位于水陆交通中心，有孟拱河、南英河作天然屏障，与密支那、卡盟互成犄角，是军事上的要地。每逢雨季，山地泥深过膝，平地一片汪洋，因此易守难攻，攻击部队的进行，到处都受阻碍；而守军却可选择高地构筑工事，利用河川，以逸待劳。敌为抗拒我军前进，以十八师团——四联队主力和新增援的五十六师团一四六联队全部布置在孟拱河谷，企图凭仗山川有利形势，逐次抵抗。

我军于四月四日部署进军，新二十二师、新三十八师经过十五天的激战，先后完全占领瓦康迄丁克林之线。此后新二十二师与敌相持于英开塘北方。五月三日，美军飞机三十六架配合作战，我军并由战车掩护向敌包围攻击，四日完全占领英开塘。同时，新三十八师以迂回渗透的战术占领东瓦拉、拉吉等地，又绕道奇袭，进占芒平。

敌军分别退至馬拉高以北和瓦兰及西瓦拉等地据点，頑强固守，以待雨季的来临。我军各师继续分别向南急进。担任公路正面攻击的新二十二师自五月五日至卅日，与敌激战将近一月，才进至馬拉高地区。新三十八师也围攻瓦兰半月才得占领。敌军又以第二师团主力增援，企图在卡盟附近与我决战。这时，雨季已到，我军不顾大雨淋漓，与敌展开搏斗。六月四日至九日，新二十二师歼灭敌十八师团的大部主力，前锋逼进卡盟。新三十八师偷渡孟拱河，五月二十七日奇袭色当地区的敌军，敌毫无戒备，伤亡数百。六月初敌增援猛烈反扑两次，均未得逞。我两翼协同猛攻卡盟，六月十六日完全占领。此役先后发现敌尸一千六百余具，估计敌死伤数不下五千，俘敌大尉以下官兵八十九名，各种火炮三十

門，步槍數百支，汽車二百餘輛。

這時英軍第七十七旅乘我軍吸引敵軍主力於卡盟期間，由左側出動進襲孟拱，不料遭遇敵軍的反擊，形勢危急。我新三十八師奉令解救，六月十八日到達孟拱東北的北岸，冒險用橡皮船連夜偷渡，二十日晨突擊敵軍的側背，挽救了英軍的危局。二十三日三面包圍孟拱，戰鬥兩晝夜，敵軍不支潰敗，殘部洶水脫逃，二十五日進占孟拱。我軍曾以一排兵力接替英軍一營的戰鬥任務，英軍頗為驚異。原來只有數十名敵軍牽制了英軍一營，而我軍一排就驅逐了敵人。事後英軍旅長親到我軍一一四團部，收集戰鬥資料作為參考，並表示感佩不已。至七月十一日由孟拱向密支那沿綫掃蕩敵人的新三十八師部隊，與密支那的新三十師會合，卡盟、孟拱、密支那間的公路、鐵路線暢行無阻，從而奠定了緬北勝利的局面。

### 密支那圍攻戰

密支那周圍多山，中間是一小平原，地形稍有起伏，遍地皆森林（幼年林），蔭蔽異常。城西北兩方，均有飛機場。它為緬北戰略上的要地。

敵自瓦魯班潰敗後，時感後路被切，因而對我軍在原始森林中開路前進的戰術特別重視，故於三月中旬由密支那派出部隊在雷班隘口及瑞里一帶警戒，待機出擊。

我軍新三十師八十八團、五〇師一五〇團及美國G字團（以上各部隊先後到達孟關、恩潘卡、太克利附近地區），曾於四月中旬奉史迪威命令，組織一先遣支隊，支隊長為米爾准將，第一縱隊長（簡稱K縱隊）開利生上校，第二縱隊長（簡稱H縱隊）漢得上校。四月二十九日由太克利出發，五月三日K縱隊到達南卡，H縱隊亦到達坡蓋卡。七日K縱隊開始對雷班攻擊，九日採取迂回，始將敵軍擊



潰，十日占領阿蘭機場。十四日，H縱隊到達密支那地區外圍地點的升尼，並在該地开辟一小型飛機降落場。K縱隊攻克雷班后，即向翁卡前進，于十二日到達丁克路高。此時，美G團一營與兵力約兩中隊之敵遭遇，激戰迄晚被圍。旋我八十八團趕至，向敵猛攻，十三日解圍。十八日趕至密支那北約十公里的遮巴德。H縱隊十六日亦全部到密支那西機場以西附近，並將密孟公路切斷。解美軍之圍有功、留在丁克路高掩護的我軍一營，由于指揮官不負責任，竟忘却對該營空投給養，使該營官兵忍飢至八日之久，僅采山果野菜充飢，至為艱苦。

為迅速占領密支那計，駐印軍總指揮部決定將原留在印度境內對英普哈爾方面警戒的新三十師第八十九團空運密支那方面參加戰鬥，并歸先遣支隊指揮官指揮。五月十七日，先遣支隊向密支那西機場發動攻擊。守衛機場四周之敵百餘人，倉皇抵抗后即向市區潰退。米爾准將命令我一五〇團即晚向密市攻擊，二十日已攻入車站，忽遭敵集中火力的襲擊，通訊聯絡均被切斷。美方總聯絡官孔姆中校借故離開，以致無法要求機場的空軍及炮兵支援，該團傷亡慘重，車站得而復失。二十一日指揮部命該團撤退至跑馬堤。敵乘機跟進，並將原有工事加強，分成四個防禦地區，縱深配備，增兵固守。因指揮官未能及時支援前綫，擴張戰果，又犯逐次使用兵力、被敵各個擊破的錯誤，致使本來可以一舉而得的密支那，竟拖延到兩個多月之久。二十三日史迪威偕參謀長鮑德諾及我潘、胡兩師長，來到前綫組織臨時指揮所，撤換米爾的支隊指揮官并規定華軍由潘、胡兩師長自行指揮。又由列多空運十四師的四十二團前來增援。

二十五日起我方再度開始攻擊，至二十八日無大進展，各綫均

因气候恶劣,地形不利,奉命在现地构筑坚强据点,并搜索敌情。三十日天气稍晴,指挥部下令攻击。经两星期之苦战,右翼先后突破南区敌部的坚固防线;左翼虽因强行通过开闢地区,伤亡很大,也占领敌方的重要据点。攻击至此,指挥官未能接受以往教训,命令频传,严厉督催,致全面伤亡惨重。我部队长鉴于密市自南至北高堤間,敌依据房舍、大树、竹丛等构成坚固据点,攻击愈形困难。经和指挥部争论,六月十五日以后指挥部方面听由各部队自行处理。各部队乃采取掘壕及强攻并用的战法,进展较迟。七月六日郑洞国到前线视察,深觉各部队胶着不动,延延时日,决定在“七七”发动全面攻击。十三日起在我优势空军及炮兵支援下连攻三日,始将北端高地及其西南数据点占领。十七日以后,各部队自行掘壕攻击,大部进入街市村落战斗。敌人虽屡补充,但为我空军及炮兵猛烈袭击,死伤奇重,逐步退守市区。二十五日起我军又开始全线攻击,至三十一日,已将密支那市区占领过半。五十师师长鉴于密城北端之敌据坚固阵地顽抗,强攻牺牲太大,八月二日派轻装敢死队,分组潜入敌阵地后方,将敌通讯设备完全切断,三日拂晓即向敌指挥所猛烈攻击。我攻击部队同时应声而起,向敌冲杀。敌大部被迫向江中逃窜,未能逃走之敌,大部用手榴弹自杀。五日已将所有残敌肃清,完全占领密支那。

此次战役,前后换了三个美国指挥官。他们既不明中国士兵的特性,又不信任中国军官;命令时常变更,任务指示也不明确,下达命令以前,对实施所需的时间不作考虑;且常陷于分割使用兵力的错误。因此,中美军官之间的矛盾就充分暴露出来。

### 八莫克服,晚町会师

我军攻占密支那后,部队亟需整顿。在此期间奉命将驻印军编

为两个軍，即新一軍与新六軍，同时准备向緬北重要据点八莫攻击。十月初雨季已过，我軍陸續向八莫地区前进。后因国内战局的需要，新六軍空运湖南芷江；新一軍繼續向八莫攻击。八莫是敌侵犯我滇西的战略要地，此地得失，关系緬北及滇西全局。敌在密支那失敗，即集中殘余部队加强八莫的防御設備，深沟高垒，层层設防，每条街巷都有坚固工事。当我新三十八师首次攻击时，即发现敌人陣地坚固，火力猛烈，就吸取密支那的教訓，决定用陆空协同，步炮协同，并以战車掩护，逐点作歼灭之攻击。鏖战一月，整个八莫的敌軍陣地，几乎全为我炮火及飞机轰炸所粉碎。敌頑強抵抗，大部被我歼灭，殘敌向南坎逃窜。在追击战中，敌曾作凶猛的反扑，也都被我軍击败。我軍繼續攻下南坎，并于一九四五年一月下旬与滇西部队在畹町会师后，繼續南下略取腊戍及其以南以西地区。但不久奉命回国，中国駐印軍总指揮部亦告結束。

#### 四、中美軍官的矛盾

史迪威要撤換中国軍隊营长以上官員的企图虽未得逞，但仍坚持由美国軍官直接訓練中国士兵；所以在兰姆珈訓練的时候，美国軍官直接調动营以下的部队，直接帶領連队到訓練場，中国部队长根本不知道。中国軍官当然不愿意由美国人这样随便摆布，双方爭論結果，才規定各部队聯絡官在調部队到某某訓練場时，应事先与該部队长联系，并向师部汇报。有的聯絡官这样办了，有的还是不理这个規定。尤其是总指揮部的直属团队，更是由美国人为所欲为。聯絡官认为某个干部不行，只要向总指揮部汇报，就随时撤換，并送上飞机回国，事后中国的部队长才知道。史迪威的參謀长鮑德諾曾坚持參謀长有权直接指揮部队，因中国將領反对，最后

史迪威不得不接受中国将领的意见。鲍德诺从此对中国将领特别仇视。新一军军部原分配有一辆小轿车，鲍认为这是浪费，立即把小轿车调回总指挥部。有一次外交部长宋子文因出席新德里会议，顺便到兰姆珈视察，中国将领在欢迎时派了一排仪仗队。事后鲍德诺在中美高级将领的会议上提出质问说：“是谁命令派仪仗队迎接宋部长？如果不经过总指挥部的同意，随便派遣部队的話，那末，我們美国军官回去好了。”当时史迪威也支持他的意见。后来中国将领也提出质问：“前几天印度的一位省长来参观时（省长是英国人），总指挥部曾派一营仪仗队；而中国的部长来视察，派一排仪仗队，就不应该吗？”史迪威只好没有话说了。总之，美国军官是以施主自居，认为既靠美国援助就得听他们的話，他們的联络官就是太上皇。也有极少数中国的败类（多半是翻译官）为讨好美国人，从中播弄是非，所以中美军官一度闹得很僵。有的中国军官见面时大发牢骚说：“班超当年扬威异域，我們今天到印度来却领略海外洋威。”当时某高级将领曾写了这样一首诗：“捧檄出神州，天涯作壮游。关山欣聚首，风雨感同舟。束手难为策，依人岂善谋？重温西汉史，无语对班侯。”

在緬北作战期间，中美间的矛盾更加明显。凡有危险和困难的地方就派中国军队去，有便宜可取时就派美国军队去。說也奇怪，往往美国人认为便宜的地方，却偏偏碰釘子。如孟关主力战时，他們看到日軍快潰退了，就派美軍一个团去瓦魯班截敌之后路；可是遇着敌两个中队的抵抗就叫苦起来，結果还是中国軍派一营人去解了围。更可恶的是当中国军队去增援他們，才一开到，他們就跑了，把中国军队留下作掩护；甚至七八天不派飞机投送給养，几乎把一营人餓垮。官兵們談起此事，莫不憤恨刺骨。至于随时

派中国军队去接替在危险中的美国部队，更是家常便饭。可是，美国军队在战场上（如密支那之役）本来有机会可以而且应该支援中国进攻部队时，他们却坐视中国军队的牺牲。他们是大少爷军，却把中国军队看成奴隶军。许多官兵都愤慨地说：“中国并没有亡国，为什么我们要受这个亡国奴的待遇？”现在回想起来，深刻体会到：这就是“美援”的滋味！

## 五、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

据我们的看法，史迪威到中国来，一方面是代表美国政府监督美援的运用，另一方面也有他个人的打算。他以中国通自命，想利用中国的士兵和美国的装备，在远东创造他的英雄事业。他的作法：第一步希望能指挥中国军队，第二步以美国军官代替中国军官，企图建立一支殖民地式的军队，作为他代表美国在中国称王称霸的资本。而蒋介石是以掠夺兵权、并吞别人军队起家的。两个野心家碰到一块，这就展开了尖锐的矛盾。为了撤换驻印军干部的问题，蒋、史进行了第一次斗争，蒋没有完全应允史的要求。史迪威一计未成，又施二计：他利用打通中印公路给他带来的威望，向蒋介石提出中国的十三个美械装备军应该和中国驻印军一样，由美国高级将领来指挥，也就是说应该由他来指挥。蒋介石当然不同意他的意见。史迪威也不肯让步，便用美援这张王牌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史曾派包瑞德到延安建立美军观察组，并放出空气，打算把美援一部分发给八路军。史又扬言要去延安，摆出要援助共产党的架子。史认为他这一手可能使蒋介石屈服，所以由西北回来不久，便去见蒋谈判。蒋介石与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时，已订下反共密约，当然不肯对史让步。谈判决裂后，史迪威感到不对头，便去找

何应钦轉圜。媚美恐美著名的何应钦深怕得罪美国，立刻报告蒋介石。出他意料之外，蔣告訴他：“已打电报給罗斯福总统，請他撤回史迪威了。”何应钦大吃一惊，他从蔣介石那里出来时垂头丧气地说：“从此美援沒有指望了。”罗斯福第二天就复电給蔣介石，同意撤回史迪威；不久就改派魏德迈来接替史的任务（以上材料一部分是当时史迪威的翻譯刘耀汉談的）。魏德迈来后，反共的姿态很鮮明，也不过問中国军队内部的事务，可是美援却不象以前那样順利了。美国除了已答应装备的十个美械軍外，不再装备其他军队了。后来經蔣再三要求，魏德迈才应允再装备三个軍。<sup>①</sup>\*中国駐印軍的預备装备（等于原装备三分之一）原存于印度，蔣虽一再請求交給中国，而美国却仍然送給印度。原来打算在西安、桂林两地装备的中国军队，也不打算实行了。蔣介石只好把十三个美械軍的預备装备拿出来，成立若干个半美械装备軍，以滿足一些將領的要求。当时有人說：“美国这样作法，使中国军队既餓不死，也吃不飽。”在这里可以看出，蔣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实質就是蔣美的矛盾。

---

① 十三个美械装备軍的番号如下：第二、第五、第六、第八、第十三、第五十三、第五十四、第七十一、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九、第八十五、第九十四等軍。

\* 編者註：按宋希濂文敘述美械装备軍为十二个，多第十八軍而少第七十九軍、第八十五軍，并存待考。

## 抗战后期重庆的黄金风潮

戴 立 庵

一九四二年重庆国民党政府自向美国进行五亿美元借款成立后，即开始研究利用这笔借款稳定金融的办法。在借款中指定美金一亿元作为发行“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的基金，又指定一亿元作为“同盟胜利美金公债”的基金。“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都是按照法币二十元折合美金一元的比率，用法币购买。“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发行数额达一亿美元（内一千万美元系为云南、山西两省购粮搭用），极大多数为豪门巨贾和银钱行庄所购买，到期以后，即可兑取美金。购买这种储蓄券的人，都获得极大的利益。大多数人民既不了解其奥妙，又无余钱，在到期取得美金汇票以后又无法处理，购买的仅占极小部分。“同盟胜利美金公债”一亿元，发行并未达一亿元，对外即宣称已发行足额而停止。当时没有发行的债券，孔祥熙作为人情，任意分配，部分饱入私囊。蒋介石曾密令俞鸿钧查办，当时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郭锦坤、国库局局长吕咸都是这一事件的有关人物。郭锦坤曾因此关进看守所几个月，吕咸也在俞鸿钧接任中央银行总裁时辞去国库局长职务，据说孔祥熙的去职和此事也不无关系。这项公债本息，后来都用法币折合外汇牌价支付，讨便宜的没有得到便宜，和美金储蓄券比，真是有幸有不幸了。在借款中还提了二亿美元，

按每一盎司黄金折合美金三十五元价格向美国国库购入黄金。又孔祥熙在五亿美元借款未成立前，早已在美购入合美金二千万的黄金存在美国，当时实际拥有黄金合美元二亿二千万元。在通货不断贬值的时候，中央银行利用这笔黄金向市场抛售，后来现货不继，又抛售期货，说是借此收缩通货，实际是化公为私，把大块的金砖（一块合四百盎司）先后进入豪门巨贾的私囊。这是一回事。另一回事，是由中央银行举办“法币折合黄金存款”，这项存款是用法币按照中央银行黄金牌价折合存入，到期取得黄金。据《财政年鉴》三篇记载，自开办到结束，共收“法币折合黄金存款”2,195,553两，折合法币62,437,502,500元。上项存款到期时，宋子文已任行政院长，特订黄金购户四成捐献办法，凡预买黄金的客户和“法币折合黄金存款”的存户，都要一律扣减四成作为捐献。据同上记载，截止一九四六年年底，捐献总数计为黄金820,468两8钱。预购黄金的客户和“法币折合黄金存款”的存户，忍痛接受，敢怒而不敢言。据闻当时借入款项经营这种投机买卖的人，计算下来还要赔本，而和中央银行有关系、能购到黄金现货的人，黄金早已到手，则可避免此项捐献。我还记得公布捐献办法的前夕，其时银行营业时间已过，宋子文约俞鸿钧和我到他“官邸”交代这项办法，命令财政部立即下令实行。在他以为是给投机者以打击，然而八年抗战，金融方面以失信于存户而告结束，演成两败俱伤的场面。

四联总处扩大组织后，即设有金银收兑处，所收黄金，一为民间藏金，一为新产沙金。自开始到结束，收入金类约共七十万两，主要是民间藏金；沙金因收兑价格订得太低，有时不敷成本，因此收入不多。自向美国购入黄金后，国内收兑黄金实际即已停止。至于出售黄金现货，原先由中央银行委托中国农民和中国国货两行



办理，此事只由孔祥熙口头嘱咐农民银行的顾翊羣和国货银行的宋子良秘密进行，始終未見公文，售价亦由中央銀行随时通知两行照办，出售情况和数量諱莫如深，即財政部亦不知道。一九四四年九月开办“法币折合黄金存款”，黄金价格始由財政部通知中央銀行挂牌，变更价格时手續亦同。通知黄金牌价系在上一日銀行营业时间終了以后，或在当天銀行开始营业以前，由財政部长临时告知錢币司办文通知。財政部自高秉坊案发生后，所有員司人人自危，尤其是“高級官員”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因此，承办此案的員司自拟稿的科員，核稿的科长、司长，至判行的部次长都在签名的下面注明拟稿、核稿及判行时间，以明“責任”。在黄金牌价17,500元改为20,000元时，並沒有出什么问题。到了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九日由每两20,000元改为35,000元，財政部通知的手續是在銀行营业时间終了以后办理的，但当日外間就已知道。有人謂在財政部通知未发出前，外間即有加价传聞，因此有黄金舞弊案的发生。此案发生后，財政部即派員查办，查出財政部总务司长王紹斋私挪公款购买黄金四十两，中央信托局儲蓄处处长王华因局中女同事哭鬧，漏夜开庫取款购金朋分，都送由法院偵查起訴。商人串同銀行用本票购买的亦有数起，外間的謠言很多。監察院提出检举，重庆地方法院的檢察官也进行偵查，在偵查期間并到过財政部，要部长俞鴻鈞和次长魯佩璋、李儻作証，我那时是錢币司长，亦在作証之列。后因財政部办理此事手續无可指摘，并无其他行动，不过俞鴻鈞因其亲信王紹斋被拘，大为懷丧。究竟王紹斋的消息从何而来，外人迄无从知道。后来王紹斋、王华都判了徒刑，串同购金的商人和商业銀行經理也被法院传訊，未聞有何处分。鬧得滿城风雨的黄金案就此結束了。

重庆地方法院檢察官到財政部偵查黃金案的情況，我大致還記得：有一天下午，俞鴻鈞打電話要我攜帶黃金牌價有關案卷到“部長室”去一趟。我當即調齊卷宗到了“部長室”，看到魯佩璋、李儼都已先在那里，另有二人坐在一旁。俞鴻鈞當即為我和二人介紹，知道一個是重慶地方法院的檢察官，一個是書記官。介紹后，檢察官即說：“法院為了了解黃金案的情況，本來要請四位到法院作証的，但為了便利公務起見，由本人率同書記官來到貴部辦理。依照規定，四位應先書面証明所作証詞俱屬確實毫無虛偽，否則須負法律上的責任。”隨即將準備好的書面交我等簽字蓋章，我們就依次簽字蓋章完畢。檢察官繼即問起當日通知更改牌價的情況，俞鴻鈞即將我帶去的卷宗交其閱看。他一面閱卷，一面同書記官摘抄，又和我們問答了幾句，大致是關於該項公文撰擬、審核、判行等項的時間問題，這些都已在稿上注明，因此他們也無多話可說，就離去了，離去前還說了幾句客套話。這時財政部對黃金案亦在查辦，在檢察官去后，我對俞鴻鈞說：“此案必須查個水落石出，狠狠地辦一下，否則我們掉入染缸內，怎么也洗不清。”其實我也太天真了，俞鴻鈞又有什么能為呢？我們早已墮入臭水坑中，又何止黃金案一次呢？

## 金圓券的发行和它的崩潰

黃 元 彬

### 一

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以后，就由宋子文掌管財政。那时美帝国主义企图把中国货币拉进美元集团。一九二九年，有以甘末尔为首的一批美国“专家”来华筹划，草拟了改革币制方案；名为金本位制，实质上是一种金汇兑本位制，把中国銀元售給美国換作黄金准备，存放紐約。仅仅草拟这个方案，用了很长的时间，花了九十多万美元。其实这个方案与甘末尔在波兰等国所拟方案并无多大差别，只是用很长篇幅写了一大套无必要的程序。金汇兑本位制的特征是把本国的准备金放在外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只有印度实行这种制度；到了战后，缺少黄金的国家就都相继实行。一九三一年，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动荡，除了法、比、荷、意、德几国仍然坚持金本位制外，以英国为首，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几十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了货币贬值，以致金汇兑本位制的国家狼狈不堪：提黄金则禁止出口，提鈔票又贬值太大。如果有关双方发生邦交恶化或者打起仗来，准备金不在本国的一方就又冒着准备金被冻结或者被没收的风险。宋子文那懂这些，当时还把甘末尔方案奉为至宝；可是未及实行，他已下台了。

孔祥熙繼宋子文上台，英帝国主义想趁机利用，把中国货币拉进英镑集团，于是派李滋罗斯来华。李滋罗斯主张中国发行新的鈔票，叫作“法币”，把它的对外汇率釘定为英镑一先令二便士半，依照这个汇率无限制售卖外汇，以維持鈔票的稳定；这也是一种金汇兌本位制。孔祥熙却只花了十天、八天的招待費和旅費，就产生了所謂法币方案，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宣布实施。那时中国共产党和紅軍早已实行北上抗日，全国人民还以为国民党政府为了抗日作准备才改行法币，因而沒有反对。这与甘末尔草拟方案时的情况大不相同，也就沒有人去考虑金汇兌本位制的弱点了。李滋罗斯的方案，仍把銀元运往美国出售。当时英美在华銀行都把所存銀元交給中国中央銀行，只有日本反对，拒絕交出。

李滋罗斯在华时，曾对蔣政权口头允許借款。孔祥熙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就借参加英王加冕典礼的机会，亲往伦敦商借两千万英镑。英方所提条件很苛，又因抗日战争爆发，借款沒有成功。仅由英国汇丰、麦加利銀行在华分行借給五百万英镑，中国、交通两行借五百万英镑作为中英平准基金。

在抗日战争期間，法币不断膨胀，物价飞涨；到抗战后期，币值已一落千丈。抗战胜利前后，宋子文作行政院长，仍同美国合作，又是一塌糊涂。在宋任內，国家銀行存有約值九亿美元的黄金和外汇（連五百万两黄金借款在內），截至一九四七年二月他下台止，共花去了五亿美元，只留下四亿美元（这些数字是当时財政部长俞鴻鈞向我說的）。宋子文由于監察院提出黄金弹劾案而下台。黄金案还只占五亿美元的十分之一，他的出售黄金与开放外汇市場的政策都遭到失败。那时国民党統治区的整个經濟已趋于总崩潰的邊緣了。

## 二

政学系头目张羣繼宋子文任行政院长，以张嘉璈为中央銀行總裁，要以金融力量来控制經濟。俞鴻鈞仍連任財政部長，他頗得蔣介石的信任；开始宋曾要求換人，蔣未答应。行政院副院长一向是不管事的閑职，张羣要王云五担任，并要他特別研究財政。外交部长王世杰也主張必須有人彻底整理財政。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政府施行“宪法”，蔣介石当上了“总统”。他原想张羣仍任行政院长，但因 C C 系的立法委員公开反对，才把翁文灝拉出来抵挡一陣。张嘉璈也知道必为 C C 系所反对，坚决辞职不干。蔣乃調俞鴻鈞任中央銀行總裁，任王云五为財政部長。蔣对翁文灝說：“軍事完全由我自己主持，与行政院无关。財政方面，应以財政部为中心，中央銀行帮同处理。同心协力来挽救十分艰难的局面。”

翁閣組成后，王云五就向翁說：“公庫收入仅及支出的百分之五。物价飞涨，支出庞大，全靠发行新票支持。軍事开支所占比重极大，仅东北軍費已占支出总额百分之四十。”于是他提議以中央銀行所存的黃金和証券作保証，发行金圓券以代替法币。他的办法是以政治力量来收兌或收存全国人民所持的金銀、外币，实行管制經濟，在全国設若干管制区，由經濟管制督導員負責执行。也許他早有腹案，密向蔣介石獻策，得到蔣的賞識，才当上了財政部長。当他就任后，立法院还没有休会，他授意財政部次长徐柏園到立法院貨幣小組会上再三要求授权財政部改革貨幣。貨幣小組的召集人是刘健羣（复兴社头目之一）和我，坚决予以拒絕。他們本来可以利用“宪法”上“动员戡乱临时条款”关于：“总统在立法院休会期

間得以命令行之”的規定，不必經過立法院的通過；其所以再三要求，无非想在事後封立法委員中反對者之口。不料碰了釘子，以後金圓券的發行，只好偷偷摸摸地以“總統命令”行之了。

約在這年的七月尾，素即稱贊王云五才能出眾的王世杰向翁文灝傳達說，蔣介石和俞鴻鈞已在莫干山，要翁和王云五速即前去，商討幣制改革辦法。翁文灝當即打電話向蔣詢問，蔣答就派飛機來接他們。翁和王云五、王世杰同機前往莫干山，蔣召集他們開會說：“王云五所擬金圓券方案，設法挽救財政，收集金銀、外幣，管制物價，都是必要的措施。”接着詢問各人對這方案的意見。王世杰強調說：“王云五部長所擬方案極為妥善，時不可失，必須由總統下最大決心，大力實行。”翁文灝說：“在這個艱危紊亂的時期，改革幣制沒有多大把握，但財政實非改革和整理不可。”翁對王云五所擬方案，曾交劉攻芸、嚴家淦等加以研究，認為可行，翁也就表示贊同。蔣介石問俞鴻鈞印刷新鈔票是否趕得上。俞鴻鈞說：“新印金圓券已來不及，但中央銀行尚存有新印的鈔票，數量足夠應用。可以先用飛機密運各中心市場，以便總統命令發表後，就作為金圓券發行。”蔣說這樣很好，囑咐各人先行分別準備，等候決定。

隔了不久，翁文灝接到蔣介石由廬山打來的電話，說決定實行金圓券方案，囑咐轉告有關機關準備必要的文件，等他返京提出國民黨中常會通過後，即行公布實施。到了中常會開會時，蔣介石提出金圓券方案，孫科發言力表贊同，就此通過。原案於八月二十日由蔣以命令宣布，二十一日又令派俞鴻鈞為上海區經濟管制督導員，蔣經國協助督導；張厲生為天津區經濟管制督導員，王撫洲協助督導；宋子文（時任廣東省政府主席）為廣州區經濟管制督導員，

霍宝树协助督导。

上海是蔣政权发行金圓券掠夺金銀、外币和管制經濟的中心。方案公布后，蔣介石电邀上海的党、政、軍、金融、經濟各界的头目前往南京，当面吩咐务必切实奉行。实际上是俞鴻鈞主持，由中央銀行和所指定的銀行办理发行新券和吸收金銀、外币，范围遍及全国。蔣經国特在上海区执行严厉的管制和督导。此外，西北、西南方面分別由冀朝鼎、徐堪前往負督导的責任。

这时，法币流通量已达到六百四十万亿元，为抗战前一九三七年六月的四十五万倍。据四联总处所編上海、南京、汉口的批发物价指数，已为抗战前上半年的六百余万倍，天津为七百五十万倍，广州为四百五十万倍，重庆为二百八十余万倍。照上海物价計算，全部流通中的法币总购买力只等于抗战前上半年法币的一亿元左右。这已說明法币的濫发使整个中国經濟走到总崩潰的絕路，但还不及八、九个月后金圓券崩潰得那样悽慘。

### 三

八月二十日宣布实行金圓券那天，我适往上海。在陈光甫招待留沪立法委員的宴会上，遇見約作陪客的吳国楨(上海市长)和俞鴻鈞。吳、俞同声詢問我对金圓券的意見，我說：“在法币丧失币值，人民对鈔票失去信任的情况下，又当內战紧迫的时候，改革币制的机会早就錯過。金圓券的办法要以政治力量来施行不兌現的貨幣，更加危險万倍。一旦发行数量超过市面流通必需量，必定到处突破政治力量，不过几个月就要崩潰了。”俞鴻鈞說：“我因王云五所拟金圓券方案与你从前所拟无限制兌現的金本位方案相反，在莫干山會議时，尽管在职务上必須报告印存新币的数目，但在政

策上还是反对。在庐山會議上，总統一开始就表示事在必行，我就不敢講話了。”吳国楨却破口大罵王云五，什么烏龟王八蛋的話都出口了。吳还說如果要他作什么上海区經濟管制督導員，他宁肯連市长都不干。我在宋子文任行政院长时，曾任財政部长俞鴻鈞的顧問，草拟过改革币制的无限制兌現的金本位方案；原拟在“抗战时期我国为美軍支付的法币墊款”項下或用其他方法，筹借儿亿美元，連同所存黄金、外汇（当时还不只四亿美元）就可实行。关于美軍的法币墊款折算率，中美間常有爭执。<sup>①</sup> 宋子文拿了美国剩余物資作抵，冲潰了国内市場。他究竟花了多少墊款，很难确知。俞鴻鈞拿着我的方案，不通过宋子文，就直接送給蔣介石批准，并要进行筹备。不过我那方案毕竟沒有实现。直到張羣組閣，張嘉璈任中央銀行總裁，也曾对我表示，一俟筹得儿亿美元的黄金、外汇，就实行改革币制。張嘉璈的腹案不一定就是我的方案，但他也反对用政治力量，主张依靠金融和經濟力量，實質上必和我的内容一样，这都是妄图挽救蔣王朝厄运的。

俞鴻鈞对宋子文不滿，經常見于詞色，这里再举一例。宋子文僱了一位美国顧問（忘其名）交給財政部，俞鴻鈞对这顧問毫无礼貌，让他坐了一年的冷板凳，期滿回国。俞对我說：“这位美国顧問是宋院长特聘的，待遇是一座风景优美的洋房，一輛最新式的美国汽車，每月薪金三千美元，可是一年沒有向我写过一次建議。”可見宋子文的崇美已經到了美国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請来作中国財政顧問的程度了。

---

① 我曾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盟軍墊款的折算率”一文，魏德迈总都把它譯寄华盛顿，并向作者作过解释。



#### 四

金圓券方案实施后的第五天或者第六天，蔣介石“召見”卢郁文、陈博生、郑彦棻等和我共七位立法委員。蔣一开始就問我对于金圓券方案的意見。我照在上海对吳国楨、俞鴻鈞所說更詳細講了一番。我又加重語气道：“我敢向‘總統’保証，金圓券不过几个月一定崩潰。”蔣大为吃惊，反复追問了一些疑点，我也一一地解答。蔣又問現已公布实行了，还有什么挽救的办法。我說：“現在在无法中想办法，只有一边准备一边挽救的一条路。第一，必須立即停止收兌金銀和外币。这些金銀外币留在人民手上沒有大危險。反之，放出大量金圓券却危險极大。这无异于把死老虎收回来鎖住而把活老虎放出去。第二，必須立即改为无限制兌現。实际上在发行額未超过市面流通必需量以前，商民不会来兌現。英国过去的金本位制，对于市面流通必需量的限度以内的发行，向不設置准备金。第三，必須立即向美国交涉，按照美軍法币垫款当时的法币外汇市价，按月計算兌換率，要回垫款的黄金、外汇，或用其它方法筹借三、四亿美元的黄金、外汇，連同国家銀行所存还有三亿五、六千万美元的黄金、外汇，共約有七、八亿美元的准备金，还可勉強維持一定时期的貨幣稳定。如果照金圓券方案全凭政治压力，只有加重人民不信任政府新貨幣的心理，发行数量即使在市面流通必需量以内，人民也以去币存物为利，各地物价一定冲破政治力量的控制。这是沒有絲毫疑問的。”我講完，蔣介石又問其他立法委員的意見。記得只有卢郁文和陈博生說話，同意我的看法。蔣最后要我用书面詳細写出，第二天早晨送給郑彦棻轉交給他。

可是就在这几天内，由于反动政治压力的猛烈，物价已被控制

在金圓券发行前的水平，利息每天降低；王云五正在兴高采烈，准备赴美宣传他的方案的成功。蔣介石信上了他，不会輕易改变，我写的文件自然就被攔起。九月下旬王云五飞往美国，参加国际货币基金董事会的會議，在会上大吹其牛，想借此博得美帝的垂青，再借一笔巨款。但当他十月上旬回来的时候，金圓券已經大为不妙了。

不出我的預料，金圓券发行不过两个月，崩溃的現象就已显露。适值吳鉄城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身份，約二十多位立法委員聚餐（大部分是孙科任立法院长时期的旧人，現在祖國的除我外，还有解放初期往山西大学任教的程元榭）。当我进入时，他正拿着我送給蔣介石的那份文件的草稿，立即轉而問我道：“是不是你当时向总统說过，金圓券不崩溃，就砍你的头？”我答那是誤传，我只保証几个月必会崩溃。吳說，当时中央秘书处把我的原稿繕正送給蔣看后，吓得他的臉都发了青。我向吳索回原稿，吳笑着說：“这个文件已成历史上的文献，你收不回去了。”他又說，蔣決定撤換王云五的財政部长，但翁閣仍然繼續下去。又过了十几天，蔣介石却密叫孙科进行組閣，王云五並沒有单独撤換。

## 五

話說回头，以下要交代金圓券崩溃的过程。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蔣介石宣布实行金圓券命令的全文如下：

“茲依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之規定，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頒布財政經濟处分令，其要旨如左：（一）由即日起，以金圓券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圓券，限期收兌已发行之法币及

东北流通券。(二)限期收兌人民所有黃金、白銀、銀幣及外國幣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三)限期登記管理本國人民存放國外之外匯資產，違者予以制裁。(四)整理財政并加強管制經濟以穩定物價，平衡國家總預算及國際收支。基于上開要旨，特制定：(一)金圓券發行辦法，(二)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三)中華民國人民存放國外外匯資產登記管理辦法，(四)整理財政及加強管制經濟辦法，與本令同時公布。各該辦法視同本令之一部分，并授權行政院對於各該辦法頒布必要之規程或補充辦法，以利本令之實施。此令。”

其中第三項辦法還沒有實行，金圓券就開始崩潰，原辦法無須敘述。其他辦法可以歸納為以下四項：

第一，金圓券發行總額以二十億元為限。

第二，人民持有黃金、白銀、銀幣或外國幣券者，應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三十日（后由行政院把黃金、外匯展期至十月三十一日，白銀、銀幣展期至十一月三十日）以前，向中央銀行或其委託之銀行，依左列各款之規定，總換金圓券：（1）黃金每市兩兌給金圓券二百元，（2）白銀每市兩兌給金圓券三元，（3）銀幣每元兌給金圓券二元，（4）美國幣券每元兌給金圓券四元，其他外國幣券照中央銀行外匯匯率兌給金圓券。

第三，違反規定不予限期內兌換者，其黃金、白銀、銀幣或外國幣券一律沒收。

第四，全國各地各種物品及勞務價格應照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各該地各種物品及勞務價格依照兌換率折合金圓券出售，由當地主管官署嚴格監督執行。

關於第一項，到了同年十一月十一日，行政院不得不頒布“修

正金圓券发行办法”，改为“金圓券发行总额另以命令定之”。在此以前，俞鴻鈞已两次电請財政部在限额二十亿元以外，每次增发五亿元。接着孙科登台，徐堪任財政部长。俞鴻鈞随后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十二月六日、十二月十九日又三次請增发每次十亿元；十二月下旬两次請增发共六十亿元。一九四九年一月刘攻芸繼俞鴻鈞任中央銀行總裁，請增发一百亿元，二月請增发三百五十亿元，三月請增一千六百亿，四月增一万三千亿元。截至五月四日止，金圓券发行总额已达到九万八千零四十一亿元，五月十八日达到二十九万四千七百二十二亿元。仅仅九个月，金圓券就几乎等于废纸，在世界货币史上可算是最短命的货币了（如果不算后来产生的銀元券）。

关于第四項，一九四八年九月份的批发物价指数比八月涨高百分之七点四。如就地区来说，截至九月四日止，即在金圓券发行后的第十五天，汉口物价涨高百分之二十一，重庆涨高百分之四十，广州涨高百分之八十三。这就是說，时间仅仅半个月，物价已經不是政治力量所能管制的了。同年十月，物价的批发指数比八月涨高百分之三十五点六，如按地区，当然更高。十一月高涨到十七倍半，十二月涨到三十二倍半。一九四九年一月涨到八十五倍七，二月涨到八百三十四倍，三月十九日涨到二千九百倍。单就上海批发物价来说，到四月十五日，竟涨高六万二千七百一十九倍。后来，国民党政府逃往广州，全部金圓券的灾难都加在广州、重庆等都市的人民身上。当时物价一日万变，那几个都市人民生活的惨状，真不是言語所能够形容的。

至于第二、第三項，翁文灏曾在一九四八年十月向立法院报告吸收全国人民金銀外币約值美金两亿元。这大概就是金圓券唯一

的“最大成就”。上海銀行董事長陳光甫在金圓券發行初期對我說：“明知金圓券就要崩潰，上海銀行所存黃金也要送往中央銀行。”吳鐵城也說黃金送到中央銀行就等於沒收，可是不送恐怕要受徒刑。那時蔣經國在上海方面施展了好象不顧情面的作風。聽說他曾宴請上海金融工商各界巨頭，板起面孔來說：“現在我奉命嚴格執行金圓券的法令，一定貫徹到底。座中諸位都是我的世伯世叔，希望保留情面。……”參加的面面相覷，不敢出聲。當時政治壓力之大，可以想見了。但實際上各地金銀、外幣的黑市價格，早已沖破了官價。八月二十三日，金圓券發行後的第三天，天津美鈔的黑市是每元換金圓券四元一角八分，二十四日又跳升四元三角五分。廣州美鈔黑市也在二十四日起超過官價。重慶黃金黑市在九月二日每兩超過官價三十元，漢口黃金黑市在九月六日每兩超過官價二十五元。廣州、漢口銀元的黑市也在九月二日以後突破了官價。到了十一月十一日，各地金銀、外幣的黑市都超過官價的五倍以上。這天，行政院只好又頒布“修正人民所有金銀、外匯處理辦法”，准許人民持有金銀、外幣，并把金銀、外幣的兌換率一律提高五倍。不久金銀、外幣的黑市和物價一樣狂漲起來。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五日，行政院規定銀元一元等於金圓券五億元。而四川省政府早在同月十二日宣布銀元一元等於金圓券七億五千萬。二十一日重慶銀元的黑市，一元就等於金圓券二十五億元。法幣在金圓券發行前夕，還只要六百萬元換銀元一元，比起金圓券的崩潰情形，也算小巫見大巫了。西北各省、廣東、廣西、江西、貴州等省的各縣市這時已經發生拒用金圓券的情事。金圓券終于隨着蔣政權的復滅而完全崩潰了。

## 六

翁文灝任內的行政院曾向立法院就金圓券問題前後報告過三次。第一次王云五剛從美國回來，親自出馬，遭到六、七十位立法委員的猛烈反對。第二、三次，王云五已不再露面，但仍親自起草文件交由翁文灝報告，也同樣受到更為猛烈的攻擊。特別是第三次在金圓券發行兩個月後顯露崩潰的時候，立法委員們把財政部攻擊得體無完膚。王云五是所謂無黨無派的人，各派系的立法委員和他沒有政治上的矛盾，可是也沒有一個人替金圓券政策辯護。不過報上登載的都是曖昧其詞，只有上海英文《字林西報》刊過一兩位立法委員的發言。足見反動政治的壓力一直沒有放鬆。

行政院三次報告之後，蔣介石也到立法院講話了。那時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已解放了整個東北，正以排山倒海之勢向關內進軍。蔣介石在立法委員們面前發表了兩句“名言”，那就是：“軍事本來不會垮，被立法委員們鬧垮了；金圓券本來不會垮，也被立法委員們鬧垮了。”蔣介石不僅要這般立法委員們作替罪羊，而且因為“副總統”李宗仁虎視眈眈、一聲不響地站在旁邊，白崇禧在漢口擁有二十萬軍隊另有打算，他這番話也是說給李、白听的。王云五在當初寫好金圓券方案時，曾拒絕了徐柏園要他把方案送給我看看的提議，並道他讀的書比我多。這時他又托陸干瑩（廣東稅務局長）致意我，請我不要反對他那麼厲害。其實我只反對金圓券政策，並非反對王云五個人。听了蔣介石的兩句“名言”，却也惴惴自危，於是緘口結舌，同家人們回廣州去了。

# 商震历史概述

唐 永 良

商震，号起予，一八八七年生于保定。其祖父绍兴人，在保定官署为文案。商震在二十岁左右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洋文班。当时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国革命同盟会，国内革命气氛逐渐浓厚。商震在速成学堂暗中加入革命组织，未毕业即赴东北从事革命工作。开始在奉天第一标当兵（标统为朱庆澜），旋保送奉天讲武堂附属学兵营深造，其直属队长为彭家珍（后因刺良弼殒命）。不久投考奉天测量学堂，并在关外联络地方进步分子。辛亥前夕由东北到山东烟台，纠集地方武装成立民军并被推为民军司令。在此期间，李培基先生与商为患难之交。据李先生谈：当时搞革命工作不仅有生命危险，生活尤为艰苦，有时买来一个烧饼，李与商各食其半。黄克强曾函孙中山，建议联络海内豪杰，信中列举应联络的对象，有：“陕西之于右任，烟台之商起予……等”，可见商在辛亥时期已露头角。

辛亥革命后，北京政府成立，民军解散，商被调充陆军部高等顾问，甚不得志。一九一二年商震因在北京参加二次革命活动，被“近畿军政执法处”扣押，经众议院议员刘冠三等力保获释。随后商即投靠陆建章担任军职，当时论者认为商此种行动已丧失革命气节。

一九一三年陝西、河南一帶“白狼”興兵，勢頗強大。袁世凱派陸建章為豫秦鄂“剿匪”總司令，率所部第七師進駐陝西并繼張鳳翽為陝西將軍。第七師入陝後改編為兩混成旅，第十五混成旅旅長為賈德耀，第十六混成旅旅長為馮玉祥，馮不久開四川。陸又將其子陸承武的中堅團擴充成旅，商震便在陸旅充當團長。駐陝北綏德縣。一九一六年袁世凱死去，陝西地方軍隊陳樹藩起兵趕走陸建章并俘擄陸承武。商在陝不能立足，率殘部過黃河改投于閻錫山。一九二五年，筆者任商震師部參謀時，常听商說：“那時在陝西，上至將軍府高級官員，下至部隊司務長，沒有不吸鴉片和販鴉片的。有一次陸承武旅奉令到將軍府集合，把全旅士兵背包內裝滿鴉片，徒步行軍，由西安到河南觀音堂後，將卸下來的鴉片全部担上火車運往天津售賣。”

## 二

商震投閻錫山後，閻仍任命商為團長，將商舊部編為第一、二兩營，另以親信楊愛源部編為該團第三營，以事牽制。大約在一九一七年，商升為山西第一混成旅旅長。時山西軍隊共有四個旅：第一旅旅長商震，第二旅旅長馬開松，第三旅旅長孔繁蔚，第四旅旅長趙戴文。一九一七年閻錫山接受段祺瑞要求，派商震率所部援湘（當時段系傅良佐督湘，受到湘人反對），遭到全旅潰敗。趙戴文本是文人，居然穿起軍服，有時把軍刀挂在右側，見者引為笑柄。曾有人用旧歌詞諷之云：“大將南征胆氣豪，腰橫秋水雁翎刀”，后句譏趙戴文之軍刀右跨，前句即嘲商震之援湘敗績也。<sup>\*</sup>商敗後以回

<sup>\*</sup> 編者注：另傳當時有人以閻錫山及其四名旅長仿戲台元帥升帳場面為譏：元帥（指閻錫山）出場之前，先有四員大將陸續出場“起霸”，然后一字排開，各唸詩一句。四句詩是這樣的：大將南征胆氣豪（嘲商震援



山西不好見人，即到汉口往投湖北督軍王占元，王將商部仍編為一旅。閻錫山聞知，派副官李德懋赴漢勸慰，商乃打銷原意，仍回山西。

閻錫山手下雖有四個旅長，事實上都是有職無權。閻直接掌握各團，與每個團長都訂有密電本，商震在山西不過是空頭旅長而已。一九一八年陝西郭堅部進入山西，閻先令晉南鎮守使張培梅任總指揮，率丰羽鵬部迎擊，後又派商震為副指揮，率部增援，在吉縣以西馬斗關黃河灘上殲滅郭部數百人。

一九二五年一月，山西擴軍，旅改為師，商震被任為山西第一師師長。第一師轄兩個旅，第一旅旅長傅存懷為閻錫山心腹；第二旅旅長王嗣昌為山西舊軍人，住在介休鄉間，每天吸食鴉片，常年著便服長袍，生活腐化達于極點，商震對之無可如何。

是年冬，河南樊鍾秀軍突攻山西，破晉東南峻極關，圍遼縣城，太原震動，閻錫山急命商震率兵迎擊。商先借到平定州美國牧師汽車，率所部王嗣昌旅李培基團、楊耀芳砲兵營、魏日新手擲彈營馳往和順，并處決了由遼縣退下來的官兵十七人，隨即進到遼縣寒王鎮，與由潞安北進的李維新部夾擊樊軍。山西承平日久，軍無斗志，閻錫山囑商先行鎮壓，否則商不敢處決山西軍人。商精銳部隊千余人系商舊部，率向樊軍進攻。當時有山炮一營射擊準確，配合作戰，予樊軍迎頭痛擊。樊敗走，率殘部退回河南。山西局面轉危為安。商震經此一戰，名聲鵲起，在山西軍隊中被認為有才干之人物。

---

湘敗績），哈拉塞上把名標（馬開松在該處剿過匪）。人人說我个子小（孔繁蔚身矮），右邊跨着指揮刀（指趙戴文）。

商震善于演講，往往利用书报杂志上材料，結合山西軍隊政策（也可說是閻錫山的治軍政策），當堂演講，聲音宏亮，語言生動。山西過去有自省堂之設備，每周閻錫山命令高級軍政人員作自省一次，其形式類似教會作禮拜。山西各高級將領輪流出席自省堂講話，惟商最歡迎。商在晉聲望日隆，除立過戰功外，善于演說亦為一因。商素注意軍容，軍服必須長短合度，著馬靴必帶馬刺。有一次擬外出檢閱部隊，一枝馬刺被隨行人員踏落，左右勸其拔去另一支，商不聽，立返室內，更換新裝，始再成行。商任師長時，軍服永遠整潔，武裝皮帶經常系于腰間，雖盛暑不解。

### 三

一九二六年南口大戰時，閻令商出兵大同以北孤山一帶，截斷京綏路。馮部向山西進攻，晉北十三縣除大同、天鎮外，余皆失守。閻任命商震為前敵總指揮，指揮晉軍防守雁門關山岳地帶，馮部多次進攻都被擊退。山西軍配有手榴彈，為近戰有利武器，雁門防守，頗為得力。有一次馮部突擊隊利用夜晚潛入雁門山頭，挺進山西軍宿營地，大刀隊劈死睡夢中晉軍多名，形勢緊迫。商震急組織奮勇隊趕到反击，將馮部突擊隊全部消滅。不久馮部發生內訌，石友三專橫，要殺張自忠，張被迫降于山西，接着韓復榘、石友三亦降晉，因之馮部瓦解，放棄攻晉計劃，撤往包綏一帶。山西軍收復雁北十幾縣，商部并挺進綏遠。閻乃委商為綏遠都統。商因有了地盤，遂產生了脫離閻錫山、獨樹一幟的野心。

一九二七年，山西響應國民黨軍北伐，全面進攻奉軍，傅作義挺進涿州，商震出京綏路，進兵宣化、下花園。作戰初期，奉軍兵力較優，晉軍不敵，傅作義孤軍困守涿州，商震部隊撤回雁門關，晉北十

三县完全放弃。此时商仍被任为北路前敌总指挥，驻在代县，指挥各军防守西迄宁武关杨方口，东到繁峙茹越口一带山地要隘，奉军多次进攻都未得手。一九二八年，奉军因在津浦、京汉两线作战失利，撤退攻晋军队，向关外转移。商率全军由黑石关出击，因之先占领保定和北京、天津，并另派一部由晋北进占綏远、察哈尔，商旋被任为河北省主席。商到北京以后，急谋摆脱閻之羁绊，自行发展，遂在南苑成立教导师，在黄寺成立军事政治学校，在河北省举办县长级训练机关——训政学院，同时暗中接近蒋介石。据闻蒋在一九二九年到北方时，曾赠傅作义、商震每人五万元，傅将赠款转交閻錫山，而商则留为私有。商又常向德商礼和洋行购买武器。因此閻渐对商不满，调商回太原，任山西省主席，解散其所办教导师，并将商部军队改归山西军人馮鵬翥统辖。商回太原郁郁不乐，常对人发牢骚：“我不过是盖盖图章，陪陪客而已！”一九三〇年，閻、馮对蒋掀起中原大战，商一度派其心腹饒松寿往隴海路民权县见蒋，暗通消息。所以有一次馮玉祥拍商震肩戏言道：“老弟，咱们这里有汉奸呀！”商闻言顿时面赤。閻、馮失败，閻逃避大连，商立刻感到轻松，不过山西将领对商不满，环境仍然恶劣。一九三一年夏，石友三对张学良反目，举兵进攻东北军，张部几有招架不住之势。张向南京告急，蒋派刘峙、顾祝同沿京汉线北上援张，一面电示商震出兵石家庄截击石友三后方。商认为时机到来，秘密召集旧部黄光华、高鸿文两旅，星夜出娘子关截击石友三部。其时晋军羣龙无首，商得以从容离去。但不数日，太原海子边广场掀起一个反商大会，表示山西将领拒绝商震再回太原。

商震封建观念特别浓厚，閻錫山虽对他屡加提拔，但他始终对閻有戒心，对山西人更看不起。他在山西多年，而他的司令部内几

乎完全是河北人，因之山西人对他也有所不滿。閻錫山逃往大連后，商凭借主席职权，勾通財政厅长仇曾詒和山西省銀行經理高步青借“抽籤兌現”为名，把山西省銀行的大批基金陸續運往省外，变成了他的私人財產。他在离晉前，曾准备賄賣十二个县长，因发表前報紙即予批露，商知事已洩露，急在报上否認，此事遂罢。

石友三部队正沿京汉綫向保定进攻，勢甚猛烈，商部突由后方夹击，刘峙部队亦逼近压迫，石部沈克师又向张学良投誠，因之石部大敗。此一役商擄获石軍全部后勤物資，其中有修械所机械一列車。

从一九三〇年閻錫山逃大連以来，华北由张学良主持。张駐北平組織陆海空軍副司令部，改編山西軍隊为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四个軍，商震、徐永昌、楊愛源、傅作义分任軍长。石友三叛变救平后，蔣介石指定商震部队駐在京汉綫邢台、邯鄲、大名等地，商之三十二軍軍部住邢台。不久商到南京見蔣介石表示敬意，蔣慰問备至。商返防后，扩充三十二軍为三个师，即：一三九师，一四一师，一四二师。

九一八事变后，一九三三年二月热河失守，旋长城各口告急，商奉北平軍分会主任张学良命令，被任为第二軍团长，指揮部設在开平鎮。商指揮第五十七軍何柱国部、第六十七軍楊正治部和商直属之第三十二軍等，防守冷口至秦皇島一带。日軍猛攻长城各口，商部三十二軍防守的冷口于四月十一日首先失守，不久长城各口即相繼被日軍控制。五月，“塘沽协定”签定，商部回駐北平。一九三五年六月何应欽与日本簽訂“何梅协定”，根据日本人的要求撤換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任命商震繼任为河北省主席。这时，日本軍人曾几次拉商合作，实行华北五省自治，均被商拒絕。与此同时，宋哲元与日本勾結，由察哈尔向平津进軍，适南京发表商为河南省主

席，商亦乐于摆脱华北，即赴开封就任新职。此后平津一带归宋哲元统治，商震部队则仍驻平汉线豫北、冀南等地。

#### 四

商震生于保定，多年来人皆知商为保定人。在河北省主席时期，有绍兴人商诗言来访，晤谈后訖系近支家族；以后，商并派其军医处长浙人章不凡赴绍兴联系一次。商在河南主席任内，正式恢复其籍贯为浙江绍兴县，此事在一般人本属平常，但商为拉拢蒋之关系，颇含有政治作用；証以商平日作风，似又不足惊异矣。

一九三六年春，红军由陕西渡过黄河，拟假道山西进行抗日。閻錫山向南京告急，蒋介石命陈诚率兵入晋支援，并令商震部队入晋，归閻錫山节制。商因与閻有前嫌，恐閻对该部为难，不愿受命，经蒋介石疏通，始派队入晋。笔者当时任商部团长，商在石家庄召集军官讲话，大意谓此次入晋，要保存实力，不可轻易牺牲云云。窥商之意，殆不愿将视为自己的政治资本的部队白白牺牲。商讲话后离石家庄返回开封，入晋部队统归三十二军一四一师师长吕济指挥，虽避免牺牲，但仍被红军缴去枪支数百，大为蒋介石、陈诚所不满。三十二军留晋不到半年，即撤回河北。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国民党中央发表商震为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兼三十二军军长，除指挥本军外并指挥五十三军部队作战。是年十月三十二军开到京汉线，以一师防守正定城。正定事先曾由国民党筑城部队耗资巨费构筑所谓“永久工事”，但经日寇土肥原部队攻击，仅两天即告陷落。商部旋又在元氏、安阳等地和日寇作战，仍然节节败退，且战且走。

一九三八年春，商部放弃黄河以北，撤退到黄河南岸，沿河布

防。五月，日寇土肥原部队由考城以北偷渡黄河向开封挺进。国民党中央军薛岳指挥四个军企图包围土肥原部，未能成功，不久开封失守。蒋介石畏惧日寇沿京汉线南下进逼武汉，纳何遂献策（何遂通过林蔚向蒋献策），指令商震挖掘黄河，使黄河流向东南，阻止日寇行动。商首先在赵口挖掘未成，不数日贵州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在花园口挖成。黄河水决口后，由缓而急，逕奔东南，流入淮河。此一消极措施，对豫、皖和苏北人民造成不可估计之损害。

一九三八年台儿庄战役，张自忠部击败日寇后，在徐州方面的商部黄光华师奉令向敌追击。黄电商请示，商复电指示要保存实力，以致失去时机，使全局受了很大影响。后黄被解送军法会审办。

同年夏，蒋令商震率部开入江西。薛岳电商，此后三十二军归彼指挥并指定集结地点。商及三十二军干部都不愿接受薛命。薛岳又来一电，略谓：任何部队归任何人指挥都不得违抗，语气骄横，商虽不快，固无可如何也。一九三九年春商在南昌，蒋下令调第二十集团军司令部移驻湖南桃源，三十二军改归陈诚嫡系罗卓英（十九集团军）指挥。商解除三十二军军长兼职，由一四一师师长朱肯堂升任（朱与陈诚、罗卓英系保定同学），商在蒋压力下，不得已将军权交出，只剩一无部队的总司令部。商极好货财，交卸时携走三十二军全军一个月军饷三十余万元，据为己有。二十集团军副司令为黄埔出身之霍揆彰，乃蒋之嫡系，商在霍之监视下，亦仍为有职无权。此时南昌失守，商旧部三十二军奉蒋令，以其中之一师——一四二师开皖北，改归李仙洲之九十二军统辖。至此三十二军三师变成两师。蒋对付杂牌军，首先去其首脑，继而拆散其部队，配备武器皆为陈旧；三十二军之遭遇，正亦如此，因此战斗力薄弱，

士气低落，政治色彩，亦全为灰色。

## 五

一九四〇年，商震一度調为第六战区司令官，住在衡阳。但不到半年即被調往重庆，任軍委会办公厅主任，后又兼外事局局长，盖因商能英文，而且广交美国朋友。当时国民党投靠美国，关系密切，故蔣利用商作工具。但商在办公厅亦无实权，有一事足以說明：商旧部李杏村（洛阳专员）因开罪刘茂恩，被軍法执行部判处死刑，商欲救李而无能为力，特向侍从室人員著名特务唐纵恳求，始获幸免。商以后又調为总统府参軍长。

一九四一年一月，中英軍事同盟成立，中国組織緬、印、馬軍事考察团，以商震为团长，林蔚为副团长，赴緬甸、印度和馬來亞进行考察。一九四三年开罗會議，商震以高級随員資格与王正廷、林蔚随蔣去开罗。日本投降以前，商被派为駐美軍事代表团团长，在华盛顿时曾受杜魯門召宴。一九四六年商又担任駐日軍事代表团团长。頻年連續出国，为商震生平最得意时代。商多年希望作一高級外交官吏，至此可謂如愿以償。商喜欢夸耀，早年常言：“我妻（商妻楊曾照）英文字筆記本有三尺多厚。”商从开罗會議回来，我在重庆相遇，商謂：“我那本英文字典真够完善，在开罗时，王正廷想查生字都要找我。”言下极为得意。

一九四七年，笔者因案被蔣介石撤职，拘押国防部軍法处，不久取保外出候审，即住于南京商震住宅。其时商本人在日本，其眷属在美国。商在日本常与麦克阿瑟見面，麦为五星元帅，而商自己为国民党二級上將，仅有三星。在一次商返国述职前，曾請求何应欽准其在国外时暫帶四星，以便和麦接洽时較为体面云云。商

在东京生活闊綽，每次宴会有美丽日本侍女七八名穿梭招待。据说商在华盛顿有地皮、洋楼，在日本納一日妾，有人甚至說商已入日本籍。一九五六年有旅日华侨某君回国，謂商震住在日本作寓公，生活优裕，其海滨別墅租給美国人，每月可收美金数千元。聞张羣、王文湘（何应欽妻）到日本，皆下榻于商之寓所。最近有人看到，香港某画报刊登商震在东京打网球之照片，网球场的一边为商与华侨王某（在东京开北京飯店），另一边为两日人。商已七四高龄，精神尚极矍铄。香港画报用半諷刺之語气写道：“商將軍宦囊充裕，优居海外，悠哉游哉。”

商震为旧社会典型官場人物，生平八面玲瓏，极尽作官圓滑之能事，宦囊丰满，生活欧化。綜其一生，文职三任国民党政府省主席，武职历任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駐外軍事代表团长等高位，其終极目的，不外乎个人荣华富貴而已。目前在我政府干部中，有商震学生和屬下多人，如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共产党员王兴綱少将，炮兵副司令共产党员陈銳霆少将等，都为商震所办軍事政治学校学生。記得一九三〇年前后，王兴綱同志被北平軍警机关逮捕，經商要出；另一次何应欽指名索王兴綱同志，亦經商婉言拒絕。此些虽出于商对部屬之私情，但客观上对革命事业也曾起了一些作用，实际上彼亦別有用心，企图八面玲瓏，到处拉攏。据聞在国民党高級將領中，商未被列入战犯名单。彼亦以此沾沾自喜，自鳴得意。

笔者在商震旧部約二十年，一九四四年繼宋肯堂之后充当三十二軍軍长，完全受商的提拔，与蔣无直接关系。关于商震事迹在一九二五年以后者比較亲切，以前者多屬听聞，事实上可能有不尽之处。



# 萊蕪蔣軍被歼記

王 耀 武

一九四七年二月歼灭国民党軍两个軍及一个师的萊蕪战役，是解放軍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一次重要战役。

我当时任国民党軍第二綏靖区司令官，住在济南指揮战事（战場指揮官是第二綏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对于这次战役的实际战斗經過只知概要，現在将我所知到的关于这一战役的一些重要情况以及蔣介石对于这次战役的重要指示和他在惨敗后张皇失措的情形追述如下，以供有关方面参考。

## 一

国民党自一九四六年六月破坏停战协定，发动全国規模的反革命战争以来，在华东战場上屡遭惨敗。尤其在十一月以后，整編七十九师在宿迁被歼灭，师长戴之奇畏罪自杀；整編二十六师及归該师指揮的机械化的快速部队在山东嶧县城和在兰陵鎮地区被歼灭，师长馬勵武被活捉；整編五十一师在枣庄被歼灭，师长周毓英被活捉。在这种形势下，蔣介石妄想打几个胜仗来挽回頹势。他認為駐徐州的綏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揮不力，声名低落，所以于一九四七年一月間令參謀总长陈誠前往徐州指揮。陈誠奉命后即令其最亲信的整編十八师胡璉部由苏北开往临沂西南約四十华里的地区

候命，并电調在广东的整編六十四师黄国樑部开来徐州集結待命。陈誠也隨即由南京到徐州，与薛岳研究結果，决定薛岳仍駐徐州，陈誠进駐隴海路东端的新安鎮指揮。他一面命令整編十八师胡璉部、整編七十四师张灵甫部、整編八十三师李天霞部、整編廿五师黄伯韬部等向駐临沂一带地区的解放軍进犯，一面命令我派十二軍<sup>①</sup>霍守义部經明水及吐絲口鎮向萊蕪一带地区活动，形成对解放軍第三野战軍南北夹击的态势。

当二月中旬整編第七十四师等部向临沂进犯时，第三野战軍主力即作战略上的轉移，由临沂撤入沂蒙山区，一路撤至蒙阴一带，一路撤至沂水一带，准备进行大規模的歼灭战。至二月中旬陈毅、粟裕所指揮的部队，其先头已到萊蕪以西范家鎮一带地区，有包围李仙洲部的企图。

## 二

解放軍第三野战軍自临沂向北轉移后，陈誠就捏造战績，谎称已把第三野战軍击败，以图借此振作士气。他还打电报給我說：“我軍在苏北和魯南与敌作战，歼敌甚众。敌軍心渙散，粮弹缺乏，已无力与我主力部队作战，陈毅已率其主力放弃临沂，向北逃窜，有过黄河避战的企图；务須增强黄河防务，勿使其窜过黄河以北，俾便在黄河以南的地区歼灭之。”

陈誠把这个捏造的战績报告給蒋介石后，蒋介石就以为第三野战軍已无力量与国民党的主力部队作战，梦想乘机将第三野战

---

<sup>①</sup> 参加萊蕪战役的国民党第十二軍、七十三軍、九十六軍当时尙未改編为整編师，故本文仍称这些部队为“軍”；整編四十六师是由四十六軍改編的，实力等于一个軍，併此注明。

軍陳毅所指揮的部隊吸引于新泰、萊蕪地區而消滅之。他與陳誠擬定了新的作戰部署，由陳誠電令我執行。其電令的大意如下：

“‘匪’軍在臨沂等地失敗後，已無力與我軍主力作戰，有北渡黃河避戰的企圖，着該司令官派一個軍進駐萊蕪，一個軍進駐新泰誘敵來攻，勿使其繼續北竄。待我守軍將敵吸引住以後，再以部隊迅速增援，內外夾擊而殲滅之。”

我接到陳誠的電令後，認為陳誠誇大戰績。因為自一九四六年春至一九四七年二月，國民黨軍在蘇北及魯南地區並沒有殲滅過解放軍一個整師和一個整縱隊。又據整編廿六師逃回的被俘人員說，解放軍死傷雖大，但補充的新兵及武器很多，士氣旺盛，他們的下級幹部與士兵都不願意北撤。如認為解放軍已無力與我主力部隊作戰，顯然是錯誤的。當時我不同意分散兵力進駐萊蕪、新泰，曾建議仍以十二軍以博山為依托，在明水、博山、萊蕪之間地區活動，吸引解放軍，如解放軍的大部隊來攻，即退入博山的既設陣地，與在博山的七十三軍協同作戰。但蔣介石和陳誠都不同意我這一建議。二月十三日，蔣介石以親筆信催我派部隊進駐萊蕪、新泰兩城。信的大意是這樣：“佐民弟鑒：‘匪’軍在蘇北、魯南地區作戰經年，損失慘重，士氣低落，現已無力與我主力部隊作戰，並有竄過膠濟路、北渡黃河避戰的企圖。為了吸引住敵人，不使北渡黃河得有喘息的機會，而在黃河南岸將敵殲滅，以振人心，有利我軍以後的作戰，切勿失此良機，務希遵照指示派部進駐新泰、萊蕪。新、萊兩城各有一軍之兵力，敵人無力攻下，敵如來攻，正適合我們的希望。”

### 三

我看到蔣介石來信的口氣很堅決，一定要我派部隊駐新泰、萊

蕪，即召集副司令官李仙洲、副參謀長羅幸理、第二處處長陶富業、第三處處長錢伯英、第四處處長吳淦基等人研究如何執行蔣介石、陳誠的指示，並作了如下的決定，命令各部執行。

1. 先派正在博山、明水、萊蕪之間地區活動的十二軍軍長霍守義率領該軍一一一師、一一二師進駐萊蕪城；以新編三十六師進駐萊蕪以北的吐絲口鎮維護交通，到達指定地點後迅速構築工事，竭力搜集敵情，隨時具報。

2. 令駐膠濟路東端蘭村的整編四十六師師長韓煉成率領該師乘火車集中博山，集中完畢後即向新泰縣城前進。

3. 派副司令官李仙洲率領一部分幕僚人員及通訊人員等組成前方指揮所，前往指揮十二軍、整編四十六師；李仙洲於十四日先到博山督促部隊前進，待部隊進駐萊蕪後，指揮所進駐萊蕪指揮。

4. 派第四處處長吳淦基指揮一個保安團和章邱自衛團，協助十二軍的工兵部隊修通由明水經吐絲口鎮至萊蕪的公路，以利作戰運輸。

二月十四日，李仙洲帶著前方指揮所的人員到了博山，照蔣介石的指示督促十二軍及整編四十六師前進。十二軍原系東北軍，軍長霍守義一向把這支雜牌隊伍看作是他的政治資本，以保全實力為第一，決不願冒險，因此，無論李仙洲如何督促他前進，他的行動仍然非常遲緩。十五日行至苗山附近，李仙洲認為霍守義不聽他的指揮，感到困難，又恐行動慢了達不成任務，遭受蔣介石的指責，就將情況報告綏區司令部。我接到李仙洲的報告以後，為了使李便於指揮和易于達成任務起見，於十六日即令駐周村、淄川、博山一帶的七十三軍與十二軍對調，以七十三軍進駐萊蕪，仍以整編四十六師進駐新泰。

#### 四

二月十八日，七十三軍軍長韓濬率領該軍的直屬部隊及十五師，一三九師進入萊蕪城。十九日我接到韓濬的報告說，萊蕪西南地區之勸禮莊與萊蕪以西之方下集一帶發現有解放軍部隊（番號不明）並與我派出的搜索部隊發生接觸。同日，整編四十六師師長韓煉成率領該師由苗山以南的地區出發，經顏莊向新泰城前進，行至顏莊附近時，據報顏莊以東地區也有解放軍出現。當時我判斷解放軍有集中力量先消滅七十三軍、後殲滅整編四十六師之企圖。為了集中力量，不使分散，免被各個擊破起見，我即命令已到顏莊附近的整編四十六師立即開往萊蕪，到達後與七十三軍協力固守萊蕪。該師當日晚趕到萊蕪，與七十三軍匯合。李仙洲召集韓濬和韓煉成兩人共同布置防務，以七十三軍擔任萊蕪城的防守，以整編四十六師擔任萊蕪城南面山地的防守。

二月十九日上午九時許，七十三軍最後由博山開往萊蕪的第七十七師由該師師長田君健率領沿博山、萊蕪的大道行至何莊附近地區時，被在該處早埋伏好的解放軍猛烈襲擊，戰鬥甚為激烈。戰至黃昏，該師全部被殲，師長田君健在反攻中被擊斃。二月二十日晚，解放軍向萊蕪發動攻勢，尤以對西關、城西北角的高地、東關三處的攻擊最猛，均遭到防守該城的七十三軍的頑抗，未得手。二十一日，城東北角的高地被解放軍攻占，其他陣地無變化。

解放軍在向萊蕪城發動攻擊的同時，於十九日分出一部分兵力圍攻萊蕪以北的吐絲口鎮，以截斷防守萊蕪部隊的補給綫，該鎮西南兩面發生激烈戰鬥。戰至廿一日，新編三十六師不支，退縮至吐絲口鎮東南角負隅頑抗。

这时,守萊蕪的李仙洲向綏区要求接济粮弹,守吐絲口鎮的新編三十六师师长曹振鐸也要求綏区派部队解围。我綜合当时情况,分析如下:

1. 截至二月二十一日,尚未接到陈誠派部队来解萊蕪之围的指示。根据过去的作战經驗,靠援軍来解围是没有希望的;纵有部队来解围,也会在途中遭到解放軍的截击(如过去整編七十九师、整編二十六师、整編五十一师在被围时,解围援軍皆未能到达,結果都被歼灭)。

2. 萊蕪守軍既缺乏粮弹,而这样大的部队,光靠空軍投送,又无济于事;如粮弹断絕,也会遭到失敗。

3. 固守吐絲口鎮的新編三十六师师长曹振鐸一再要求派部队解围,而济南又无兵可派。如沒有兵去救援他,只有看着該师被消灭。

4. 二月二十一日上午据空軍的偵察报告說,解放軍有一万多人經泰安向肥城方向前进,并要求綏区加强济南西郊飞机場的防务。以用兵的一般原則和华东地区第三野战軍的兵力情况来看,解放軍是不会同时进攻两个大的作战目标的,但解放軍作战一向机动灵活,又加济南空虛,乘机来攻也不是沒有可能。

我据根以上的情况,认为固守萊蕪极为不利,守萊蕪的部队与其在萊蕪被歼灭,不如經吐絲口鎮撤至明水及其以南地区,东可以支援淄博矿区,西可以保卫济南,又可以解吐絲口鎮之围。我下了北撤的决心后,于二月二十一日令李仙洲妥为研究經吐絲口鎮北撤明水及其以南的部署,同时派綏区副参謀长罗幸理攜帶我的信到南京向蔣介石报告情况与撤退的决定。蔣介石看了我給他的信以后,沉思半响,对罗幸理說:“敌前撤退不利,既已下令北撤,应特

別注意后尾及兩側的安全。”蔣說完了以後，帶着不安的情緒又匆忙地給我寫了一封信。這封信的大意如下：“羅副參謀長帶來的信已收閱。敵前撤退如部署不周密，掌握不確實，就會受挫折。應作周密的部署，並派強有力的部隊擔任后尾及側尾的掩護。固守吐絲口的新編三十六師必須堅守原陣地，以作北撤部隊的依托。我當嚴令王叔銘指揮空軍集中力量襲炸掃射，竭力掩護部隊轉移。並祈上帝保佑我北撤部隊的安全和勝利。”從蔣介石這封親筆信中，可以充分看出他已經感到他的部隊是無力戰勝解放軍的，他對反人民戰爭已經喪失信心，所以在他無可奈何中只好祈禱“上帝保佑”。

## 五

李仙洲奉到北撤的命令以後，於二十一日與韓濬、韓煉成研究北撤的部署。李仙洲、韓濬主張二十二日撤退，而韓煉成認為撤退需要準備的時間，主張二十三日開始行動，最後決定於二十三日開始北撤。李仙洲指定以七十三軍派出有力部隊為左側衛，特別注意對左側山地之警戒，掩護主力安全，該軍的主力沿通往吐絲口鎮的道路前進；以整編四十六師派出有力部隊為右側衛，特別注意對右側山地之警戒，掩護主力北撤，該師主力在七十三軍的進行路線以東沿赴吐絲口的另一道路前進。李仙洲自己率領指揮所的人員隨整編四十六師前進。

由萊蕪向北撤的部隊於二十三日上午八時許行至萊蕪、吐絲口鎮中間地區時，解放軍從左右兩側山地以排山倒海之勢，向七十三軍及整編四十六師猛烈攻擊。在此千鈞一髮之際，蔣介石不斷來電詢問戰況，並嚴令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指揮空軍集中力量向來攻的解放軍猛烈襲炸掃射，盡全力掩護北撤部隊撤至指定地

点。于是王叔銘調动了几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并亲自駕着飞机至戰場上空指揮空軍輪流轰炸扫射。解放軍的高射机枪也不断地向飞机射击，又加地面正值酣战，炮火連天，战斗极为激烈。解放軍前仆后继，奋勇先将七十三軍及整編四十六师所派出兩側的掩护部队击潰，攻占兩側山地，然后居高临下，繼續向七十三軍、整編四十六师猛攻。解放軍虽不断受到飞机的轰炸扫射，但为了捕捉战机，毫无畏惧，攻势越来越猛。我因战况万分紧急，要求王叔銘再增加飞机前来助战，片刻不停地向解放軍轰炸，并且对他說：“只有这样还能将北撤部队救出一部分，否則要全部歼灭。”王叔銘回答說：“我指揮着飞机轰炸，一直沒有中断，可是敌人不怕死，阻止不住他們前进，我有什么办法。”战至十一时許，七十三軍及整編四十六师被迫后退，縮成一团，混乱不堪。韓炼成目睹战事恶化，即率少数部队脱离該师的主力向东南山地逃去，后又逃往青島。这时国民党的官兵处处听到解放軍发出的“优待俘虏、繳枪不杀”的喊話，軍心已散，至午后二时許全部被歼。防守吐絲口鎮的新三十六师师长曹振鐸，見解放軍正在集中力量围歼由萊蕪向北撤退的主力部队，放松了对新三十六师的攻击，以为这是他逃命的好机会，就放弃支援北撤部队的責任，于二十三日午下午一时許率領該师殘余的千人，放弃吐絲口鎮向淄博逃窜，后又逃回济南。

萊蕪战役計歼灭国民党軍一个軍、一个整編师、一个新編三十六师，共約六万多人。將級軍官除整編四十六师师长韓炼成、新編三十六师师长曹振鐸两人逃脱外，其余的不是被击毙，就是被活捉。副司令官李仙洲受伤后被活捉，在前方指揮所工作的第二綏靖区司令部第二处的处长陶富业、七十三軍軍长韓濬、副軍长李琰、十五师师长楊明被活捉。一三九师师长蕭重光、十五师副师长徐亚



雄受伤后被活捉。七十七师师长田君健被击毙。整编四十六师副师长陈炯、副师长兼整编旅旅长海竟强、整编旅长甘成城、整编旅代旅长曹威均被活捉(整编四十六师所属三个旅的番号回忆不起)。

## 六

国民党军在莱芜战役中被歼灭了六万多人，这一惨败不但使济南的人心恐慌不安，也震动了南京和吓慌了蒋介石。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时许王叔铭将自驾的飞机降落到济南机场后，立即用电话向蒋介石报告说，他驾机在莱芜、吐丝口镇一带上空侦察，亲见地面上已无战斗，看样子我军已被全歼了。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带着惊慌的口气问王叔铭说：“啊！你看清楚了么？”王又说，“我对地面上业已详细侦察，确未见地面上有战斗。”蒋又说，“你再派飞机去看看还有什么情形。”

蒋介石怕解放军在莱芜将李仙洲所指挥的部队消灭后，会乘胜进攻济南，而济南兵力单薄，如一旦被解放军攻占，将使他的反革命战争更陷于不利的处境。因此，他就决定偕军务局局长俞济时和参谋次长刘斐飞赴济南，以“振作”防守济南的军心，并亲自指示济南的防务部署。

二十三日莱芜战役结束后，我因济南兵力单薄，正在忙着调动部队部署济南的防务，忽然接到济南机场空军基地司令部的电话说，今日午后南京有重要的人来机场同我谈话，来的人不进市区，请我到机场来等候。我问什么人来，他们不肯说明。我以为可能是南京国防部派高级人员来指导济南的防务部署，到了机场空军基地司令部才知道是蒋介石亲来济南。等了一会，蒋介石所乘的专机在济南机场降落后，蒋介石站在飞机门口向前看了看，又

向我看了一眼，就下了飞机。蔣往日见到我，都是带点笑容，这回可不行了：板着面孔，一言不发，一面走着，一面盯了我几眼，就坐汽车到空军基地司令部去了。他进了给他预备好的房子里，尚未坐定，就急着向我问情况，我的回答大意如下：

“1. 敌人将我在莱蕪的部队歼灭后，正在清扫战场。如敌军只留一部分清扫战场，而以主力经西营（济南东约四十公里）向济南前进，比十二军由周村、淄博一带来济南还近五十公里；但西营尚未发现敌人的正规部队，济南西北两面在四十公里内没有敌人的大部队活动。

“2. 在莱蕪的部队被歼灭后，为了集中兵力加强济南的防务，已令十二军及绥区特务旅放弃周村、张店、淄博等地。特务旅（三个团）已乘火车开回济南，十二军（缺新编三十六师）沿胶济路以北经龙山镇向济南急进中。

“3. 济南现在只有绥区直属部队和九十六军陈金城部，这些部队的战力都不强。济南周围既设阵地约有二十公里长，本来计划是用三个军以上的兵力来守的，以济南的现有部队来说，实感单薄，只有缩短阵地，重点配备。”

我报告了以上情况后，蒋介石说：“济南是战略要地，必须固守，东南两面地形复杂，易于接近，防御重点应放在东南方面，并确保千佛山。为了使阵地与兵力相适合，须缩短阵地，重点部署。应催十二军迅速集中济南。对于民众组训必须加强，以增作战力量。”

刘斐接着说：“当初派兵进住莱蕪，我是不赞成的。部队既已进住莱蕪并被包围，就不应该撤退；现已失败，只有当作经验教训。”他又说：“马上来攻济南的可能性不大，但为济南的安全，妥

为配备也是必要的。陣地縮小,重点放在东南面,在重点的地方必須縱深配备。”

二十三日午后約七点鐘的时候,蔣介石把我叫到另一間屋內,气忿忿地,紅着脸,瞪着眼睛狠狠地罵了我一頓。他說:“你們只是在萊蕪这个战役里就損失了两个軍另一个师,損失了这样多的輕重武器,增加了敌人的力量,这仗以后就更不好打了。这样的失敗真是恥辱。萊蕪既已被围,你为什么又要撤退,遭到这样大的損失,你是不能辞其咎的。这次你选派的將領也不适当,李仙洲的指揮能力差,你不知道嗎?撤退时他连后尾也不派,这是什么部署?你为什么派他去指揮?如派个能力好的人指揮,还不致失敗。李仙洲已被敌人捉去,你們要知道,高級人員被捉去,早晚会被共产党杀掉的。济南無論在軍事、政治、地理上都是很重要的,如出意外,你要負責。”

二十三日当夜,蔣介石在济南飞机場空軍基地司令部一間房子里,提心吊胆地过了一宿。他老是怕济南发生事故,使他遭到不測。他一再叮囑俞济时注意情况和飞机場的警戒。于是俞济时派人守着蔣介石坐来的专机,加强了机場里的警戒,夜里又两次向我問情况,表現得非常恐慌紧张的样子。二十四日上午七时許,我帶着第二綏靖区副司令官兼青島警备司令丁治磐到蔣介石那里去,看到蔣介石滿脸青灰色,好象一夜沒睡好的样子。他先問我十二軍到了什么地方,我回答說,十二軍的主力还没有到龙山。蔣介石又板着脸发了一頓脾气,喋喋不休地罵李仙洲无用,在萊蕪葬送了这多部队,太不成話,又說他今天上午回南京,不等霍守义了。他写一封給霍的信,要我派人送去。这书信的大意如下:“守义弟鑒:萊蕪的失敗是我們的恥辱,济南要地必須确保,与‘匪’作战意志一定

要堅強，望隨時鼓勵士氣，勿使官兵受到萊蕪戰敗的影響。”

上午九時，蔣介石在空軍基地司令部召集國民黨駐濟南的黨、政、軍及省參議會的負責人員二百多人訓話，進行“打氣”。他嘴硬心怯、言不由衷地說了一套欺人自欺的謊話以後，就於上午十時許垂頭喪氣地飛回南京去了。

## 短 稿 十 篇

### 中俄密約与李蓮英

叶 恭 綽

前清与帝俄所訂喀西尼密約，世皆传为李鴻章所为，其实李只系演出者，其編剧导演固由帝俄，而被动主体则为西太后；从中促进和穿插为李蓮英与璞科第，則世人知者不多也。李与璞科第之联络，实由西郊白云观高道士为媒介。璞科第乃一国际偵探，其与高因何結合，不得而知。其时楊梅竹斜街有一“万福居”飯店，在对門另設雅座，璞与高、李专在此晤談，此雅座他人不能到也。高死于光緒三十三年，其訃聞所列御賜之物致占四頁之多。每有双方传达之事，則由高約璞、李会晤，一轉即直达西太后；至将达表面，始由軍机处及总理衙門搬演耳。李鴻章之被指派签字，亦出帝俄之意，以为如此可以压服許多方面，且以其时李方为日本所挫敗，必欣然任此耳。然因此而又惹起英法德之爭，紛起而謀对付，左支右絀，以至危亡，則西太后固料不到也。

### 英、德、美、日对袁世凱关系的内幕

叶 恭 綽

袁世凱倚外力以自重，尤显者在英国方面，而朱尔典实为其枢紐。朱尔典固为发展英国在华势力計，然利用私交之关系，易于进

行，亦其中一大關鍵（朱尔典与袁之私交，始于同在朝鮮时）。辛亥年袁出山后，一切规划，朱尔典多与其謀；居間奔走，实为蔡廷干等。且朱工華語，有时直接交談，亦不賴通譯也。据余所知，辛亥革命初汉口英总領事之态度，及其后袁与黎元洪交涉，南北議和各重要事，朱尔典皆多所运筹。其于制造袁之权位，实极費苦心。其所以如此，則因英国自从甲午后，中俄密約成立，对华力量大受挫折，至袁下野后为尤甚。故英廷政策已一貫趋于毁灭清室，一方面即极力培植他方势力以为之备；袁之出山，正英国恢复在华势力之机会，故积极加以运用也。自是而后，各国竞相角逐，爭欲拥袁。于是德国該撒首先結袁克定，以帝制之說进。克定民二自德回国，即以說乃父，遭其拒絕，其后寢以得势。英朱尔典先訶知之，面以問袁，因而默契。美亦繼之，古德諾博士因而来华倡帝制之說。日本知己落后，以之詢袁，袁仍否認。日本乃大怒，以为袁設得志，日在中国将无立足之地，且将修朝鮮旧怨，于是断然决定倒袁。故民国三、四年間，日窘袁之事不一而足，最后乃有二十一条之提出。逮袁死段繼，日本乃大弄其手腕，造成西原借款等种种把戏，并向协約国担保，劝誘中国加入协約国一方以对德，无形中表示东方之事，日本可以操縱焉。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曾有数次拟单独对青島有所行动，又德国屢次欲将青島直接交还中国，而英法美亦屢次劝誘中国加入协約国，皆为日本設法所破坏。日本乃一面向协約国講条件，謂“你們如要中国加入，非由我日本劝誘不能成功。”各国无法，乃暗許以战后可由日本繼承德国在中国的权利，但未以告中国。逮巴黎和会开幕，日本早已与各国协約妥当，我国犹在鼓中。

## 孙 传 芳 驅 奉

邢 贊 亭

第二次奉直战争后，奉軍漸向江南扩张势力范围，一九二五年夏任命姜登选为苏皖鲁剿匪总司令，駐徐州，并派邢士廉一师駐沪，丁喜春一师駐宁，归其調遣（楊宇霆到苏后，自行节制）。逾数月，又拟以姜登选督苏，郭松龄督皖，嗣因楊宇霆自欲出任苏督，改以皖省畀姜。楊既蒞任，其呈报张作霖电，有“江南父老夹道欢迎”之語，妄自夸耀，本非真实情况；兼以傲慢自大，陈調元初赴車站迎接，既拒其入，繼往督署晉謁，又辞而弗見，待遇毫无礼貌，致使陈頓足而去，祸机已伏于此。

当战争将起之际，孙传芳派参谋馮越千（馮国璋之侄）持书来蚌埠謁姜，謂：“楊宇霆指使邢士廉暗結夏超（浙省长）协以謀我，公有所聞否，其将何以处之”云云。姜以此事詰邢，邢力白其无；繼复詢楊，所答亦同。姜复孙书，謂：“已分別問明，楊、邢同声否認，請勿过于疑虑。我当从中斡旋，决不使輕启衅端。”越数日，孙复遣馮越千来謂：“楊、邢所告非实，我已获有确証，非我凌人，人已凌我，万难再行隱忍；虽然，决不北犯皖境”云云。于是孙乃借詞上海不得駐軍，大举入苏；苏軍陈調元、白宝山等起而附和。楊宇霆仓皇失措，計无所出，尽搜括中国銀行所有現洋，載之北返。路过徐州，与姜晤談一切，移时复去。姜曰：“我与麟閣結交有年，今始識其无能。将两师萃于一处，据險結陣，犹堪一决雌雄；不幸而敗，再退不迟，何至惊惶若此，弃师而逃。”

初姜之赴皖也，仅携一营自随，到后謀招两旅以資警卫，时日

尙淺，未及着手而變起。時皖軍共有四旅，倪朝榮、王普、章淩章三旅均駐他處，間有響應浙孫者；惟馬祥斌一旅近居蚌埠，示無他志。姜通電主張和平解決，詞雖痛切，卒歸無效，乃決意以皖政還諸皖人，遣衛隊先回徐州，與皖人坦然相見。臨行之日，召集紳商各界開會宣示此意，謂：“就職以來，時才二十余日，出納各款，均有簿記登載，用之于皖，不私一文；即本人俸給，亦一無所取。”當以安徽督辦軍務事宜印信面交馬祥斌，委其代行職務。報告既畢，紳商齊集車站歡送。姜自乘張宗昌派來之鐵甲車，其督署各處人員乘火車，由皖軍護送至徐州邊境始別。比抵徐州，張宗昌之大軍已雲集于此。張謂姜曰：“軍事非吾所長，願舉山東各軍听公指揮。”姜婉詞謝之，退而告其寮屬曰：“此等隊伍平日漫無紀律，豈吾輩所能指揮。此處非久留之地，詰朝宜速去。”遂率所部北至德州暫駐。

姜既離徐，張宗昌乃以魯軍宿將施从濱為前敵總指揮，與浙軍戰于南徐州之任橋，大敗；施亦被擄，旋為孫傳芳所殺。其他援軍，再戰于夾溝之符離集，亦潰。力窮勢蹙，張始退出徐州，自返濟南。孫氏無力北侵，奉亦不敢南下，戰事告一結束。邢士廉師繞道北旋，途中為陳調元截擊，損失嚴重，几至潰不成軍；而丁喜春師幸得全師而歸。自此，江南無復奉軍之迹矣。

## 姜 登 选 之 死

邢 贊 亭

一九二五年，姜登选率部离皖后，到德州始接張作霖命令，任為第四方面軍軍團長，先成兩旅，移駐北鎮，于是委城翼翹、陳深為旅長，先往東北布置。時郭松齡前赴徐州，與張宗昌接洽軍事，路



过德州，下車謁姜，執禮甚恭，此其反奉前十余日之事也。姜在此无他任务，复率各处人員赴津，居友人陈之驥处（馮国璋之婿），本定稍事勾留，再返奉天。嗣接张作霖急电促其速归，遂与随行人員仓卒启行。张国淦在黎元洪处聞郭松龄反奉消息，一日訪陈之驥数次，意欲使其告姜，迄未得遇，故郭之举动如何，事前毫无觉察也。

姜抵灤州站，郭派人来告曰：“有軍事相商，請軍团长至城内一談。”姜随之俱去，其随行人員亦皆被迫下車，載之入城。到后閉置一处，禁与外人交通。郭既拒而不見，姜亲笔写信与之，謂彼此共事多年，前在黑、粵两省，所以提携者甚至，并无相負之处，回思往事，当能諒其无他云云。郭置而弗答，离灤之夕，派兵擄去枪杀，始赴前綫。所扣押之随行人員，則解送天津交李景林处理，到即一一释放。

姜死后，灤州友人张淦臣收遺骸殮之。友人之留津者，請李景林电郭索还尸体。李对姜蓄有积怨（朱庆澜督黑时，姜为督署參謀长，許兰洲起而驅朱，李乃师部參謀长，互相敌对之故），意极不悅，然迫于乡誼关系，勉强为之拍发。郭复电允派人往領。方声涛与姜交誼最篤，时客居张家口馮玉祥处，馮、郭本系同謀，灤州又有馮部駐守，故得亲迎其柩至津。翌年春，由朱庆澜、邢之襄送回南宮安葬。

至姜之被杀原因，实起于山海关之役。当时姜領第一軍，张学良領第三軍，合組一、三联軍，由姜指揮。郭副第三軍，故隶姜节制。其炮兵营长閻宗周，乃郭之亲信，因攻九門口不力，被姜撤职严責，九門口乃下。郭大怒，两軍正在酣战，忽率所部而退。张学良亲自追回，令其向姜謝罪。姜虽未之深究，然仇恨已固結而不可解。既挾有宿憤，又忌其才能，留之于己不利，故剪除以絕后患。論者謂郭之失敗，受杀姜之影响匪細。各將領之在奉者咸曰：“超六

为人和平，郭犹不能相容；一旦获胜，吾輩宁能保其首領乎？”于是激励各軍，士气百倍，韓麟春慨然出任总指揮，尤志在必克云。

## 四 一 二 事 变 点 滴

周 振 强

### （一）蔣介石取消“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口号

一九二七年三月初旬，国民革命軍第一师在上海附近打败了北洋軍閥毕庶澄部后，就进驻上海南市新龙华一带。当时我任該师第二团团党代表兼一营营长，率部驻扎在南市淞沪警察厅內担任巡查任务。当时我奉到师党代表鄧悌的密令：“現奉总司令蔣的密令：上海是外人聚居之区，为了避免冲突、引起外交糾紛，着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改为‘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口号”等語。我当时就执行了这个密令。

### （二）蔣介石借口維持治安，命令繳工人糾察队的枪

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某日，我奉到团长胡宗南的密令說，駐南市某会館的工人糾察队紀律不好，有碍治安，命我率部于明日拂晓將該工人糾察队的枪全部收繳，将人員解散。我奉命后，即于第二天拂晓率部將該工人糾察队包围，冲进大門，擲了一枚手榴弹，伤了几名工人，因而在工人糾察队沒有抵抗情况下，我将全部糾察队解散，繳了长短枪枝約一百二十余支上繳团部。

### （三）蔣介石借口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实行清党

一九二七年四月初旬，我奉到师党代表鄧悌的命令，叫我到师党代表办公处开会。开会时，鄧悌宣布說：“現在共产党到处煽动农民暴动分土地，要实行共产主义。孙总理說过，中国只有大贫小

貧，共產主義不適用於中國，只有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共產黨這種行動，是違反三民主義的，是破壞國民革命的。現在校長命令：為了實行三民主義，繼續北伐，要實行清黨，將第一師中的共產黨員清除出去”，等等。他並當場命令我將第二團共產黨員名單開給他。會後的第二天，我到師黨代表辦公處時，看到約有三十余个共產黨員被扣押，其中有浙江諸暨人共產黨員蔣友明，後來被鄧梯暗殺了。

## 國民黨軍隊屠殺廣州暴動羣眾目擊記

鄭庭笈

一九二七年八月，我在黃埔軍校第五期畢業後，在該校高等教育班步兵隊充當學員。當時教育班是在廣州市天字碼頭附近一間樓房上，和李濟深第八路總指揮部所住的肇慶會館是比鄰。

同年十二月十日深夜三時左右，我們正在睡眠中，被四周的槍聲驚醒了，一瞬間紅軍起義部隊把教育班包圍起來，正打我們住處的大門。步兵隊隊附李忠平很沉着地喊着：“不要開槍，我們是教育機關，沒有武器。”接着他把大門打開，隨着進來了一班武裝戰士，左臂上掛着紅布。我們都睡在床上不動，戰士問我們有無武器，我們回說“沒有”，他們就出去了。隨後，外面的槍聲打得更密了，到十一日早上，肇慶會館被起義部隊占領了，第八路總指揮部的衛兵也被解除了武裝，工农兵革命政權在廣州成立了。到了第三天，就是十三日那天，教育班的步兵隊正準備發給每一個學員一條紅布，派學員到公安局去見惲代英（他是我們第五期的政治教官），向他請示和接洽我們的補給等問題。那知十三日晚上，李福林的反動

軍隊就从珠江对岸的河南,在美英帝国主义的兵艦炮火掩护下,向天字碼頭肇庆会馆进攻。十四日正午重占了肇庆会馆,起义部队有计划地向市郊撤退。十五日,李福林部反动军队在广州举行大屠杀,光在天字碼頭(高等教育班住址的后面)空地上,当天下午黄昏前,就枪杀了二百名左右的工人和共产党员。我們在樓上看見,都吓得心里直跳,也不忍再看下去。从容就义的革命战士,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十七日,我到惠爱东路长塘街第四十二号我族叔郑兰先那里去(他在广州法政学校讀書,是共产党员),把天字碼頭反动派大批屠杀共产党员的情形报告給他,要他注意。他說:“在东較場和西关等地方杀得更多得多,天字碼頭只杀二百人还是少的。”后来反动军队搜查得非常厉害,他就离开广州,从这以后和他就失掉联络了。

## 記蔣介石中原大战时的一段談話

米 暫 沉

一九三〇年四月,閻錫山、馮玉祥联合反蔣的中原大战快要爆发的时候,蔣介石在汉口召集了京汉綫作战各部队的將領开軍事會議。根据會議的規定,参加會議的將領得帶參謀或秘書一人陪同列席會議,我以討逆軍第十七路总指揮楊虎城的秘書身份,随同楊总指揮参与了这一次會議。

會議除研究討論一般作战部署而外,到最后一天,由蔣介石在某銀行的大厅对各將領“訓話”,指示作战要点。

蔣在“訓話”中突出地強調了一点,大意是这样:“作战的關鍵問題,是对敌人兵員的杀伤。只有对敌人兵員的大量杀伤,才能解

決戰事。槍械彈藥，我們既可以自己製造，也還可以從外國大批購買。在這一點上，我們比敵人條件优越得多。你們應當大胆放手地盡量利用我們的優勢炮火，予敵人以重大的殺傷。我們損失一些槍支或者多消耗一些彈藥，沒有關係；我可以立即給你們補充，繼續作戰。同樣，在敵人方面讓他損失一團槍支，沒有什麼意義，如果能夠殺傷他一團的兵員，他至少需要三個月時間才能補充訓練完成，投入戰場。三個月時間，這是決定戰爭的一個重要因素，你們必須注意！……”

蔣介石用他那尖銳刺耳的聲音，揮着拳頭，聲色俱厲，特別是對於“殺傷”兩個字加重了語氣。講到最緊張的時候，讓你只聽到“殺、殺、殺”的聲音，儼然象是到了戰場。

蔣介石講畢後，宣告散會。各將領在走出會場時，相視愕然，表情都很緊張。他們離開會場後，三三五五地自由結合着去吃飯。楊虎城、徐源泉、王金鈺、蕭之楚幾個所謂雜牌將領在一起，走進了一個飯館的飯廳，大家放下皮包，拉開椅子坐下，彼此相視而笑，這樣才把緊張空氣緩和下來。

他們一面吃飯，一面談話，除談一些作戰布置以及準備什麼時候回防地而外，主要地還是談蔣介石的講話。

王金鈺首先發言，他說：“老總（指蔣介石）今天的精神很好，對戰事也滿有信心，我看這一仗不會失敗的。”

徐源泉接着說：“是的，不過老總的說法我覺得太露骨了。打仗嗎，本來就是殺人事情，為什麼還要那麼說？”徐源泉對在座的人掃了一眼，繼續說：“你們覺得怎麼樣？我覺得我們回去對部隊不好那樣傳達，太殘忍了。”

王金鈺接下去說：“是啊，我們打的是內戰，殺的都是中國人。

老总今天的讲话，不象是‘国家最高领袖’对内作战的说法。敌人的兵员同样是中国老百姓。我想，我们不能这样传达下去。”

在座的人一致点头同意了徐、王的意见。大家慨然地说：“太不象‘国家最高领袖’了。”

这并不算是一件大事，但可以作为蒋介石残忍成性和“内战内行”的说明，故记录下来。

## 喜峯口宋哲元大刀队擒获日本坦克之谜

唐 永 良

一九三三年春，平津各报盛传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大刀队在喜峯口擒获日军坦克。天津《大公报》并刊登宋部大刀队俘获日本坦克的照片。于是各地向宋哲元函电祝贺并捐赠大批慰劳金，可是谁也没看到宋部俘获的坦克在那里。此事一经揭穿，真是一钱不值。

当一九三三年初长城抗战的时候，商震部三十二军军部驻在开平镇，商震为了使官兵们认识认识坦克是什么样子，就叫副官参谋们做几个坦克模型。他们用木头作架子，用布和纸糊起来，一共做了两三个，比真坦克小的多。那时谁也没有见过坦克，不过是从画报上看见过一些照片。三十二军所做的坦克模型在远处看去，大致有些像，如果到近处看，就根本不像。

那时我充当三十二军军部副官处长，这件事是我经手的。

我从一九三一年开始学习照相，非常入迷。对于这些假坦克，我认为是很好的照相材料，于是找了几个商震卫队的士兵，手持大刀，身背短枪，把坦克模型放在中间。为着要迷惑观众，我取的是“逆光”摄影法，照出来是黑像，仿佛像剪纸的样子。我把这些照片

寄給当时的天津《大公报》，注明是宋哲元所部大刀队在喜峯口夺获日军的坦克照片，《大公报》非常欢迎，就刊登出来。我为什么写宋哲元部队而不写商震部队？因为当时宋部二十九军在喜峯口抗战有些虚名，实际上战斗力也比三十二军强。那时《大公报》画刊负责人是杨敬慈，他不时和我通信索要照片。这些假坦克照片刊登之后，社会上对宋部二十九军热烈赞扬，送慰劳金等络绎不绝。宋部也就以假作真，派人到天津《大公报》索要这些照片，以便转送各方面。记得杨敬慈给我来信，要求加印多份寄给他转交宋部驻在天津的负责人，我曾照办。

商震听说我替二十九军作宣传，二十九军并且因此得到不少的好处，他很不乐意，把我叫去，责备我为什么不替三十二军宣传。我说：“我的动机只是出于一时的游戏，根本没考虑到它的后果。”

## 保卫武汉时期蒋介石的一件通敌罪行

張 有 谷

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驻在武汉的蒋介石的侍从室突然送了一封密要信到江汉关码头上日清公司三楼的航空委员会军令厅，要派一架可靠的飞机把这封信空投给当时到南京慰劳日本占领军的日本秩父宫亲王。我当时在军令厅工作，由于信来得奇怪，又系对敌空投，这件事引起我的严重注意。我就把它拆开来匆匆看了一遍，记得内容共分两项：一是如果日本停止在关内的军事行动，可以考虑把东三省全部割让；二是责备日本军队对中国平民的残暴屠杀。我看过后，认为事关重要，东三省虽然事实上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但这一来岂不是给以法律上的承认，永远不能收

友？因而我当时还在我的日記上面記下了此事。

派去空投的飛行員名叫湯卜生，國民黨空軍學校三期畢業生（以後不久就在衡陽空戰中陣亡了），駕駛的是一架美制霍克 75 式歼古機，是當時國民黨空軍僅有的一架最快的飛機。

事後，因飛機飛往南京方向，被空軍和防空部隊很多人知道，暗中議論紛紛，國民黨空軍當局不能不加以解釋。乃由空軍政治部門命令湯卜生寫了一篇謁陵記，登在當時的《空軍半月刊》上面，內容說湯如何懷念孫中山先生，情不自已，冒險飛往南京謁陵致敬，企圖以此來掩蓋蔣介石的這樁通敵勾當。其實湯卜生的謁陵記，只要稍加分析，就漏洞百出。試問：在保衛祖國的神聖戰爭中，一個飛行軍官怎能在沒有命令之下私自駕機飛行，而且飛往敵後活動？回來既未追查，更未受到處分，反而在正式的軍隊刊物上面登載他寫的“自白書”，這不是欲蓋彌彰嗎？

## 蔣介石和漢奸照像

唐 永 良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派他的親信王仲廉率領第卅一集團軍進駐豫北，拉攏漢奸，準備反共。一九四六年春天蔣介石偕宋美齡到新乡視察，王仲廉召集了駐在豫北各地的國民黨高級將領二十餘人，包括著名漢奸龐炳勛、孫殿英、張嵐峯等在內，齊集新乡見蔣。蔣對這些人除設宴招待，“慰勉”有加外，還和大家在一起照了集體像。集體像照畢後，蔣坐在那里輪流站每一個人站在他的旁邊合攝一照，以示恩寵。事後龐炳勛、孫殿英等把他們和蔣的合照放大印出，分送給他們的部屬和親友，以示炫耀。



## 辛亥前后的江北名流

沈 蓆

甲午战争以后,在江苏誉为“江北名流”的张謇、沈云沛、許鼎霖諸人,在兴办实业方面的活动,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过一定的促进作用。茲分段叙述如次。

### 一

在清末兴办实业的江北名流当中,以张謇和我父沈云沛二人的影响較大。张謇在通海(南通、海門),沈云沛在海贛(海州、贛榆),两人齐头并进。特别是通海距上海較近,条件較好,故张名亦最著。张謇在甲午前后,因参与吳长庆、翁同龢的决策,久已声誉鵲起。沈云沛亦已在浙江撫幕著名。但是他們个人行动同地方上发生联系,則是在甲午以后开始的。茲将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旧历四月初四日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奏片全文抄录如下,作为本文的开始。其文曰:

“再,江南所属之海門厅,滨临大海,通州鎖钥长江,由北岸陆路可径赴揚州,为南洋門戶。海州內隔徐淮运道,东北一带濒海三百余里,可登岸之处太多。当此海氛告紧之际,虽由臣提調营勇,扼要驻扎,而地广兵单,不敷分布,非举办团練,无以团结民心而輔兵力。除遴委干員分赴沿海沿江一带会同地方盐务各官,劝办漁团、民团、甯团外,茲查有通州丁憂在籍原居海門紳士翰林院修撰张謇,学識素优,博通經濟,实心任

事，允洽乡評。海州在籍紳士沈云沛，品行端謹，才具优长，尽心任勞，乡人推重。該二員于本处之地利民情，均极熟悉，而于保卫桑梓，均能力任不辭。当經照会張謇辦理通州、海門厅兩属团練，通海唇齿相依，正可互相聯絡。沈云沛辦理海州属团練，均飭令就地筹款，募練壯丁，会同地方印委辦理。由臣部給軍火品械，于开壕筑垒各事宜，各就本地情形酌量劝办。令团練与防营聯絡一气，以收众志成城之效。張謇系丁憂人員，臣勉以移孝作忠，循古人金革无避之义，誼无可辭。沈云沛系請假回籍，現值假期屆滿，即当回京銷假，相应請旨准令該庶吉士俟軍务平定后再行回京供职散館，实于防务有裨。”硃批：“着照所請。”

此次辦理团練，系在中日战争最吃紧的时候。当时国势危急，張之洞叫他們办团練，是希望他們能做出中流砥柱的大事业。希望心很大，办起来不会不郑重，規模也不会小。当我父沈云沛辦理海州团練的时候，我年尚幼，事情当然是全不知道，只据若干年以后所听到的，是：他及其一同办团練的人，心情是很紧张的。因为規定是就地筹款，为避免骚扰，就避免募捐，因而毀家紓难的也頗有其人。办了几个月，团練粗成，而和約簽訂，又忙着遣散了。在当时認為是白吃了辛苦，但因此养成乡望，以后辦理地方实业，也可以說自此开端。不过沈云沛当时还没有办什么实业，这一点，落在張謇后面了。

張謇辦理通海团練，在張氏自撰年譜中，固沒有很詳細的敘述，《張季子九錄》全書中，也找不着任何规划团練的文章，只記載了：“張孝達由湖廣總督移任兩江，奏請朝旨任余總辦通海团練，鑒于乡前輩办团練筹款之弊，不任募捐，以書二十四檳付典肆抵質銀千圓，分助通海团練，为乡人倡。”又：“聞天津和議成，……蓋割地賠款之辱兩兼之。閏五月通海团練撤防，七月南皮留談商务归，有筹辟海門滨海荒滩之議”等語。可見張謇虽对于团練沒有尽了多大力量，但通海垦牧却就这个机会开其始基。另徵其他文件，張謇

所办的最大事业——大生紗厂，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奉了张之洞的照会而筹办的。不过，张之洞不久又調回湖广，张謇在这个短时期内，尙沒有办出什么成效。

## 二

张謇由办团練进而办地方实业，而成为江北首屈一指之名流，系自此开始。但他在甲午以前，已經显露过头角。茲再简单补叙一点：

张謇是南通人，在一八五三年生于海門厅的常乐村，是他父亲寓居的地方。因为他的家門多少代沒有人应考，在当时称为冷門，冷門虽不是絕對不許考試，但取得廩保順利投考，却也不很容易。他父亲乃特別設法，和如皋县一个姓张的訖了同宗，张謇去如皋应考，取了秀才，如皋人却譁然反对，羣起告他冒籍。他父亲想了却此事，到处求人，到处花錢，几乎破产。张謇憤极，瞞了父亲，递稟学院，請学院斥革去他的如皋秀才，发回南通再行考試。学院彭久余发现他的文字很好，令飭南通州知州孙云錦調停此案。孙云錦亦爱其才，想了种种方法，把他改成南通州籍貫的秀才，以后把他帶到南京，更把他介紹給世交吳长庆，做了他的总文案，遂使一个乡村秀才得到机遇，变成了当时知名之士。张謇到吳幕府，始于一八七六年，时駐浦口，一八八一年移登州，一八八二年朝鮮东学党肇乱，吳长庆奉命渡海东征，将朝鮮的太上皇李是应捉解天津。这次事变可以說是后来中日战争的序幕。吳长庆、张謇和袁世凱皆是这段历史中的人物，后来李鴻章只留袁世凱在朝鮮，吳长庆撤回金州，抑郁以死。张謇不平，写了一封信痛罵袁世凱，以致十年不复通音問。但是张之声誉，亦从此鵲起。

张謇应乡试中举，便隶翁同龢门下。翁的门生遍天下，张入翁门不久，世間便称他是翁同龢第一个得意门生，这当然也是因为张有在朝鲜的声誉做了基础。甲午战争，一败再败，原谅李鸿章的人就诿过于翁同龢，说他主持财政，遇事掣肘；说他一意主战，幸灾乐祸；并有人说他是上了张謇的当。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流纷纷弹劾李鸿章，或集体具名，或单独上书，翰林中就不少，张謇也有一篇。他上书的时间较早，措辞亦与众不同，因为他要分辨外间主和主战的說法，对李鸿章作了全面的攻击，自称为“新辨奸論”。因为当时反李的人很多，此文甚膾炙人口。此种折奏，在当时当然不能发生任何效用，且系清流自发之行动，于翁同龢亦无关涉，但終不免加深翁李間嫌隙之鴻沟耳。

戊戌政变，翁同龢虽曾为最初保奏康有为之一人，但康以后之变法主张，与翁等政見并不一致，可以说并不是一事。翁同龢在戊戌政变前便垮了台，徐郙也投閒置散（徐郙为翁氏最密之政友，与沈云沛情意至密），张、沈此时都請假回籍，分別在南京、板浦一个书院內掌教。所以戊戌、庚子两次政变，张、沈都沒有参預，亦沒有受什么連累。

在辛丑以前的重要事項，只就张謇年譜擇要叙列几段，就可窺見一斑。如：“戊戌（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七日見翁尙书开缺回籍之旨，二十九日詣翁尙书劝速行。十月間剛毅、許应騫承太后之意旨，周內翁尙书于康梁獄，故重有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編管之諭旨。”又：“通厂集款仍无着落，求助于南皮（张之洞）无效，告急于新宁（刘坤一），亦诿卸不顧，乃辞厂辞商务，局答委蛇慰留，飭通州知州、海門同知协募，知州則出示諭董，籤役四出无已，无少效，亟止之。”

据上两段記載，可以明白张謇在此时期中，無論在政治方面、經濟方面，都是以免祸为幸，无法进展。

庚子(一九〇〇)年八国联軍入侵，形势急轉直下，东南各省联保，而这个办法的倡議，张謇占了重要的地位。张謇致刘坤一的一封长信，是此案中很重要的文献，张函内容，茲择要叙述几点如下：“比上一牋，乞公与南中疆帅公推合肥总统各路勤王之师，入卫两宫。(中略)万一金墉不守，万乘播迁，車駕趑趄于甲中，兵鋒交午于輦側，南中聞警，伏莽騰謠，揭竿之徒，在所可虑。东南为朝廷他日兴复之資，誠不可不早为之計也。行台承制，替代有之。蓋申朝命以系人心，保疆土而尽臣节，非独反經合道之权宜，实亦扶危定傾之至計也。公忠勋著于王室，信义孚于列強，伏愿坚持初計，慨然自任，以待不測之变；坚明約束，以固东南之疆圉，呂志穆、于忠肅去人不远也。合肥儻且夕北上，公亦宜具安折专差一道員随行，即速与各国訂保护长江之約。(下略)”

刘坤一当时是南洋大臣，管轄区域包括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省，北面加上袁世凱之山东，西面加上张之洞之湖广，俱与刘联合在一起，在清廷与外国人中間守了中立，这种非常办法成立之經過，年譜中还有下列一段記載：

“与眉孙、爱蒼(福建沈瑜庆)、蟄先(浙江湯寿潛)、伯严(江西陈三立)、理卿(施炳燮，与何眉孙嗣琨均刘坤一幕府)議，合刘、张二督保卫东南，再由江鄂公推李相統兵入卫。余詣刘陈說，說后，其幕客有阻之者，刘猶豫，复引余問：‘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余曰：‘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刘驟然曰：‘善决矣！’告某客曰：‘头是刘某的。’电鄂約张，张应。”

东南联保骨幹是刘、张，又公推广东之李鴻章入京，便是东南全局；山东袁世凱介乎中央与东南之間，对象是另一个国家——德

国，也参加东南联保。在这局面下，可以说是地方一致对外妥协，但他们号召仍是忠君事上，拥护中央。这种非驴非马的局面，袁世凯善于利用机会，应付得面面光。李鸿章主持了和议后就死了，刘坤一不久也死了，袁世凯获得了信任，接替了北洋，从此开展了新的历史。

沈云沛在当时未参预。辛丑和约订定后，沈恰因他事应刘坤一的邀约到了南京。其时奖叙保卫东南的功勳，刘坤一所受的奖是赏戴三眼花翎，张、袁都加了太子少保銜。刘对沈戏说：“袁、张都可以称为袁宫保、张宫保了，难道能称我刘三眼吗？”沈委婉告以此事出于非常，袁、张做得恰如其分，赏功亦恰如其分，刘是盟主地位，古有功大不赏、功高震主之说，若特膺爵赏，则将更不自安等语。刘矍然自惊，此后更特别谦逊，未久即身故。

### 三

张謇在这时期以后，在通海办理实业也就完全展开了。通海垦牧公司是他的大本营，据他的年谱记载：“庚子年十二月，作通海垦牧初议并章程。”“辛丑年三月，同督藩委徐乃昌、陈树涵勘吕四垦牧公司地，定垦牧公司集股章程。七月，垦牧公司得股十四万。”大生纱厂是张謇实业的总骨干，关于它的记载有：“己亥（一八九九）年三月，纱厂机装成，试用引擎。”“庚子年九月，纱厂以售值日起，展转买棉供纺，得不停歇，至南京，新宁拱手称庆。”

此后未久即在崇明办成大生纱厂第二厂，张謇实业基础，于兹奠定。

张謇在一九〇四年呈部立案创设崇明大生二厂文内，对于纱厂进展有全面的叙述。兹摘录其要点如下：

“窃通州、海門、崇明均产棉花，壤地相接，……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承准前两江总督部堂张奏派經理通海一帶商务，即經先就通海兩境棉产紗布适宜之地鳩集公司，建設大生紗厂，計二万四百錠。二十八年，复就原厂增添二万四百錠。二十九年，陸續添开，至本年春間开齐。現因崇明利用川紗常苦不給，复于該县外沙江北与通海水陆可通之永泰沙地方增添大生分厂，計紗机二万錠。（中略）前两江督部堂奏派審經理通海一帶商务，本并通海邻之地在內，且通厂紗机系属官本，尤不得不审慎从事，是以审量形势，便空出海門，仍在与海門水陆俱通之崇明北沙增設分厂。（下略）”

由上文可見辛丑后数年中，张謇办理通海实业，已由艰苦草創的阶段，进而为成功的阶段，更进为扩充阶段，自此以后，他又更进到垄断的阶段。茲分別列举四个要点，以辨明它的全貌。

(1) 张謇又于一九〇四年办了大达輪船公司，把江北的内河运输控制起来，更由大达代办招商局对江北的运输，把江北对上海的运输也控制起来，兼办漁盐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控制通海外围之范围也越来越大。

(2) 张謇竭其全力排斥不属于自己的上海資本伸进通海及其附近地区。一九〇四年张謇控訴于商部說：“皖商已革浙江候補道朱畴以朱爵譜名請在崇明增設大有紡織厂，……前經呈复蒙批飭上海总商会令朱某另行择地布置在案。查朱商为上海九厂商之一，傾挤之患，固尝身受，而大部維護通海崇实业之案又所深知，岂容以紆臂夺食之謀，为入室操戈之举？乃近聞朱畴复在海門境内通海桥地方暗度地基，建設紗厂，称已呈部，期在必办。（中略）独不念风气开自通人，崇厂甫經成立，遽尔因羨生貪，因貪生妬，貪妬所蘊，生此賊害，既商情所不洽，亦公理所难容。（下略）”此案爭持甚久，朱某終于失敗，张氏垄断区域之范围，此后亦日益扩大。

(3) 享有减免捐税的特权。这是张謇最得力的地方，并且亦为海關方面所引用，而实际上并没有具体的文件，只是一九〇五年請准保护实业之呈文。这一篇抽象之空文，却成了一个各别交涉无所不通的总根据，以后直不知援用多少次数。这篇呈文很重要，茲把它附录如下：

“窃自光緒二十一年承准前南洋大臣张照会奏派集股创办通州紗厂，經營五年，始获开机，又二年而成效始著。二十七年承准前南洋大臣刘照会奏派集股创办通海垦牧公司以及广生榨油公司、大兴面粉公司。廿八、九年复在通州创办大隆油皂公司、泽生水利公司、大达水利公司、大达小輪公司、同仁泰盐业公司、阜生蚕业公司、翰墨林印书公司。职本里儒，家承寒素，憤中国利权之外溢，思以綿力自保其方隅。……一切細目姑不暇論，即如各工厂制造之貨，非減輕成本，不足敌外国进口之貨；而非援各国稅生不稅熟或稅熟不稅生之例，不能減輕成本，此大要也。重农劝垦，著在祖訓，各省州县报垦之少，病在报垦一亩，所繳之价必加地方及道司督撫各衙門規費，視成本三倍。二十七年承准通海垦牧公司时，呈請前南洋大臣刘附奏豁免此例，明定規費照所繳之价加一成半。此因墾未全成，故价尚未繳。应請大部先为奏豁，以便遵办，此大要也。盐业尤旧弊所丛，宜先普改公司之名，而后能祛一切之累。……現在先請就通州始。(下略)”

(4) 张謇成功之原因，虽說是也备尝艰苦，但还是因为两江总督官力之帮助，始而在通海办团練，繼而委他在通海办垦殖，办工厂，并且曾替他強制招过股；商部成立后，又有如上述帮他垄断免稅減稅等，可以說是应有尽有。但区域初只限于通海，进而扩展到邻县(崇明、如皋)。等到了一九〇四年以后，张謇的事业发达了，展开了，沈云沛在海州办的海贛垦牧公司也完成了。許鼎霖异軍突起，在海、贛办了許多工业公司，又在宿迁办了耀徐玻璃公司。許鼎霖基础不固，办起来比张、沈还要艰难，不过已成了鼎足局面，



张氏垄断区域，便也越不过淮、揚。

#### 四

沈云沛生于一八五四年（咸丰四年），比张謇小一岁，江苏海州人，十七岁中了举，比张、許都早，在浙江做知县。甲午前，他曾做了浙江巡撫廖国嗣的总文案，因解餉到北京，应了会試，又得了翰林。张之洞保办团練，他也和张謇一样。戊戌、庚子之間，因为和翁、徐的关系請假回籍，掌教于书院，和张謇也完全一样。张謇在通海开始办理实业时，沈到南通住得很久，归来便援了通海成案，在海州創立了海贛垦牧公司，区域规定很大，始終未能全区都办，这一点与通海区先小后大不一样。但沈云沛特別成功的，是在平地上創造了一个新浦鎮，后来它竟超过附近州县一切市鎮，現仍为新海連市之所在地。沈又在新浦鎮上办一姓茂商行，营业发达，因而致富。张謇自辛丑以后，大生业务扶搖直上，不独致富，而且扩充垄断，已如上述。沈虽未办工业，而因姓茂商业关系，亦仅次于张謇。张、沈又皆为名翰林，素著文名，故在一九〇五、〇六年以前，张、沈便成为在上海并駕之江北名流和实业家，上海《时报》之狄平子，为他們宣传极卖力。

沈云沛与楊士琦为儿女亲家，楊以商部侍郎出办南洋劝业会，沈云沛署他的侍郎。楊回任后，沈又調充邮传部侍郎，署理邮传部尚书，此后沈云沛便結束了名流生活。

#### 五

許鼎霖生于一八五五年（咸丰五年），比沈云沛又小一岁，比张謇小两岁，可以說他們年岁是相仿的，而許鼎霖最初的經歷，則比他

們還要艱苦。許鼎霖的父亲被陷囹圄，將處重刑，許鼎霖應鄉試，跣行且兼乞討才到南京的，一試而中，且因同年的力量，他父亲竟然无罪释放，許鼎霖却得了大孝之名。以后他到南美做外交官，当时还没有人肯远行，許去时，曾以很少的积蓄託沈云沛存放，直不敢希望能生还取用。回来时，得息很多，喜出望外。所以許、沈以后办实业时虽然有多少地方背道而馳，但私交永远是很厚的，这最初的关系，仍然有很大的作用。

許鼎霖在海贛办成的工业，最大的是海丰面粉公司和贛丰油餅公司。許鼎霖虽是主办，但新浦是沈云沛的根据地，地皮又是海贛垦牧公司的，所以沈云沛还是有很大的关系。許鼎霖又办了耀徐玻璃公司和窑湾面粉公司，是和张謇协力，也仍是許鼎霖主办。

許鼎霖办的事太多了，金融周轉不灵，上海財团借清理債務分別占去各厂，許鼎霖只好別图活动。他曾任苏路公司协理，后又任資政院議員，鼎革前授安徽巡撫未赴，又接任溥伦之資政院總裁，只是夕阳虽好，已近黄昏，他原想借官力以恢复实业，但已不可能矣。

鼎革后，张謇遂登上全国名流的最高峯。他是江苏諮議局議長，十四省諮議局联合会的領袖，南北政府同时邀請的农商总长。但从此他便驕傲起来，而他的名流地位也从此走上了下坡路。

一九一三年江苏省議會开会选举議長，张謇初以为非他莫属，他决不会有問題的，也不去聯絡，及票投到甌里，始知道失败了，許鼎霖得的票比他多。为了保全张謇的面子，許鼎霖倒填年月，辞了省議員职，投他的票全部算作废票。这样，仍然由张謇当选了議長。不过这种情况掩不了天下人的耳目。张謇自撰年譜有下一段記載：“二年癸丑，六十一岁，时局日扰，人情日詭激，士气日鄙薄，議長不

可为。十二日去宁至沪，許鼎霖电留，却之。十三日鼎霖至沪，复言不可为之故，仍却之。人言鼎霖方冀取代，是不必取而可代者，焉用冀为！”

此次选举以后，张謇虽仍然当选了議長，但也就不愿再去做，此后便做了北洋政府的大官。他这个老名流的老招牌虽仍然扛着，但已没有羣众，有时并显然成为地方羣众非难的对象。

許鼎霖辞了省議會議員以后，张謇曾替他位置了一个导淮会办，他没有就，却自己选择了葦蕩营垦务督办。葦蕩营是张、沈垦牧区域中間民垦已經有效之肥沃土地，許頗欲有所作为，就任后，除自己垦殖很多土地外，并联络馮国璋垦地也很多。馮做了总统，許旋即故去，故并没有发生任何政治作用。

## 六

沈、許故后，张謇的声望却不因为沒有竞争对手而更加增高，相反的他仍繼續走下坡路(已如上述)。他的晚节，最不理于人口的是下列的两件事：

(1) 余沈寿事：余沈寿是南通請去教刺繡的女教員，张謇凭借其地位而与沈寿发生恋爱关系，遂招輿論攻击。余沈寿之夫余某在其大門撰写春联，文曰“佛云：不可說，不可說；子曰：如之何，如之何？”沪报輾轉登載，称为不抵抗主义之名联。《张季子九录》中有关沈寿之記載及文件，亦多欲盖弥彰之痕迹。沈寿死后，张謇遵其遺囑留葬南通，葬前殷殷筹划，葬后一再往祭，其事甚明，不复贅述。

(2) 一九一九年第三届江苏省議会张孝若贿选議長事：此虽为张孝若事，但因乃父张謇护过，江苏輿論遂集矢于张謇，此事对于张謇晚节之声誉影响最大。《张季子九录》中載有张謇“为苏議会

事复段、王諸君函”一通，当时沪报对此文之反駁几至体无完肤。张謇对于一九一三年自己竞选議長遭到頓挫，心中不无耿耿。到第三届省議會选举議長时，他便同意于儿子张孝若的竞选。张孝若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纨绔子弟，年只二十岁，当然不会有人来真诚拥戴他，随就鬧出一个大贿选。其时恰在曹錕贿选以后，“贿选”名词极端醜恶的时候，一时輿論譁然。张謇这封冗长多疵、文过飾非的信遂成为詬病之資，茲略摘一点，可見一斑：

“頃奉冬电，业先电复。諸君爱省爱友之意出于至誠，仆于諸君曷敢不以至誠奉报。仆惡議會之齷齪久矣，此孽自項城造之，而致項城之造此孽者又有人在。其故皆由于浮慕欧风，一若議會之有政党不知其所以然而强效之，……予金錢者窃国而不止侯，受金錢者窃鈎而不胜誅，濁廉恥为游氛，愈演愈奇，至有今日。(中略)儿子国会被选，則严誠勿应；及省会复被选，里人有以正义来劝勿阻其行者，仆复誠儿子以社会太恶，見怪未广，毋为众动，着于炉上。儿子不胜觴，辞选稍迟，而法期已过，其众聞見端矣。……遵辞于会，闕愈力，再三以电声明，仆慮其不能脱，則又尝一度宣言忠告，人未有見其子困于虎狼之羣而不慄，慄則未有不欲脱之者，人之爱子宁不当如是，不啻如是耶？而彼僉壬者造作种种蜚語，污蔑儿子而及于仆，及仆之伯氏(指张謇)。(下略)”

此事遭輿論之攻击，始于张孝若之贿选；而以后輿論众矢之的乃更由张孝若而移到张謇，謂其假乃弟之势力，以垦殖为名，行豪夺之实，斥为一个恶霸地主，对于张謇声誉之影响，更为恶劣。

以上种种事实，张謇晚节，几至完全破产。但张謇在最后短短的几年中因办水利之努力，得韩国鈞之合作，也不能不說他尚有建树，他的名流生涯，便也可算有了归宿。

## 七

张謇在几次农商总长任内，成立了导淮督办公署，成立了全国

水利局，虽沒有办出成效，而导淮究成为全国之要政。徐世昌做总统的时代，张謇在本省成立了一个水利协会，倡議修江苏大运河，又倡議修建串場河、新运河，遂由中央与地方协力創辦了江苏省运河工程局，由中央特派张謇为江苏省运河工程局督办，复由张謇請准中央征得韓国鈞之同意，特派韓为会办，更由江苏地方推举韓兼任水利协会副会长。此后便成立了机构，延攬了很多的专门工程师，訂出了許多計劃，虽成效不大，而規模齐备。解放后次第办成的許多要政，如三河坝灌溉总渠，里下河几个大港的水閘，新沂河、新沐河之开辟等，工程之大，成效之著，在当时他們的計劃中尙多未曾夢見，但他們总是做了一点基础工作，較諸国民党时以借水利斂得款項挪充党費，則尙略胜一筹也。

韓国鈞是江苏泰县海安鎮(现为海安县)人，与张謇之通海为邻。他在前清时代向在外省做官，是一个所謂“老州县”，民国成立以后，才做了一任江苏省长。他以不貪污、不持成見、不避責任相标榜，人家也說他能名实相符，一任之后，声誉鵲起。他与张謇合作，并真能十分負責。张謇后来巡視运河到高邮县时，县人王鴻藻質問张謇，几至不能下台，全靠韓国鈞解围。张謇有“告高邮县人士书”，亦显露了当时情况。此时张謇声望却要靠韓国鈞来維持。但张謇究是負責主持之人，自不能与韓国鈞分开立論。张謇故后，国民党統治时期，韓国鈞交代清楚后几年才逝世。

江北地方上之大政，属于中央者，除导淮外，还有一个隴海鐵路。此事与张謇关系甚少，而为沈云沛毕生最努力的一件事。沈云沛在邮传部时，将汴洛路东边展出一条开徐綫，西边展出一条洛潼綫，施肇曾就这个基础上办成了隴海鐵路借款，是为“隴海鐵路”名称之始。施肇曾做了隴海鐵路督办十多年，后来經過了国民党反

动派破坏和停顿，四十年中进展极为缓慢，解放后始有一日千里的进展。

关于隴海铁路东段终点问题，张謇与沈云沛意见很不一致。沈云沛主海州，张謇则主海门。因为隴海路是借款铁路，铁路定线权操于外国工程师。开封距海州之连云港四百余公里，而修路至海门则须倍之，且复河道纵横，低洼卑湿，洋工程师弃置海门之议。沈云沛主张，则想在海州并筑三个海港。他计划在山东、江苏交界处之岚山头建筑一个海港，该地海湾和上海附近之乍浦有一样的深度，只要炸了礁石，筑成深水码头，便可停泊世界上最大的轮船，可以建成深水海港。其次，西连岛风平浪静，虽不甚深，但于此稍加疏濬，便可与黄浦江深度相同，可以在此建造转运海港，便等于将隴海铁路修筑到上海。此港在港口设备未完成以前，效用可大于一切，因为可以利用上海港的设备，不须另为建造。第三，还拟就灌河口之燕尾港筑一个内河海港，吃水之深并不亚于上海，由燕尾上溯，可通里下河、串场河，上游由杨家集、新安镇以通盐河、运河，江北全境无不可通。沈云沛此项主张，外籍工程师亦未予以注意。岚山头、燕尾港两地，经法、比工程师测勘，认为岚山头确为希有之深水港，而筑港经费较多，且须延长铁路线数十公里；燕尾港亦为相宜之内河海港，若稍移置上游，则尚有更佳地点。但他们因反对隴海选择河港，亦仍嫌路线绕越，结果对此两港均予放弃，而决定于西连岛筑港，后遂定名为连云港（国民党隴海路督办钱宗泽所定，当时只称为西连岛）。

沈云沛始终坚持其三港并建之说，交通部和隴海当局亦未予以采纳。沈氏并请自办沂青铁路创立公司，交通部始终不予批准，未能成立。但其主张先办西连岛海港，以与上海港联运一点，则与

法、比工程师合轍，不过招商局联运与隴海路修抵西連島，數年后始實現耳。

张謇对于隴海鐵路終点問題，始終憤憤不平，《张季子九录》第三册有“民十二为隴海路致张、解二君函”一篇，节录如下：

“一昨閱報，知諸君子于隴海及开港問題有所商榷，調查案略論列理由均明白正当，無論苏人非苏人，苟非私有所利，莫不兴起。謇苏人也，年廿余时曾一役淮壩，嗣后即有导淮之議。及苏路事起，复尝一至。嗣复有溝通鐵路之設計，共与隴海路案相后先也。以为江北边地，果淮治而路成，其利害所关，貫东南与西北，为吾国交通第一大干，不仅江南江北某一州某一县也。沙海昂报告聞有南北两綫，北灌河口，江南則崇明大港，此点隴海当局亦知之，比国政府事也。人亦以为通海人有所爭執，比复有南北二綫皆通之說以为調停。当此之时，固不知有兄等所提查办案中所称沈某收卖荒地及增漲北綫之种种。而所謂以山东日照县嵐山头为終点之說，显为护前文过，今則图穷而匕現矣。諸君子所謂先决三問題，容极表贊同，……展筑至南通之天生港，……以狭义言，謇通人也，宁可歸沈君淺淺之村气；以广义言，則南通者，中国之南通，固非一省一县之人所得而私也。（下略）”

张氏此函，虽系附和解树强等摭拾浮言，对沈云沛作攻击，但其結論，仍只是主张南綫或南北并筑。函中盛言本路之重要性，指沈氏为淺淺邨見，但其自身之主张，亦仍是万变不离其宗。不过当时交通部与隴海当局除絕對尊重借款公路測勘报告外，对于沈氏之意見亦甚为注重，而对张氏反无甚接触。张氏对于終点海口之研究，亦似未能深入，此則系事实也。現在，隴海、兰新联成一气，为中国鐵路第一大干綫，亦将进为欧亚两洲最大国际干綫之一部；三港并建，現已发見其重要性，行将陸續見諸事实。更因鉄路网之筹划，海州、通州間亦将有一条或两条之綫路，前此爭端已不足論，此固当时张、沈二氏所不能想象者也。

# 山西大学紀略

南 桂 馨

前清末年，科举制度将废未废之际，首先开办有三座大学堂：在北京为京师大学堂，在天津为北洋大学堂，在山西为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堂虽稍后于京师大学堂，但比北洋大学堂还早一年，它的发生、发展和一些重要的影响，是有紀述必要的。现在把它分作“山西大学的由来”、“前清末年的山西大学”、“民国时代的山西大学”和“山西大学的影响”四个节目叙述如下：

## 一、山西大学的由来

山西大学之创办，是与一九〇〇年（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义和团起义杀洋人，八国联军陷北京，签订辛丑和約分不开的。义和团运动，以山西的規模为最大，燬教堂、杀教民亦以山西为最烈。当时山西的巡撫为毓賢，他对义和团的运动是极端支持的，也是受到那拉氏（西太后）和端王載漪的密令而行的。那拉氏因为戊戌政变后，想废載湉（光緒帝），征求内外大臣的意见，而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以及海外华侨均不同意，抗电力爭，因而废立之举暫且搁起，但废立之意却未改变，乃先立載漪之子溥儀为大阿哥，以便机会成熟，实行废立。为了使大阿哥的地位在国际上得到承认，便以庆祝立大阿哥为名，邀请当时各国駐北京使节参加典礼，



不料各国使节都拒絕出席。这么一来，那拉氏对洋人怀恨在心。义和团运动起，那拉氏就想借手他们仇杀洋人，以泄其私恨。毓賢在山西支持义和团，亦即秉承那拉氏这种意图行事。这和义和团的以反教灭洋为主旨的爱国运动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然而辛丑和約签订后，惩办祸首，毓賢即不得不死。帝王家的一贯作法，事成独居其功，事败罪归于人，毓賢就是一个这样的替罪羊。他在临刑前为自己撰輓联云：“臣死国，妻妾死臣，誰曰不宜？最堪悲，老母九旬，娇女七龄，毫稚难全，未免致伤慈孝治；我杀人，朝廷杀我，夫复何憾？所自愧，奉君廿载，历官三省，涓埃无补，空嗟有负圣明恩。”毓賢这副輓联，写在当时的情况下，措词本极委婉，但他說“誰曰不宜”，正是有不宜的意思；說“夫复何憾”，正是有遗憾的意思，受人利用，到死方知。

辛丑和約的賠款总額为四万万五千万两，因为山西的教堂焚燬，教民死伤最多，又在国家賠款数目以外，由山西省单独赔偿教会和教民的損失銀四百万两（一說一百萬兩），这就給山西人民增加了很大負担。这项賠款，分作十年付清，每年四十万两，是由丁賦項下每兩糧銀附加一两一分筹出的，农民們把这笔附加叫作“小糧”。

除了惩办祸首，杀死毓賢和山西单独賠款四百万两以外，还有一事是：山西省停科三年<sup>\*</sup>，杀害教民县分停考三年。所以辛丑、壬寅的并科和癸卯的恩科，山西的乡試都移到西安举行，而县考就没有办法补救了。

在山西的外国教会，分天主、耶穌两派，天主教把这项賠款应得的部分，完全作为教会基金和赔偿教民損失之用；耶穌教則以英

<sup>\*</sup> 編者注：据《中外旧約彙編》（1957年三联版）第一册“辛丑各国和約附件”所載，滋事地方停止考試五年。

人李提摩太的建議，在它應得的賠款部分內，撥出六十萬兩（一說五十萬兩），在山西興辦一座“中西大學堂”，表面上美其名曰興學，實際上是進行文化侵略，培養一批為他們服務的知識分子。這種用意，山西的官紳也是很明白的。當時山西巡撫為岑春煊（廣西人，毓賢死後晉撫為錫良，岑又繼錫良任），對李提摩太這一興辦大學的建議，即感無法應付，明知英人此舉別有深心，但又不便拒絕他們的興學“善意”。岑謀于士紳谷如墉（神池縣人，光緒十六年進士，曾官戶部主事，因庚子事變，回晉任晉陽書院山長），谷謂：“此機不可失，我握其樞，彼任其教，即操縱在我矣。雖然，條約不可以不慎。”岑聞此言後，遂同意了李提摩太的建議（事實上也不得不同意，因為李的建議已為英政府所贊同），一方面用先發制人的手段，奏准清廷先開辦“山西大學堂”，一方面則與英方交涉，謂山西既有大學堂，不宜同時設兩大學，可將“中西大學堂”改為西學專齋，附設於山西大學堂，由李提摩太任該齋總理，以十年為期，期滿歸由晉省官紳自行辦理。經英方同意，雙方訂定合同，合同主要內容是：甲、山西大學堂設督辦，為最高領導，由中國人充任。乙、大學堂設中學專齋、西學專齋兩部分，中學專齋完全由督辦委派中國人主持；西學專齋則以英國人任總教習，督辦必須尊重他的意見（實際上也就是必須聽從他的意見）。丙、西學專齋，為期十年，十年期滿，由中國收回自辦，同時英國總教習以及其他外籍教習一律解聘。此事交涉的癥結處，即大學堂領導權問題：聽英人領導，有失中國主權，當然不可；但教會方面既以學堂經費是由它出，不許它參與學校行政，亦不可能。幾經周折，才定出如上的合同。

交涉既定，分奏中、英兩政府核准备案。西學專齋（以下簡稱西齋）既成立，即將山西大學堂原擬設置之部，改為中學專齋（以下

简称中斋),以与合同相符合。聘谷如墉为中斋总理,谷又商同岑撫照会高燮曾(湖北人,翰林,曾任山西学政,令德堂監督)为中斋总教,谷自兼副总教。西斋总理,即定由李提摩太担任。李在山西传教很久,对中国的语言文字、社会风尚,均甚熟悉,后因基督教浸理会推荐,到上海主办广学会,編印科学书籍。这时,他为创办山西大学堂,临时来晋,作了教会方面代表,中国方面代表为谷如墉。交涉定后,李仍回上海,他并推荐以英人敦崇礼任西斋总教。敦亦在中国多年,是个很阴险的“中国通”,已积資获得清廷二品頂戴头衔。

这时中、西两斋并立,总称为山西大学堂。两斋設預科,学生尽取的是各县优秀士子;中斋設高等預科,学生大部是由令德堂調来的(令德堂是光緒八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撫、王仁堪任山西学政时仿照浙江詒經精舍和广东学海堂成規所創設,是最有名的一所书院)。一九〇二年春(光緒二十八年三月),委姚文栋为山西大学堂督办,以省垣文瀾湖南貢院为校址,并借“皇华別墅”为西斋讲坛,修葺开学。这就是山西大学堂的由来和它的成立經過。一九〇三年春,购得新南門內侯家巷民地二百余亩,建筑新校舍。一九〇四年秋,新校舍落成,中、西两斋一同移入,即成为近五十年来的山西大学校址了。

## 二、前清末年的山西大学

自一九〇二年至一九一一年,在这十年当中,大学的人事变更以及教学上的重要設施,有以下之情况:

甲、人事方面:督办姚文栋一九〇二年春(光緒二十八年三月)到差,同年夏即辞职,繼任者为沈敦和。沈于一九〇六年夏(光

緒三十二年七月)离职,繼任者为丁宝銓。翌年春,取消督办之职。督办虽居于领导全校之最高地位,而实际掌握校权的則是中斋、西斋两总理。管理两斋的总机关和学生膳宿等事,专隶于中斋,而教务則由西斋分理。就全校來說,行政权的重心,則为中斋之总理。西斋的总理名义上始終为李提摩太,李因常住上海,負西斋实际責任的則为总教习。一九〇六年敦崇礼死后,代理西斋总教习的为英人毕善功,毕代理了一年,到一九〇七年夏(光緒三十三年六月)以苏慧廉为西斋总教习,苏亦英国人。

中斋首任总理为谷如墉,一九〇三年冬(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谷辞职,同时总教高燮曾亦辞职。翌年春,設监督而取消中斋总理,派楊熊祥为监督(楊为湖北人,进士),并改中斋总教、副总教为教务长,以傅嶽棻充任(傅为湖北人,举人)。一九〇五年秋,楊辞职,以傅嶽棻代理监督。一九〇六年秋,傅辞职,以解荣恪为监督(解字子仁,万泉人,翰林,曾留学日本),以刘盥訓为教务长(刘字孚若,猗氏人,京师大学毕业举人)。一九〇八年秋,刘辞职,以刘文炳(徐沟人,留学日本)为教务长。一九〇九年秋,解去职,以渠本翘为监督(渠字楚南,祁县人,进士)。一九一〇年春,渠辞职,以胡鈞为监督(胡为湖北人,举人,曾留学德国)。是年秋,刘文炳辞职,以张秀升为教务长(张字兰亭,临汾人,北京优級师范毕业举人)。十年之間,行政方面的人事变迁,大致就是这样。

乙、教学上的重要設施:西斋方面,既然是只分負教务一部的职责,就全校來說,教学上的重要設施,仍以中斋为中心。历任中斋的总理、监督,在当时的情况下,各有他們的主要設施。凡属創法起例,即撮叙其大凡;其循守成規者,則略而不述。

1. 谷如墉任总理时期的設施,可以概括为以下数点:第一,在

招生方面的权变办法：义和团的反洋运动，这个时候虽然消沉下去，但在人们的思想上，对洋人仍然存在着深刻仇恨。山西大学堂初成立时，人们都以洋学堂看待，青年士子犹多存观望态度，不肯投入，尤其是不肯入西斋。所以在规定每班学生数目上，颇感有不能足额之困难。正如俗语所说，“插起招军旗，端怕没有吃粮人”，在当时这还是一个重要问题。谷乃想出种种变通办法，除以原令德堂和晋阳书院（省书院）的学生经过甄别，作为中斋学生外，西斋学生先是由各县调取，不能足额，至此又想法通过私人函说招致，并以令德堂高才生崔廷献、刘絳训等投进学校为号召。这么一来，各县青年士子才有人来报考，中、西两斋才能各凑足一班学生之额。转移风气，确还是当时一件困难之事。第二，课程的规定，中斋主科为：国文、经学、历史、地理、数学等，初则都没有讲义，只选些成书作教材，后来才由各教员自编讲义，并随时补充修正。西斋主科为：英文、数学、物理、化学和一些有关的其他科学。中斋课程以文史为中心，西斋课程以数理化为中心。这种基础，也是在谷任总理时奠定的。第三，学生毕业的奖励，中、西两斋学生修业年限，均是三年，中斋卒业者，奖以贡生学衔；西斋卒业者，奖以举人学衔。后来西斋发展，成立专科；中斋发展，成立高等科。西斋专科毕业者，奖以进士学衔；中斋高等科毕业者，奖以举人学衔。以后清廷成立学部，各省设立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其学生卒业奖励，即多参照山西大学堂的办法办理；课程之订定，亦多以山西大学堂作参考。

2. 楊熊祥任监督时期的设施：中斋总理兼副总教谷如墉因回度支部供职，遗缺由楊熊祥接充，而中斋总理从此改为监督，同时又改并中斋总教和副总教为教务长，以傅嶽棻充任。楊、傅两人当

时均系三十岁左右的青年，皆勇于任事，对中斋的教学课程多所整理，成绩方面一时有着显著提高。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杨任监督时，首先选送过中斋学生三十名留学日本，并资遣西斋学生四名入京师范大学师范科。第二次又选送中斋学生三十名留学日本。在他的任内，还选送了西斋第一期卒業学生高时臻、王录勳等二十五名留学英国，学习理、工各科，这为山西大学堂后来办理理工科系打下了良好基础。但西斋总教习的企图，则是在于让这批学生到英国直接受到英国教育，作为奴化中国的工具，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3. 解荣轸任监督时期的设施：杨熊祥因调为江西南康府知府，辞职离晋，由傅嶽棠代理监督；傅辞职，继其任者为解荣轸。解本留学日本，学习法政。在他的任内，正是倡导立宪的时期，这时山西虽已成立有法政专门学堂，但所习的课程只限于日本法律系统。因此，他于西斋添设了一门法律学门，偏重欧美法律，和北洋大学法科性质略同，这为山西大学法科也打下了一些基础。解是同盟会会员，因为提倡革命，被山西巡抚丁宝铨贿通御史奏劾免职。

4. 胡鈞任监督时期的设施：解荣轸被免职后，继任的为胡鈞，胡是留学德国学习法科的。他任监督时，也就到了西斋十年期满的时候，按合同应由中国把西斋收回自办。当由巡抚丁宝铨、諮议局議長梁善济通知李提摩太践履前约。李从上海来到山西，和当局办理交接手续。手续完毕，开了个散场大会。他和西斋的洋教习们都穿着大礼服盛气凌人地坐在大礼堂的讲台上，中斋的教员们都在台下。他对中国教职员学生们说：“山西大学成立时，是我代表教会交涉的，今天交接，我还代表教会，我是全始全终的。但当年约定时，中国方面怕我们届时不交，现在事实证明，我们原来

就沒有那種想法。”言外頗有不平的意思。但他在交代後，也不得不把西齋總教習蘇慧廉和其他外國教員都帶走，和山西大學堂作了永別。胡任監督，為時只十餘月，辛亥秋，民軍起義，他即離職，山西大學堂教學工作亦即暫告停頓。

### 三、民國時代的山西大學

這一時期，按當時的發展變化情況，可分為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七年（芦溝橋“七七”事變）、一九三八年（三原復校）至一九四九年（太原解放）三個階段，分述如下：

甲、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一九一二年民國成立，太原秩序逐漸安定，學校恢復。改山西大學堂為山西大學校，以李鏡蓉（字亮工，河津人，留學日本）為校長，取消中、西兩齋，除西齋未屆畢業學生仍繼續修學畢業外，並籌設本科和預科。是年五月，李鏡蓉辭職，以高時臻（字福齋，襄陵人，留學英國）為校長。他首先開辦預科二部（一部主科為文、史、地，二部主科為數、理、化；一部升學文、法科，二部升學理、工科）第一、第二班。一九一三年九月，開辦法科和工科，以英人畢善功為法科學長，以王錄勳（王字猷臣，臨汾人，留學英國）為工科學長；並開辦預科一部，以張籟（張字貫三，平陸人，舉人，京師法政學堂畢業）為預科學長。法科學長畢善功未到校，以劉綿訓代理法科學長。一九一四年二月，以阮志道（上海人，留學英國）為法科學長。同年九月阮辭職，以冀貢泉（字育堂，汾陽人，留學日本）繼任。一九一六年五月，高時臻離職，以田應璜（字子琮，渾源人，舉人）為校長。田本北京國會第一屆參議院議員，當時正是金永任山西巡按使，金系老吏出身，不喜科學，對留學生出身

的人尤为厌恶,以田代高,实即因此。是年八月,田辞职,高时臻复为校长。九月开办文科,以郭象升(字可阶,晋城人,拔贡)为文科学长。文科开办中国文学类一班。一九一八年八月,高时臻、郭象升均被选为国会议员,以工科学长王录勳继为校长,预科学长张籁继郭为文科学长,而工科学长则由王宪(字监先,宁武人,留学英国)继任,预科学长则由苏体仁(字象乾,朔县人,留学日本)接充。

此一阶段,主要是处在金永保守专制和閻錫山倡办所谓军国主义式的“用民政治”的环境下,全省学校,不论教员学生,均抱着死读书、不问政治的态度,山西大学自亦不能例外。

乙、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七年:这一阶段,为时最久,校长一职始终是由王录勳充任。王与高时臻为近同乡,又均为英国留学生,两人作事均不积极。王承高后,一切少所改进,可说是衣钵相传,萧规曹随了。一般舆论,说高是“死活人”,王是“活死人”,虽还有些差别,其为死气沉沉,却无二致。一九一九年开办文科英文学类一班,其工、法两科各学门,亦均按照当时条件各有所发展。一九二四年八月,依当时部颁新学制停办预科。一九二五年九月,又按照省令恢复预科。一九三一年七月,依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重行改组,改称为山西大学,去了“校”字,校长仍为王录勳。各科均改为学院,仍以原学长为院长。各学门学类均改为学系,各设系主任一人;以李镜蓉为文学院国文学系主任,朱启震(字君哲、崞县人,留学英国)为英文学系主任,张嘉琳(字尔楨,五台人,留学日本)为法学院法律学系主任,王赐余(湖南人,留学日本)为政治学系主任,兰锡魁(字梅五,河津人,留学英国)为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主任,张劭仁(字静山,闻喜人,留学英国)为机械工程学系主任,常克勳(字子成,宁武人,留学英国)为采矿学系主任,王孟(字颐梅,山东人,留



学美国)为电气工程学系主任,冶金学系主任由院长王宪自兼。预科改为高级中学,以孙晋祺(字維庭,平定人,留学英国)为主任。其他行政部門亦分別改組或添設,計有秘书处、訓育处、事务处、图书馆、註冊部等設置。此为山西大学开办以来組織方面一大改革。一九三四年七月,山西省立法学院并入山西大学法学院,省立教育学院亦并入山西大学。一九三五年七月,增設理学院,以张劭仁为院长。

“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山西省的学生同其它各省学生一样,立即紛起响应。而这个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五四”运动和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对山西学生的思想也就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大大改变了过去那种埋头讀書、不問政治的沉寂状态。閻錫山为了推行他那一套所謂“用民政治”和“村本政治”,設立了一个育才館(人譏为“奴才館”),企图网罗大专学校毕业生,訓練一批能終身为他服务的知識分子。但是,受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山西大学毕业生却不肯投考育才館,以致招致了閻錫山的不滿。从此,他对山西大学学生便采取了腐蝕和摧殘的政策。对于思想进步、参加政治活动的学生,先是收买利誘,不从,則脇迫离境;对一些落后的学生,則任其自由散漫,馴至曠課缺考,生活腐化,成为风气。更严重的是,宿舍之間,开場聚賭,吸食鴉片和烈性毒品,亦无人过問。当地警宪机关,因迎合閻的意旨,对于这些违禁行为,亦不予查禁。当时社会上指斥山西大学宿舍为藏垢納污的“租界地”。在閻錫山腐蝕摧殘政策之下的山西大学,这种敗坏現象,一直持續到一九三一年大学改組以后,才漸漸有所扭轉。

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后,日寇飞机狂炸太原,山西大

学南移疏散。到了十一月，太原失守，晋南各县亦相继沦陷，大学員生数百人，多流散四方。当时有人主张移校后方，收容員生上課，而校长王景勳則以为在颠沛流离中上課等于逃难，不如干脆解散。結果，便照他的主张解散了山西大学。他也跑到香港过其优裕生活去了，后竟投降日寇，参加了伪組織。

丙、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九年：为閻錫山所厌恶的山西大学，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到一九三九年秋，中断了两年多，后見局面稳定，又在陕西宜川县之秋林鎮筹备复校。名为复校，实际是另創辦一所閻錫山的山西大学，不过是借用原山西大学的名义罢了。所以一开始就由他自己兼了校长，一面又委他的内亲(妻弟)徐士瑚(字云生，五台人，留学英国)为教务长。他的本意是要培养徐士瑚来办这一大学，因为徐的资历还不够，因而又委派了馮綸(字次經，隰县人，事变前山大法学院教务长)为校务主任，代理校长职权。在秋林大致筹备就緒后，即轉到三原县借用了三原女子中学校址开学上課。当时只有新招学生百十名，經費师資，均极缺乏。尽先恢复了文、法、工三学院，分設历史、外文、法律、經濟、机电、土木等六学系。一九四六年三月，又将原私立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并入山大，增加了一百余名学生。而徐士瑚和馮綸在三原鬧起意見，結果，馮辞职，由徐士瑚兼理了校务。閻錫山培植徐士瑚的計劃，至此又进了一步。一九四一年九月，由三原迁移秋林，以閻錫山的全力支持，到一九四三年秋，蔣政府改山西大学为国立，閻錫山荐王怀明(字念文，新絳人，留学美国)为校长，但只是空名义，不到校办事，为徐士瑚撐門面而已。一九四五年秋，抗日战争結束，山西大学由秋林东移，行至临汾，因交通断絕，又折回陝西韓城上課。一九四六年春，再由韓城迁回太原，王怀明辞校长职，徐士瑚正式被

任为校长。在解放战争时期,山西大学又从太原移北京上課,太原解放,乃轉回太原。徐士瑚以挪用校款糾紛,弃职逃往北京,校中便成立了校务委员会維持现状。至此,山西大学始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 四、山西大学的影响

这里所謂影响,主要是指山西大学师生在学术上和行动上对各方面所起的作用而言。它有着好的一面,也有着坏的一面。茲概括地分述如下:

甲、好的方面:第一,对学术的影响;山大初期,对于科学特别是历史教学方面,有着很大贡献。我国曾經通行一时的《迈尔通史》,就是山大翻譯出来的,同时,中斋还編有一部《中国通史》,内容相当充实,虽未对外印行,但在山西采用者极多。傅嶽棻当时亦編有一种《西洋史讲义》,简明扼要,风行一时(后来命名《西洋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館出版)。西斋教員瑞典人新常富也編有一种《无机化学讲义》,經学生徐鴻宝譯成中文,通行各地。此外,山西大学堂清末在上海还設有譯书院一所,由英人賓安樂主持,譯有当时欧洲名著数十种,为大学各科教本之用。这些譯著,现在看来当然觉得陈旧,但在那个时候确是創举,对于中国学校的影响不小。

第二,对社会的影响:在辛亥革命酝酿时期,山西大学第一期的学生們作用不小,如同盟会会员谷思慎,为革命奔走筹划,不避艰险,收获极多。解荣輅、刘綿訓宣传革命,被巡撫丁宝銓免了他們的监督之职(刘任法政学堂监督)。王用宾(猗氏人)任《晉阳日报》社长,揭露丁宝銓劣迹;景定成办《国风日报》,指責清政府的

腐敗和貴族們的荒淫奢侈生活，提醒了羣众对清政府和达官貴族的仇視和鄙視，这对辛亥革命都有着重大作用。南桂馨在起义前和起义中对閻錫山、黃国樑等軍人聯絡策动，曾作过极大努力。續桐溪、趙丕廉在晉北領導着忻代宁公团，攻守大同，对山西光复关系极大。此外，如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山西爭矿运动（光緒二十四年巡撫胡聘之和英商福公司私定合同，把山西煤鉄矿权出賣，至此英人进行开采，晉人反对，卒爭回自办），山西大学学生在国内国外均起着一些作用。英国在山西办理学校，本意是想为他們培养一批服务人員，結果，力爭矿权、反对資本主义侵略的即为他們所办的山大的学生，西斋总教习敦崇礼即因此气憤而死。到了民国以后，五四时期的山西学生运动和一九二五年反对閻錫山征收房稅运动①都是山大学生带头并以山大为本部。这些前后参加运动的人，尽管后来都难免有着不同程度的罪孽，但在当时还是有好的一方面。

---

① 一九二五年，閻錫山为了搜括民財，公布了一項征收房稅办法，令乡村房产一律由县估价投稅。所估价格要相当于城市房产价格，按价百分之九征稅。山西乡村房产向无投稅之例，这样一来，須家家稅契，有錢之家，也嫌負担过重，大声急呼；貧穷之戶，告貸无門，扣押追比，人人不安。太原學生紛紛接到家信，义憤填胸，由山西大学及各中等学校共数千学生向閻錫山請愿，要求停止征稅。閻只准以李錫齡为首的十几个学生代表入內見面，代表們見閻之后，跪地請求，閻不应允。門外学生以代表久不出来，要一齐闖門見閻，將堵門的卫兵打的头破血流。另有一部分学生到主持征稅最力的督軍公署秘书长賈景德、贊同征稅的财政厅长楊兆泰、省銀行經理徐一清三家住宅，毀門入室，把他們的門窗器物尽行捣毀。閻怕各县响应，演成巨变，不得不应允收回成命，并下了一个罪己令，把承办最力的朔县知事熊崧撤职解省，永不敘用；次于熊崧的武乡县知事高槐亦予撤职；已收的稅款，一律退还。一場风波，始告平息。

第三、对西北各省建設上的影响：在后期山大理工科毕业学生，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对建筑、工业以及厂矿各业均成就不少，晋、綏、陝、甘各省，无处不有他們的踪迹，这也可說是好的一面了。

乙、坏的方面：以上所說的优点，还是前一段孕育出来的为多；到了民国，特别是閻錫山統治时期，除了如上述理工各科毕业生在西北几省有些成績以外，再也找不出好人和好事了。

众所周知，閻錫山統治山西，是用着分脏式的办法来吸引士紳們为他服务的，他对山西大学的手法也不例外，現在分析說明如下：

第一，山西地区向分南、北、中三路，閻錫山用人，总是按路分配的。山大校长王录勳、文科学长张籟属南路，工科学长王宪、预科学长苏体仁属北路，法科学长冀貢泉属中路。这些人的学派也不同：王录勳、王宪是留学英国的，即所謂西洋派；冀貢泉、苏体仁是留学日本的，即所謂东洋派；张籟則不东不西，即所謂文人派。无論从地区和学派來說，这些人相互之間，都有着程度不同的互相傾軋和摩擦。閻錫山就利用这种矛盾使他們不能团結，好死心蹋地地听他指揮，为他服务。

第二，閻錫山对山大学生采取收买和腐蝕的方法，对于能为他利用的学生，通过他的亲信給予津貼，使他們随时报告教职員的动态和言論；这种学生毕业后，也都尽先录用。因而意志薄弱的学生，即向着这条途径奔竞。有前进思想的学生，縱不贊成此举，却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因此，校中空气經常总是死气沉沉，談不到活跃；如果說活跃，那就是前边說过的吃喝嫖賭了。

学生們也看出毕业后能否找到工作，不在功課好不好，而在門径有沒有。因此教員中有只領薪金而終年不上課堂的；学生也以

为上課不上課，照样都要毕业的。教員和学生“彼此默契，心照不宣。”这种现象，是其他大学少有的。

閻錫山从統治山西以至进一步統治晉、冀、察、綏四个省和北平、天津两个市，耀武揚威，烜赫一时。早期山大出身的，如南桂馨、崔廷献、賈景德、楊兆泰、馬駿、班廷献、赵丕廉、梁上栋、陆近礼等，原是山大学生、后充山大教職員的，如王录勳、冀貢泉、王宪、潘連茹等，后来山大出身并在学生时代作过学生領袖人物的，如閻的行营办公室主任梁汝舟、交际处长郭懋治、閻占据平津时天津乾果稅局局长賈紹孟（五四运动时山大学生会会长）、山西首县阳曲县长周敦信（亦作过学生会会长）、綏远稽查处会办李錫齡（抗拒閻收房稅运动时，曾領導学生搗毀督軍公署和一些厅长住宅）等，他們都是长期在不同程度上作了閻錫山的帮凶。而日寇侵华时期的山西伪省长苏体仁、王驥等，也都是山西大学出身的。

我們知道，在旧社会若干大学出身的人，虽然其中的多数是为統治階級服务的，甚至作了帮凶，但也总有一部分人是为人民和伟大的解放事业服务的。而在山西大学中，却找不到这样的进步人物。很显然，这和閻錫山的統治是分不开的。

（李泰棻、王葵經、王尊光整理）